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3/26
15 December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FRENCH/
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10(a)

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人权问题，
特别是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特别报告员 P·科伊曼斯先生根据人权委员会
第1992/32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5	1
章 次		
一、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	6 - 30	3
二、特别报告员所审查的有关国家的材料	31 - 550	8
阿根廷	31 - 36	8

目 录 (续)

	<u>段 次</u>	<u>页 次</u>
巴林	37	10
孟加拉国	38 - 41	10
不丹	42 - 51	11
玻利维亚	52	13
巴西	53 - 58	13
布隆迪	59 - 61	14
喀麦隆	62 - 70	15
中非共和国	71	17
乍得	72 - 73	18
智利	74 - 75	18
中国	76 - 111	21
哥伦比亚	112 - 116	27
古巴	117 - 157	30
吉布提	158 - 160	33
多米尼加共和国	161	34
赤道几内亚	162 - 166	34
埃及	167 - 202	35
萨尔瓦多	203 - 204	40
希腊	205 - 237	41
危地马拉	238 - 244	46
海地	245 - 253	48
印度	254 - 270	51
印度尼西亚	271 - 275	5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76 - 282	58
伊拉克	283	59
以色列	284 - 301	60
肯尼亚	302 - 303	63
科威特	304	64

目 录 (续)

	段 次	页 次
莱索托	305 - 307	64
马来西亚	308	65
毛里塔尼亚	309	66
墨西哥	310 - 332	66
摩洛哥	333 - 334	69
缅甸	335 - 350	69
巴基斯坦	351 - 354	72
秘鲁	355 - 380	73
菲律宾	381 - 383	76
大韩民国	384	77
俄罗斯联邦	385	77
卢旺达	386 - 390	78
沙特阿拉伯	391 - 394	79
塞内加尔	395 - 399	80
南非	400	81
西班牙	401 - 409	82
斯里兰卡	410 - 411	85
苏丹	412 - 424	86
瑞典	425 - 426	89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427 - 434	90
多哥	435	92
突尼斯	436 - 476	92
土耳其	477 - 534	98
乌干达	535 - 539	108
联合王国	540 - 541	109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542	109
乌拉圭	543 - 544	110
委内瑞拉	545 - 547	111
南斯拉夫	548 - 550	114
三、访问和访问后续工作	551 - 578	117
A. 访问前南斯拉夫	551 - 558	117
B. 访问后续工作	559 - 578	118
四、结论和建议	579 - 594	121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通过第1985/33号决议,决定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审查与酷刑有关的各种问题。

2. 1985年5月12日,委员会主席任命彼得·科伊曼斯先生(荷兰)为特别报告员,后者根据委员会第1985/33、1986/50、1987/29、1988/32、1989/33、1990/34和1991/38号决议,分别向委员会第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和四十八届会议提交了报告(E/CN.4/1986/15、E/CN.4/1987/13、E/CN.4/1988/17和Add.1、E/CN.4/1989/15、E/CN.4/1990/17和Add.1、E/CN.4/1991/17以及E/CN.4/1992/17和Add.1)。

3. 委员会第1992/32号决议决定将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再延长三年,但仍维持年度报告周期,以便他能向委员会提出进一步的结论和建议。委员会还决定,特别报告员在执行任务时应继续寻求从各国政府、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处获得可信和可靠的资料。

4. 特别报告员根据委员会第1992/32号决议,特向委员会提交第8份报告。报告第一章介绍了与特别报告员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有关的若干方面的内容。第二章主要是回顾一下特别报告员比较各国政府的材料以及他在1992年12月14日之前收到的有关答复。第三章叙述了特别报告员过去进行的后续性访问的情况以及他访问前南斯拉夫领土的情况。第四章是结论和建议。

5. 除第1992/32号决议之外,还有其他几项人权委员会决议也同特别报告员的职权有关,特别报告员在审查和分析所收到的材料时也考虑到了这些决议。主要有以下决议:

- (a) 题为“见解和言论自由的权利”的第1992/22号决议。委员会在该决议中特别报告员“在其职权范围内特别注意因行使见解和言论自由权利而遭到拘留、虐待或歧视的人士”;
- (b) 题为“司法执行工作中的人权”的第1992/31号决议。委员会在该决议中请各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特别注意在司法执行工作中有效保护人权的问题,尤其是针对密而不宣把人拘留的问题,适当时并在这方面提出具体建议,包括就咨询服务方案可能采取的具体措施提出建议”;
- (c) 题为“人权和专题程序”的第1992/41号决议。委员会在该决议中建议已邀请任何专题特别报告员访问的政府考虑接受后续访问,并鼓励各国政府迅速响应索要资料的请求,以便有关的专题特别报告员可以

有效履行职责。委员会还鼓励“在人权领域遇到问题的各国政府，通过相关的专题程序同委员会密切合作，特别是邀请专题特别报告员……访问其国家”；

- (d) 题为“在居民中制造恐怖的武装集团和贩运毒品分子的暴力行为对人权的享受所造成的后果”的第1992/42号决议。委员会在该决议中请各特别报告员继续特别注意这类集团的暴力行为对人权的享受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 (e) 题为“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合作”的第1992/59号决议。委员会在该决议中促请各国政府不要以任何方式的行动恐吓或报复打击与联合国各人权机构的代表合作者、援引联合国主持制定的保护人权程序者或为此目的提供法律援助者以及根据各项人权文书所定的程序提交消息者和人权侵犯行为受害者亲属。委员会请各人权机构的代表协助防止发生这类恐吓和报复事件。

一、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

6. 1992年3月3日,人权委员会通过了第1992/43号决议,决定设立一不限成员名额的闭会期间工作组,以便拟订《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任择议定书草案,建立访问拘留点的预防性制度。人们可能还记得,特别报告员在前几份报告中就曾主张建立这一定期访问拘留点的制度。

7. 1992年2月28日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就将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三年的第E/CN.4/1992/L.41号决议草案辩论期间,菲律宾代表建议只将任期延长一年。这位代表认为,由于已有不少机制负责酷刑问题,委员会需要时间考虑一下特别报告员的工作是否已变得重复多余。

8. 虽然委员会并未采纳这项建议,而且还通过E/CN.4/1992/32号决议将任期延长三年,但似乎不止一个代表团关注机制重叠的问题。因此,特别报告员认为有必要阐述他对各机制的性质和职能的看法。他希望,通过阐述这些看法,可以消除人们担心人权中心微薄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使用上会有失平衡的忧虑。1992年10月23日,特别报告员与负责拟订《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草案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进行了会谈并详细阐述了这一问题。在本报告中概述一下他当时的发言可能有助于委员会将来决定选择何种做法。

9. 毫无疑问,有许多机制处理酷刑以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国际社会认为酷刑是最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坚决谴责这种行为。

10. 如果看一看这些不同的机制,首先就可以发现根据条约建立的机制和委员会自行建立的机制之间有着明显区别。前者根据其定义仅对条约缔约国有管辖权,而后者则可针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政府和在本组织中具有观察员地位的所有国家的政府。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反映出,国际社会已确认所有国家均有义务禁止酷刑,而不管它们是否已经批准了明确禁止酷刑的条约。国际社会的这种结论主要是基于国际法院的观点。国际法院于1970年声明,在整个国际社会,每一国家均有义务尊重人权,其中毫无疑问也包括尊重免受酷刑的权利。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法草案也反映了这一观点。现在人们公认禁止酷刑是一种强制性规范,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违反。

11. 就尚未批准规定禁止酷刑的两项公约(即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与1984年《禁止酷刑公约》)的国家而言,本特别报告员是现有唯一的机制;令人遗憾的是,仍有很多国家尚未批准这两项公约。

12. 比“地域”范围上的差别更为重要的是不同职权范围之间在特点上的区别。根据条约建立的机构(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禁止酷刑委员会)负责监督各缔约国履行其条约义务情况;由于《公约》的规定远为详尽,缔约国必须在其定期提交的报告中提供比根据《国际盟约》提交的报告更多的材料。根据这两项文书,人权事务委员会也可以在有关国家承认其管辖权时受理个人申诉。最后,禁止酷刑委员会还有权在没有被明确禁止的情况下调查系统使用酷刑的案件。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机制的关键任务是要确定缔约国是否正在或已经履行其条约义务。所以,可以将其职能定为准司法性。如果它认为某项条约义务遭到违背,则指出当事缔约国是否应对违约行为负责。只要一国能纠正其各机构从事的不法行为,该国就不承担责任。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如果当地尚未采取一切办法予以补救,则不会受理个人申诉,除非委员会认为这些当地补救措施无济于事。外。需要用尽当地补救措施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委员会通常在酷刑案发生数年之后才能审议这一案件。其看法事关有关国家是否有义务赔偿的问题。

13. 如果我们看一下特别报告员的职权范围,情况则完全不同。根据第E/CN.4/1985/33号决议所规定的职权范围,特别报告员必须向由政府代表组成的人权委员会报告“他就酷刑问题包括酷刑现象和程度所从事的各项行动以及他的结论和建议”。

14. 为能报告酷刑现象及其程度的情况,特别报告员有权获得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材料。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大部分材料涉及据称酷刑的具体案件。他(以及其他专题报告员)可以提请有关政府注意这类材料并要求对此发表评论。他在这样做以及在向委员会报告通讯情况时,他本人并不就这类指控是否很有根据发表意见。他只是请政府进行调查,而且在调查结果确实表明指控属实的情况下,确保罪犯受到惩处,受害者得到赔偿。特别报告员根据他所收到的材料以及各国政府作出的答复向委员会阐述酷刑现象及其程度的情况,并向委员会提出自己的结论和建议。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委员会已敦促尚未就各特别报告员送交的函件作出答复的各国政府迅速作出答复(第E/CN.4/1992/32号决议,第18段),只有少数政府答复了特别报告员。

15. 该决议还请特别报告员“铭记有必要对他收到的可靠且真实的资料有效地作出反应。”委员会确定的其他专题报告员职权也都含有这项规定,所谓紧急呼吁程序这是由此而产生的。这一紧急呼吁程序恰恰表明,各条约机构的职权与本专题报告员的职权在性质上是很不一样的。特别报告员的职能基本上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其目的是,通过紧急呼吁程序,防止潜在或正在发生的有违禁止酷刑规定的现象,

并通过向各国政府送交据称违规情况,促进其制止酷刑并赔偿受害者。委员会制定的各专题程序已被国际社会用作对付违法行为的工具,以此解救这类非法行为的潜在或实际受害者。因此,重点是加强“效率”并采取预防性措施。

16. 如果我们把禁止酷刑委员会在收到关于有系统实施酷刑事件的材料时进行独立调查并在政府的同意下访问有关国家,与特别报告员访问各国情况加以比较,即可明显看出各职权在性质上的差异。委员会的调查是最后的补救措施,只有在大量证据表明有人大规模使用酷刑时才可使用这一方法,而且它最终还要确定国家责任。如果出现下列情况:所收到的材料表明,某一国家的情况似乎有问题;与当局和各非政府团体进行磋商可能导致进一步了解情况;通过采取某些措施可能改善局势,特别报告员的访问则不失为一种值得称道的办法。应更多地将这类出于咨询目的的访问看作是咨询服务,而不是《禁止酷刑公约》所规定的调查访问。这似乎也是委员会的意见,因为委员会曾鼓励各国政府认真考虑邀请特别报告员访问本国,以使特别报告员能更为有效地完成其任务。禁止酷刑委员会所进行的是秘密调查(虽然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可载列调查简况),而本特别报告员则是就访问某国的情况立即向人权委员会报告,由此可以看出两者在性质上的差别。

17. 当然,有的政府也可能认为,邀请特别报告员进行调查访问,让他亲眼看一下提交该政府的各项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或向国际社会表明它愿意协助消除酷刑,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作法。即使有些指控被证明确凿无误,调查访问报告的重点也应是建议如何改善该国的情况。虽然各机构的共同目标都是消除酷刑现象,但由于其性质完全不同,因此可以相辅相成。

18. 建立自成体系的定期访问拘留地点的制度会造成重复现象吗?这一制度主要是预防性质制度。由独立专家在一国或在各国定期检查拘留地点肯定会产生预防酷刑效果。尤其是,国际专家访问后将提出非常具体的建议;而且由于是定期访问,专家们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知道他们的建议是否已被付诸实施,并知道付诸实施后能获得何种结果。这是在世界范围内对付酷刑的全新手段,因此,它将辅助补充现有的机制。鉴于迄今为止这一斗争远未获得成功,这一新手段十分有用。如果各种现有机制彼此能尽量紧密合作和交流信息,建立访问制度将增进所有机制的效力。

19. 自从完成去年的报告定稿后,特别报告员向43国政府发出了44份函件。在这些函件中,他向有关政府转交了700宗据称发生的酷刑案件。如果所收到的材料中,不仅有关于酷刑的具体指控,而且还有较一般性的批评分析,也提请各国政府注意这类材料,并请求其就此分析发表意见。

20. 共向31国政府发出79次紧急呼吁,其中涉及大约300个人和若干团体,人们

担心这些人和团体可能会遭受酷刑。

21. 特别报告员共请55国政府发表意见,但只收到27国政府的答复;此外,有8个国家提供的答复涉及以前几份报告中提到的案件。但收到的许多答复并未提及特别报告员转交的全部案件。但应切记的是,有些信函是特别报告员去年相当晚才送发出去的,因此政府需要时间对指控进行调查。

22. 特别报告员在信函中详述了他需要何种材料。在答复中,不应仅仅讲指控是否确凿无误和有关真相,而且还应列出负责调查的机构、如有医疗检查,检查结果和检查人的身份、调查结果和就申诉作出的裁决以及裁决的根据。如果指控准确无误,还须列明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23. 有的答复基本符合这些要求。但其他一些答复则仅仅否认各项指控。特别报告员认为,即使指控确实有误,也不能就认为这类答复令人满意。正如他在前份报告中所述的那样,鉴于国际社会不断开展反酷刑活动,各国政府有必要认真对待酷刑指控,并审查提请其注意的每一案件(E/CN.4/1992/17,第10段)。

24. 如本报告提及的某国政府在本年度中向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而且委员会也已审议了该份报告,特别报告员会参考有关文件。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些文件载列的材料对本报告所载的材料是一种有意的补充。

25. 根据委员会第1992/59号决议,特别报告员曾两度发出紧急呼吁,救援与联合国各人权机构代表合作者。有人担心,这些人可能会遭到包括酷刑在内的打击报复。如果真有人因为作了联合国期望他们所作的事而遭打击报复,这实在令人伤心。

26. 鉴于有关国家的情况似乎需要特别报告员进行实地访问,他为此接触了一些政府,但今年没有任何国家邀请特别报告员访问。特别报告员感到,许多政府仍然把邀请访问看作是承认本国有意默许酷刑。他想重申一下他以前说过的一段话:他最知道铲除酷刑现象是多么困难。因此,他认为,如果他只向各国政府转交指控,而不指导他们如何有效地对付酷刑现象,那将是三心二意、不负责任的做法。

27. 苏丹司法部长兼总检察长曾在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发言。该部长当时曾说,任何人都可访问苏丹,了解那里的人权状况。1992年3月3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苏丹政府,询问是否可将此发言看作是访问苏丹的邀请。1992年11月23日,他收到了司法部长的答复,答复内容见以下第412-414段。该部长说,已准许西方国家驻喀土穆的大使和非、加、太国家与欧共体议会的代表视察监狱。他还说,他已告诉大法官和外交部长,特别报告员有意访问该国。

28. 特别报告员对此答复表示欢迎,并希望该国邀请他访问。

29. 特别报告员在前份报告中提到,吉布提政府曾邀请他访问该国,以便就转交该国政府的若干据称有人遭受酷刑的案件进行客观和独立的调查。他还告诉委员会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未能及时联络,不得不推迟访问。他于1992年8月21日致函吉布提政府,询问是否邀请仍然有效,如果有效,他何时能够访问该国。特别报告员尚未收到吉布提政府的答复。他想重申一下去年所说的话:吉布提政府邀请他实地调查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这会有助于委员会更为有效地开展反酷刑工作。

30. 根据委员会1992年8月第一次特别会议通过的第E/CN.4/1992/S-1/1号决议,本特别报告员应委员会负责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的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先生的邀请,于1992年10月12日至22日联合访问了前南斯拉夫。这是马佐维耶茨基先生第二次访问该地。与酷刑有关的访问调查结果载于第三章。

二、特别报告员所审查有关国家的材料

阿根廷

转交该国政府的材料和所收到的答复

31.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8月21日的函件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阿根廷实行酷刑的材料以及若干个案。该国政府在1992年11月9日的一份函件中作了答复。

32. 特别报告员指出，他收到了关于近些年采取的重大立法行动的材料，例如该国修订了《联邦刑事诉讼法》，规定警察获得的供词不可作为证据，并规定警察为确定身份而进行的拘留不得超过10天。但他得知，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警察仍经常严刑迫供，或迫人改变证词。还有人将酷刑作为惩戒和恐吓手段。多数受害者是涉嫌犯有偷盗、强奸以及类似罪行的穷人和青少年。有些案件则有政治色彩。据所收到的材料，警察曾对一群持不同政见者用刑，强迫他们承认犯有某项罪行。

33. 最常用的刑罚有：电击、毒打和用塑料袋蒙住犯人的头使其近乎窒息（“旱潜水艇”）。

34. 据报，该国政府并未采取有效行动防止酷刑，尽管有时在因受到很大的压力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对个别警察给予纪律处分。法官、特别是主审法官极少指控警察用刑。他们通常更注意提出警察施加非法压力这一较轻的指控。即使这样，也很少听说有警察被判刑。

35. 特别报告员还得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和省发生的7起案件。该国政府就此答复说，特别报告员应列明从事据称非法行为的有关单位、受理申诉的法律部门以及为确定每一案件详情所需的事实。该国政府还随函送交了关于防止使用酷刑的现行规章。提及的案件如下：

- (a) 1987年6月4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 San Telmo 区一家饭店的收款员 Maria Eugenia Corvalan Alarcon 被前来饭店搜索毒品的警察逮捕。她被带往警察局，在那里，她被当众毒打，被用“旱潜水艇”刑，并被强行穿上紧束衣。多名警察被控非法施加压力。特别报告员不知道是否已作出司法裁决；
- (b)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 Moreno 区一名侍者 Carlos Delgado 被便衣警察逮捕。这些警察当时开着一辆未挂牌照的福特牌 Falcon 型车。警察

就一摩托车被盗案对他进行审讯，捆住他的双手和双脚，并毒打他的腹部和脚掌。有人在他的头上套上一只尼龙口袋，使他几乎窒息。这是在 Moreno 第一区警察局发生的事。后来，若干警察把他带到一家医院。医生发现他浑身(特别是脚掌)血肿。其中一处伤势很重，造成严重的血液流通不畅问题；

- (c) 1990年7月23日，在 Lujan，身着便衣的多名武装男子逮捕了 Daniel Caviglia(16岁)以及若干其他男童子军，把他们带往警察局。所有的童子军均遭毒打。警察剥光 Daniel Caviglia 的衣服，把他绑在一张椅子上，对他用了“旱潜水艇”刑，并乱捏他的腹部。事件发生后，两名警察据说被解雇；
- (d) 1990年8月8日，在 Lujan，刑侦队逮捕了 Norberto Hadad。据所收到的报告称，他被带上手铐，遭到毒打，并被用了“旱潜水艇”刑，逼迫他承认非法弄到了一辆汽车。由于酷刑，他一只耳朵的耳膜穿孔；
- (e) 1991年11月7日，警察情报处因怀疑 Argentino Cabral 在几天前袭击 Barracas 学校而逮捕了他。警察毒打他，用“旱潜水艇”刑折磨他，用手铐将他铐在一堵墙上，并显然用点着的香烟烫他的肩膀；
- (f) 1991年11月23日，情报处逮捕了 Anibal Monzon Novena，审讯他，要他交待革命工人联合会这一组织，对他用“旱潜水艇”刑，殴打他，剥光他的衣服，并把他吊起来。他还遭假处决；
- (g) 1991年4月19日，警察逮捕了 Walter Bulacio (17岁)以及参加摇滚音乐会的其他一些青年。据目击者说，Walter Bulacio 遭到毒打，结果，几小时后，被送到一家医院，并于一周后死亡。解剖报告称，他死于先天性疾病。而其家庭律师则不同意这一说法，他们指出，根据医院病历，这位青年脸上有多处伤痕，肋骨和胸腔也有伤痕。

关于前6起案件，该国政府指出，人权署并未收到任何诉讼或其他材料。关于第7宗案件，该国政府报告说，Walter Bulacio 的死因是而过于紧张，引起脑溢血。负责逮捕 Bulacio 和其他青年的警官已受审。

36. 禁止酷刑委员会在其第九届会议(1992年11月9日-20日)审议了阿根廷的定期报告。该份报告载于CAT/C/17/Add.2号文件。

巴林

该国政府就前几份报告提到的案件所提交的材料

37. 1992年1月10日, 该国政府就特别报告员于1991年10月18日转交的关于据称 Mamdouh Mahdi Ahmad 被毒打致死的案件作了答复。答复称, Mamdouh Mahdi Ahmad 未受任何形式的酷刑, 他象所有被告一样享有所有权利, 包括获得律师协助和家人探监权。他于1991年5月19日死亡, 他的死与据称受刑毫无关系。

孟加拉国

转交政府的材料

38. 1992年11月12日, 特别报告员致函孟加拉国政府, 通知该国政府说, 他收到了关于该国实行酷刑的指控。指控称, 1991年3月25日, 在 Kushtia 区 Bheramara 农场保留地警察对一群人开枪, 打伤了 Shukchand, Atiar, Ripon, Biplab 和 Mannan 等五人, 并将他们逮捕。据报, 警察把他们带到作为临时营地的当地中学, 并据说在那里毒打了被捕者。结果, Biplab 被打断一只腿, Shukchand 被打死。

39. 特别报告员还得知在 Chittagong 山区发生的18起酷刑和虐待案件。其中有如下案件:

- (a) Milan Kanti Chakma、Upali Chakma、Syamal Kanti Chakma、Dipankar Chakma 和 Bimalendu Chakma。1992年3月20日, 他们以及 Chittagong 山区 Kaukhali Upazilla 地区 Poapara村的一些村民一起被叫到 Kashkhali 军营。他们在那里受到审讯, 并遭受各种酷刑。据报, 他们被倒吊在树上, 遭到毒打和电击, 还有人强行往他们鼻孔里灌水, 直至他们失去听觉和知觉;
- (b) Silcham Chakma: Master Kamal Chakma, 16岁; Barpeda Chakma, 17岁; Priyalal Chakma; Kula Mohan Chakma 和 Pindu Mohan Chakma。1992年5月20日, 他们以及其他一些人在 Ghagra 区被 Champa Tali 军营的军事人员逮捕。他们在该军营中受到审讯, 并遭棍棒毒打, 还有人用皮靴乱踢他们;

(c) Bina Chakma, 15岁; Mita Khisa, 13岁; Rakhi Sona Khisa, 16岁; Karuna Chakma; Royna Chakma, 14岁; Urbasi Chakma 和 Tipu Rani Chakma。1992年3月14日,孟加拉国陆军第八工程兵团Chowdhuri Chara 军 营的士兵袭击了第71号 Choto Mahapuram Mouza 地区和第78号 Bagachari Mouza 地区 Krishnama Chara 村的村民,强奸了上述少女。

40. 除上述案件外,特别报告员还为 Kanti Charan Chakma、bandi Charan Chakma(17岁)和 Tungo Chakma 于1992年2月21日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有人担心这些人可能会受酷刑。据所收到的材料称,这些人是在1992年1月14日 Chittagong 山区当地竞选期间被捕的。他们被驻守 Chittagong 山区的孟加拉国军人带到 Baraitali 军营。另外,据报道,他们被秘密囚禁,另一位当时被捕者 Abiran Chakma 先生被活活打死。

该国政府根据委员会第1992/42号决议提交的材料

41. 1992年4月6日,政府送交了一份在 Bandarban、Khagrachari 和 Rangamati 山区被恐怖主义分子杀害或绑架的人员名单。

不丹

向该国政府转交的材料和所收到的答复

42. 1991年8月21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该国政府,说他收到了关于据称有人受到不丹保安部队的虐待和折磨、其中包括少女和老年妇女遭强奸的材料。他还转交了下列各案,1992年10月20日,该国政府就这些个案作了答复。

43. 1991年11月9日,军人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了 Jayanarayan Bhandari 并把他关在 Samdrupjongkhar 区监狱。在狱中,有人鞭笞和踢打其生殖器,乱捏他的肚子,并把他强行泡在冷水里。他于1992年2月21日获释。

44. 政府就此案报告说, Jayanarayan Bhandari 因协助和怂恿一恐怖主义分子而于1991年12月9日被捕。调查表明,他被捕后对其与不丹人民党的关系供认不讳。说他在被拘留期间遭到不人道待遇是毫无根据的。政府严令警察不得以任何方式折磨或虐待被拘留的犯人。在不丹,内政部负责调查关于犯人受折磨或虐待的指

控并对违法者绳之以法。由主任级以上的高级官员认真彻底进行调查。一旦有证据表明警察有高压或违反规章的行为,将严惩有关警察。由于 Jayanarayan Bhandari 承认曾协助和怂恿一名恐怖主义分子,而且他本人也几次参与了恐怖主义行为,因此,不存在对其家人进行任何赔偿的问题。

45. 1991年2月,军方无证逮捕了 Ramlal Kuitel、Dhan Bahadur Budathoki、Hem Bahadur Budathoki 和 Bhanu Bahadur Neupane 并把他们带往 Tashigang 监狱。这些人在狱中遭毒打。尤其是,有人强迫他们倒立,同时踢打和抽打他们。

46. 该国政府就这些案件答复说,这些人是被 Bhangtar 分区警察逮捕的,他们已于1992年2月4日获得赦免。在调查期间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这四名犯人在拘留期间曾遭受过酷刑或虐待。

47. 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关于不丹皇家陆军于1991年10月据称打死三人的案件。死者姓名如下: Samdrupjongkhar 地区 Bukuli 分区 Royatar 村 Bukuli 小学六年级学生 Tikaram Subba、Dalim 地区 Magori 村 Bakuli 小学五年级学生 Mon Bahadur Darjee (17岁)和 Samdrupjongkhar 地区 Dalim 分区 Dhumpa 村的 Bhakta Bajadur Pokharel。

48. 关于 Tikaram Subba 一案,政府报告说,他于1991年10月1日被送进医院,1991年11月1日死亡。1991年11月2日的病历表明,他患有严重疾病。关于他被打死的指控完全失真,毫无根据可言。

49. 该国政府就 Mon Bahadur Darjee 案件答复说,他于1990年11月11日,被全国议会 Bhangtar 籍议员 R.B.Kharel 先生和 Bakuli 村的村长 Taranidhi Sharma 先生抓获。同一天,这两人把他交给 Bhangtar 分区警察。1991年11月7日的病历表明,他的健康状况很糟糕,于1991年10月6日死亡。关于他被打死的指控完全失真,毫无根据可言。

50. 关于 Bhakta Bahadur Pokharel 一案,该国政府报告说,1991年8月26日的病历表明,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于1991年8月25日死亡。关于他被打死的指控完全失真,毫无根据可言。

51. 该国政府认为,鉴于因恐怖主义活动而被捕的 Bhakta Bahadur Pokharel、Mon Bahadur Darjee 和 Tikaram Subba 罪行严重,因此,不存在赔偿其家属的问题。

玻利维亚

转交该国政府材料

52.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8月21日的函件中告诉该国政府，据报在玻利维亚发生了以下四起酷刑案件：

- (a) 1992年4月10日，Alvaro Garcia Linera 和墨西哥公民 Raquel Gutierrez de Garcia 被内政部所属单位拘留，并遭受到酷刑，双手、胸腔、生殖器、下肢和双耳受到电击。Gutierrez 女士被迫双手着地，撑立数小时之久，同时有人不断踢打其臀部、腹部和下肢；
- (b) 1992年4月，Victor Ortiz 和 Macario Tola 被捕并被关在Chonchoro 监狱，他们遭受毒打和电击等酷刑。Macario Tola 被迫带上耳机听令人无法忍受的高音广播。

巴 西

转交该国政府材料和所收到的答复

53.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9月7日的函件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巴西国内使用酷刑的材料。据报，警察经常毒打和虐待 Matto Grosso 州 Cuiaba 市的流浪儿童，逼迫他们交出部分偷窃所得。什么都交不出来或拒绝交赃物的儿童要被带到警察局，并受毒打。为不留任何痕迹，打人的警察往往用布包住拳头。警察经常把流浪儿童扔进车后箱，开到警察称之为吃人的 Cuiaba 河岸边。在那里，他们把这些小孩捆在柱子上，然后把他们仍到河里，直到他们快要淹死才让他们上岸。警察还告诉这些小孩说，如果他们把曾受虐待的事说出去，警察将会杀掉他们。

54. 据报，1991年9月22日，Mauro Martins Solano (17岁)在 Cuiaba 市自家附近被捕，据称后因警察严刑拷打而死。他因被控偷窃电器而被捕，后被带到 Santa Isabel 警察局，在该地受折磨达数小时之久。他的妻子也被警察逮捕，据她称，她丈夫备受折磨，遭到毒打，头被按在水里，直到快要窒息死才住手。警察把 Martinr 的尸体送到医院，说他患有心脏病。据死亡证明书上的记录，该人是溺水窒息而死。诊断书上说，死者双肺积有一公升的水。

55. 1992年11月25日，该国政府就此案报告说，捍卫人权中心已要求 Mato

Grosso 州检察长说明已采取何种措施调查此案并惩处凶手。州检察长答复说，警察已开始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并已向刑事民事检察官提出诉讼。

56. 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无地农工运动下属成员的材料：Carlos Aparecido Ladislau、Antonio Pinheiro Azevedo、Laurentina Aparecido dos Santos、Gilson Alves da Cruz、Milton Luz、Elizeu de Jesus、Marcio Bozoli、Macionil Fernandez do Prado、Fermino Lopes、Valdecir de Almeida 和 Jorge Rosa de Sousa。据所收到的申诉，军警于1991年7月27日在 Matto Grosso do Sul 州 Tazuaralzingo Anasatacio 逮捕了这些人，并把他们关进 Aquiduaana 监狱。由于受到虐待，其中一位犯人不得被送往医院治疗，其他人则行走困难。

57. 1992年11月25日，该国政府答复说，捍卫人权中心已要求 Mato Grosso do Sul 州公共安全秘书提供关于这些人惨遭酷刑以及为追究责任而采取的相关措施的材料。

58. 除上述指控以外，特别报告员还于1991年6月11日发出紧急呼吁，请该国政府就建筑工人 Luiz Alexandre da Silva 在被警察拘留期间死亡一事进行评论。死者从无犯罪记录，他于1992年4月22日在位于 Itapevi 住宅附近被圣保罗州军警逮捕，另有三人一同被捕，他们是 Reginaldo Silva、Ironaldo Batista 和叫做“Marquinhos”的少年。三小时后，他被带到 Itapevi 民警局，据称他在那里因不堪毒打而死。据报，官方法医所的尸体解剖报告指出，Luiz Alexandre da Silva 的面部、胸部和腹部伤痕累累，四肢也受了轻伤。解剖还表明，因心脏和主要血管破裂，胸腔大量出血。法医们认为，其死因是外伤造成严重内出血而至。与 Luiz Alexandre da Silva 一道被捕的三个人据说就在毒打现场，他们被警察释放后据说因害怕报复而躲了起来。

布隆迪

转交该国政府的材料

59. 1992年8月21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该国政府，说已收到关于反叛分子于1991年11月袭击了布琼布拉、Bunbaza 和 Cibitoke 的军事设施以及其他设施之后有若干 Hutu 族的人被捕并遭酷刑的材料。材料特别列有以下各案：

(a) 1991年12月12日，Jean Berchmans Baragunzwa 在 Bubanza 省

Gihanga 地区被捕，随即被带往警察局。据说，他双手被紧紧捆住，双臂疼痛不堪，结果不能自己吃饭；

(b) Chales Mugiraneza 也于1991年12月12日被捕。他在 Bubanza 警察局被保安人员审讯期间遭受酷刑，据说被打伤，特别是脚部；

(c) 1991年12月9日，Isidore Ciiza 在布琼布拉 Cibitoke 地区被捕，并被带往特别情报队队部。据说他在受审讯期间遭严刑拷打，两根肋骨被打断。据说他被打伤后未获得治疗。

60. 据所收到的材料称，1991年12月底，警察特别情报队逮捕涉嫌参加“解放Hutu人民党”这一地下抵抗组织的20位人士。这些人被关在大约长5米宽4米的一间牢房中，双手一直被紧紧捆住。他们骨头被打断，遍体鳞伤。据说他们显然未获得治疗。

61. 特别报告员还得知，即使在11月事件之前，涉嫌参加解放 Hutu 人民党的成员在宪兵或公安警察的拘留所中，就经常遭到严刑拷打。最常使用的刑罚是，将犯人的手臂紧紧捆住，使其双肩在背后贴紧，有时绳索都勒进了肉里。据报，被这样用刑的人大都皮肉溃烂，有的双臂瘫痪。此外，这些犯还经常被刺刀刺伤，或被打伤，特别是脚掌被打伤，他们还经常被迫长时间地跪在瓶子和石子上。

喀麦隆

转交该国政府的材料和所收到的答复

62. 1992年8月21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该国政府，称他收到的材料指称，1990年底最近修订的一系列特别法律授权政府高级官员可以在不须提出指控或未经法院的情况下将人长期、有时甚至是无限期地拘留。在这类拘留期间发生了多起酷刑案。反对或批评政府者未经法院审判而遭短期拘留的案件越来越多。被拘留者在拘留期间遭到拷打或遭到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如抽打脚掌和电刑折磨等。官方从未对指称使用酷刑的情况进行调查。材料中所报告的案件如下：

- (a) Anicet Ekane 和 Henriette Ekwe 1990年2月被非法秘密拘留，几个星期。她们在受审时受到拷打和虐待。据说，Anicet Ekane 被剥光衣服后遭到毒打并罚站好几天，既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据说 Henriette Ekwe 在受警察审讯时一连饿了3天；
- (b) Jean-Jaques Ekindi。此人是前政府的支持者，后于1991年5月退出执政党（即喀麦隆人民民主阵线），创立“进步运动”。1991年9月23日，

他因试图在Douala组织政治集会而被捕。尽管他被拘留不到24小时,仍遭警察严刑拷打,以致无罪释放后,不得不被送到医院就医。他的太太和母亲也受到保安人员的虐待,但她们并未被捕;

- (c) 全国争取民主和进步联盟成员 Samuel Eboua 和喀麦隆人权组织成员 Charles Tchougang 以及最近成立的若干反对派团体的15名左右重要成员和领导人因组织抗议拘留Jean-Jaques Ekindi的示威活动而于1991年9月24日被拘留了约24小时。他们据报受到拷打,其中几人在获释后住院就医。有人用铁棒毒打Charles Tchougang 的脚掌,并用内藏铁丝的塑料管抽打他的身体。 另一名被拘禁者,即全国民主和进步联盟成员Samuel Eboua 只穿着单薄的内衣和其他4人一起被关在一间又小又暗的牢房中,并遭毒打,;
- (d) 1989年11月, Nkondengui监狱的30余名政治犯,因监狱当局在他们的牢房中搜出一台收音机、一本《可兰经》、一串念珠以及其他违禁物品,而遭严刑拷打,而且得不到治疗。在这些犯人中,有人是未经判决而遭监禁的,有些些人是在特别军事法庭判决后被关押在这里,还有些犯人已服完其在1984年4月政变未遂事件之后被判的刑期,但仍被监禁在这里。 据说有2名犯人因遭毒打和得不到治疗而死亡。官方未就死亡事件以及酷刑和虐待指控进行任何调查;
- (e) Zama Kimbi Ndefru 和 Blaise Berinyuy。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这两个人案件的进一步材料,并为此于1992年2月21日发出紧急呼吁。材料称,两人被捕时遭到至少10名军警的毒打,当地宪兵队队长当时也在场。带到宪兵队后,他们又遭到毒打,并有人往他们身上浇冷水。 Zama Kimbi Ndefru 获释后不得不住院治疗。

63. 据特别报告员所收到的材料,该国北部的Tchollire II 监狱条件极为恶劣,许多人深受其害。犯人不得离开牢房。用水和食物极为缺乏,而且病人得不到任何治疗。 据报,犯人稍有不满意就要挨打,还要被关进毫无光线的牢房中,一关就是七天。

64. 除上述案件外,特别报告员还为下列人士发出紧急呼吁,有人担心这些人可能会遭受酷刑。发出紧急呼吁的日期载于每一小段结尾处的括号中。

65. 1991年11月17/18日夜,一学生团体的领导人Senfo Tonkam 在参加完各反对党协调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后于 Douala 被保安人员逮捕。据提供材料者称,在此

之前的几个月中,有许多人因政治原因被捕,并在警察局遭到拷打。(1991年12月20日)

66. 1992年2月26日,该国政府答复说,Senfo Tonkam 关在雅温得的中央监狱等候审判。此人被控犯有伪造罪、使用假名罪和违反姓名法。他可享受医疗,并可会见来访客人。未对他采取任何限制性措施,他从未受到酷刑或虐待。1992年6月1日,该国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说,法院已对Senfo Tonkam进行了一审,认为他确犯罪上述罪行。

67. 出版商兼反对党“捍卫祖国阵线”主席和“争取自由与民主人民行动委员会”成员Jean-Michel Nintcheu 和电脑专家兼人民行动委员会Douala 区域协调员的 Emmanuel Wato 。据称,警察于1992年1月3日无证逮捕了这两位人士,并把他们带到 Douala Bonanjo 的警察局。这两位人士在警察局遭到毒打。据称由于受到虐待,Jean-Michel Nintcheu 不能行走,健康状况十分糟糕。此外,他们未能获得任何治疗,律师也不能探监(1992年1月29日)

68. “喀麦隆英语母语运动”领导人 Zama Kimbi Ndefru 博士、该运动Bamenda支部领导人Stephen Ndi, 和支部秘书Blaise Berinyuy以及学生Gilbert Azeh。据所收到的材料称,1992年2月11日,上述人士因参加和平示威活动同其他一些人一起在Bamenda被捕,后被带到宪兵队。在那里,有人亲眼看到,宪兵们用木棍和枪托毒打其中一些遭拘留者。后来这些人士被关禁闭。(1992年2月21日)

69. Hameni Bieuleu于1992年11月5日在 N'Kongsamba 被捕,后被带到雅温得,在宪兵总部单独关押。所收到的材料还表明,虽然他患有糖尿病,而且身体很脆弱,但未获得治疗。(1992年12月2日)

70. 1992年10月27日,在西北省再度实行紧急状态后,“社会民主阵线”的许多成员在 Bamenda 被捕。其中许多人遭到毒打。据称,包括“社会民主阵线”成员Ngalla Nfor、商人Peter Ngufor、Francis Sama律师、Ophelia R. Sendze律师和最高法院前院长Nyo Wakai在内的约200人被秘密囚禁在混合机动队、保安警察和宪兵总部。(1992年12月11日)

中非共和国

转交该国政府的材料

71. 1992年10月27日,特别报告员致函中非共和国政府,并随函转交了他所收到的关于Jean-Claude Konjugo 医生在监禁期间死亡案件的简短材料。死者年龄50岁,生前为验光配镜师和“争取进步联盟”的成员。他于1992年8月1日在Bangui被

警察逮捕。他是在各工会和各在野政党组织的一次示威活动期间被捕的。他被带到宪兵派出所，因毒打，连站都站不住，只好被送到医院，几小时之后死于医院。

乍 得

转交该国政府材料

72. 根据收到的材料，有些人被捕并有可能遭到酷刑。因此，特别报告员为这些人向乍得政府两次发出紧急呼吁。特别报告员于1992年5月19日发出第一次呼吁，呼吁书涉及1992年2月在尼日利亚被捕后被强行押回乍得并遭监禁的大约40名乍得人。据所收到的材料称，其中一些人被关在恩贾梅那前总统府和叫作“情报收转中心”的一座警察所管大楼。由于监狱条件极为恶劣，再加上受到虐待，据说已有一些犯人死亡。

73. 1992年12月11日，特别报告员发出第二次呼吁，救援反对团体争取民主与发展运动成员Mahamat Khaled 和 Mahamat Issak 以及据说是该团体成员的13名乍得人。这些人原在尼日利亚Borno州流亡。据所收到的材料称，他们已被遣返回乍得，被关在恩贾梅那的情报中心。

智 利

转交该国政府材料

74.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8月21日的函件中通知该国政府，他已收到关于1990年-1992年期间17宗酷刑案件的材料。这些案件如下：

- (a) 1990年7月20日，Bernada Eugenia Valenzuela Montecinos 在参加经官方批准的和平示威活动时被捕。被捕期间，警察用木棍打她，并用脚踢她。据附在送交法院申诉书后的一份医生证明，她左眼眉毛上方有血肿，右膝盖有瘀血块，左手腕因受伤而患滑膜囊肿；
- (b) Juan Carlos Chavez Pilquil 因参加一失踪被拘留人员家属组织的一次街头游行而被警察逮捕。他被带到 Santiago 警察总部，在那里，警察踢他，挥拳猛击他的脸部，用口袋差一点闷死他，并用手铐把他铐在铁栏干上达数小时之久；
- (c) 1991年4月12日，警察突然袭击逮捕了经过 La Pintana 的 Jorge Alfredo de la Fuente Llanos 和 Mario Valenzuela Martinez。警察把他们带到第39号警察局，车辆遗失科的警察要他们监视本村的政治

上的好斗份子。遭到拒绝后，警察对他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使用了电刑；

- (d) Pudahuel 的 Teniente Merino 警察局受袭。此后，一大群警察和平民冲进 Adan Eloy Pacheco Pinto 的家，把他带到第3警察局。他在那里受审期间，警察粗暴地踢打他，还不准他吃饭或睡觉；
- (e) 1991年5月13日，一群数目不详的男子在 San Joaquin 的 El Pinar 广场绑架了 Roberto Antonio Morales Pinochet。有人怀疑这群人是政府军士兵。他被蒙住双眼，推进一辆车里，并被带到某地接受审讯，问他据称与 Guzman 参议员死亡事件有关的一人的下落。受审时，他遭拳打脚踢，为不留下伤痕，这帮人用湿布包住拳头。6个多小时以后，他被带走，他们绑住他的身体，蒙住他的双眼，把他抛到公路上；
- (f) 1991年5月29日，警察在街上逮捕了 Nelson Ernesto Ruz Aguilera，蒙住他的双眼，把他带到第3警察局。警察连续7天对他进行审讯。大多数时间，他要么被吊起来，要么站着受审。他未获得任何食物或饮水。警察还打他，主要是打他的头部。警察威胁要杀害其家人。他被单独监禁了23天；
- (g) 1991年5月30日，警察在街上逮捕了 Alfredo Herberto Marchant Figueroa。警察蒙住他的眼睛，把他带到第3警察局，并连续7天对他实行审讯，多次殴打他。在这7天中，他一直带着手铐，未获得任何食物。警察还一连4天不准他睡觉，并经常让他罚冻。他被单独监禁了23天；
- (h) Francisco Javier Diaz Trujillo 在街上走路时被警察逮捕。他双眼被蒙住后被带到圣地亚哥第三警察局，并在该处受审。警察对他拳打脚踢，并用水管打他的肩部和手臂。他们用湿布裹住凶器打他，以免露出痕迹。还有人用打火机把他烧伤。这持续了7天之久，在此期间，警察不准他睡觉、吃饭或喝水，并长时间罚站。他被单独监禁了23天；
- (i) 1991年11月，人权协调组织和政治犯家属协会领导人 Alicia Lira Matus、禁止酷刑运动成员 Nelida Molina Morgado 和 Lorena Reyes Anderson 以及全国青少年权利委员会领导人 Jose Antonio Sabat Mendez 和 Francisco Olea Lagos 在参加一次和平示威活动时被捕，

并被带到圣地亚哥第一警察局。她们在该那里受到毒打、污辱和威胁。后来，这些妇女被带到第38警察局，在那里被人蒙住双眼，被迫脱光衣服，而且双眼也被蒙住；

- (j) 1992年3月6日，Ana Maria Sepulveda Sanhuesa 在家中被15名左右未说明身份的男子逮捕，后被带到中央调查所。受审讯时，她的双眼被蒙住，衣服被剥光，而且不时受到恫吓和电击；
- (k) 1992年3月9日(星期一)，Cristian Cardenas Jofre 在街上被捕，后被带到中央调查所，在那里有人打他耳光，用拳打他，用脚踢他，还电击其身体各个部位；
- (l) 1992年3月29日，警察在 Franca 别墅逮捕了 Mirentchu Vivanco Figueroa。他先被带到第21警察局，后被带到第38警察局。他在这两所警察局中受到骚扰和虐待。在第一个警察局，警察用一女裙蒙住他的头然后毒打他。还有人拽他的头发，不让他呼吸。他被迫摆出多种奇怪姿势，并被关在某种壁橱里。

75. 特别报告员还得知，新兵在服兵役时经常受到虐待。他注意到以下三宗案件：

- (a) 1991年5月1日，Antonio Lenin Sanchez Pardo 开始在 Peldehue 伞兵和特种部队学校服兵役。1990年9月，他受到各种折磨，主要是 Vladilo 中尉手下的第11班的士兵打他和威胁他；
- (b) Jose Cristian Arriagado 在圣地亚哥的 Ignacio 大街的士官学校服兵役。他经常受到班长 Rene Opazo Riquelme 上士、Salinas 和 Bustos Pinochet 上士以及 Gonzales Chamorro 下士的虐待。1991年11月12日，他因被 Salinas 上士打伤，身上多处血肿，而被迫去团部医疗所治疗；
- (c) 1991年11月1日，Jorge Antonio Concha Meza 开始在 La Reina 通讯学校服兵役，后被调往 Peldehue。他在这两处不断受到骚扰。在 Peldehue，他受到多种体罚，包括用钝物击打。还有人用拳打他的颈部，并咬伤了他的耳朵。有一次，有人用棍子和绳索打伤了他的脚，他去了医疗所看病，结果到了那以后又有人又用电线抽打他的脚部。后来，Bascunan 和 Penailillo 下士还电击他以及其他新兵的颈部。

中 国

转交该国政府的材料和所收到的答复

76. 1992年9月7日,特别报告员致函中国政府,送交了关于该国使用酷刑以及若干个案的各项指控的概述材料。该国政府于1992年10月28日就此函件作了答复。此外,特别报告员还为救援所收到的材料认为可能有受酷刑危险的人士6次发出紧急呼吁。该国政府也就其中一些人的情况作了答复。

(a) 实行酷刑概况

77. 据所收到的材料称,在各警察局、拘留所、劳改营和监狱中,因涉嫌在西藏自治区从事民族主义活动或持同情态度而被捕者,经常遭到酷刑以及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报告中最常提到的酷刑有:用电棍击打人的躯干,脚掌和生殖器,有时还把电棍插入人的嘴里;用点着的烟头烫人;放狗咬被拘禁者;长期使用手铐和锁链限制犯人的自由;强迫犯人在室外罚站几天,有时还要他们站在冰块上,以及强迫犯人跪在三角形的木块上。

78. 犯人判刑后有时因据称违反狱规而遭酷刑或肆意虐待。但是,未经审判便被关押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后才被释放的被拘留者,以及等候正式起诉的再押人员往往是酷刑和虐待的主要对象。在这种情况下,酷刑成为突击审讯的一种手段。据说酷刑是由公安局干警或人民武装警察实施的。

79. 被拘留者有时一天三、四次接受审讯,每次一连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半夜还要被提审。审讯室一般有一两把椅子和一张桌子。犯人受审时有时被勒令剥光衣服,在地上。通常有一人记录,一至多名审讯者轮流审问和拷打犯人。审讯结束前,犯人往往被单独监禁,他们既无律师协助,又见不到亲朋。另外,据报被拘留者或其家属无法通过有效的官方渠道提出申诉。

80. 1992年10月28日,中国政府送交了下列评论,应中国政府的请求,特将这些评论全文照录:

“一、坚决反对和禁止一切酷刑是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基本立场和主张。长期以来,中国为切实禁止酷刑,有效地保障公民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不受非法侵犯,始终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十分注意不断完善立法工作,把

禁止酷刑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二、 中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均对禁止酷刑作了原则和实质性的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对于酷刑犯罪的制裁，我国《刑法》作了相应的规定，如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非法搜查罪、侮辱、诽谤罪、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罪、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等。《刑法》还特别规定，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对人犯和服刑罪犯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司法机关根据行为情节严重程度予以相应的制裁。如实施酷刑尚未致人伤残的，以“伤害罪”从重论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以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对如何在司法程序上预防和禁止酷刑，我国的有关法律也作了相应的规定。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为公民在其权利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时寻求法律保护，提供了更为直接和有效的途径。

三、 在中国，罪犯服刑期间的应有权利均依法受到保护。他们不仅享受必要的物质生活、医疗卫生、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等待遇，而且享有申诉权、辩护权、人身安全及人格不受侮辱权、控告权、检举权等。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有依法行使选举的权利。

四、 中国的司法机关每年都对酷刑犯罪进行查处，重点是查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刑讯逼取口供、以及监狱执法人员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的犯罪行为。按照法律规定，调查处理酷刑案件，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然后提交法院进行审判；二是由行政机关受理调查。行政机关的管辖部门是监察部，它是执行政纪的部门；监察机关对于可能构成犯罪的案件，则应向司法机关移送，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查处。

五、 为了检查关押犯人的居住设施、检查监狱和其他劳改场所是否正确执行刑罚和有否体罚虐待犯人的情况，各级检察机关专门设立了监所检察机构。各地的监所检察机构有的常驻在监狱和看守所，有的则采取经常视察的方式开展工作。公安机关的负责部门在检查公安人员办案情况时除检查工作程序和方法外，还要检查是否有刑讯逼供行为。各级公安机关普

遍设立了法制、监察、纪律检查部门和举报中心,受理有关酷刑、殴打的控告和检举,对发生的刑讯逼供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件进行认真查处。对由于监管人员违法乱纪造成犯人伤亡的,由医务人员作出检测;导致死亡的,由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的法医作出鉴定。

六、中国的有关法律还规定,对因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7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公民给予的治安管理处罚错误的,应当向受处罚人承认错误,退回没收的财物;对受处罚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损失”。

目前,中国正在加紧研究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在该法未制定出来以前,对酷刑受害人的赔偿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解决,如医药费、误工费、营养补贴费的补偿,可以由行政机关调解或作出决定,也可由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或行政诉讼案件时作出赔偿裁决。

七、中国司法机关历来维护罪犯的合法权利,对他们给予人道主义待遇。来函所附的材料中指控在中国西藏和其他地方的酷刑“司空见惯”是毫无根据的。对犯人进行各种残忍的虐待和酷刑的所谓“案例”完全是无中生有和恶意造谣。

(b) 转交该国政府的个案

81. 1991年7月29日,约20名警察无证逮捕了索朗卓嘎(Sonam Dolkar),并搜查了她在拉萨的住房。她后来被带到Seitru监狱(Sangyip监狱第四号分监狱)。自1990年8月2日起,一连六个月,每隔一天她就被剥光衣服,受电刑或其他形式的酷刑。还有人用电棍对她进行性侮辱。1991年2月,一名狱医警告说,他快要死了,这样他们才停止对她的折磨。在此之前,她一直未能获得任何治疗。他任何时候都不准在牢房外活动,也从未见过其他犯人。狱方没有提供睡垫或毯子。

82. 该国政府报告说,1990年7月,索朗卓嘎因向国外一敌特机构提供情报并从事旨在推翻政府的非法活动而被依法审查。由于她认罪态度好,主动交待了罪行,并

保证不再重犯,中国公安机关于1991年1月17日依法决定从宽处理,下令将其释放。

83. 1991年3月,在美国外交官代表团访问Drapchi监狱时,狱中的两名犯人洛桑旦增(Lobsang Tenzin)和旦巴旺扎(Tempa Wangdrak)试图递交一份请愿书,后来遭到毒打,并被单独禁闭。

84. 该国政府就此件报告说,1991年4月1日,在美国驻中国前常驻代表参观西藏自治区的监狱时,在押犯旦巴二扎要另一名在押犯洛桑旦增把他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条塞给其中一名来访者。该监狱根据狱规对他们进行了惩罚,关了一段时间的禁闭;根本没有所谓的毒打和单独禁闭的事。

85. 来自 Damshung Doe地区的阿旺索巴(Ngawang Zoepa)据报刑期5、6年;格桑坚赞(Kelsang Gyaltsen),据报刑期6年; Ngawang Tsondrue, 据报刑期4、5年;阿旺列谢(Ngawang Legshe),据报刑期4、5年;来自Damshung地区的阿旺朗康(Ngawang Namgyal),据报刑期3、4年。1991年3月17日下午,这五名来自拉萨附近 Toelung Dechen 地区藏传佛教寺 Ding-gar寺的喇嘛试图在八角街地区的一次示威活动开始时,打出一面藏旗,据报被当场逮捕。据一位目击者说,这几名喇嘛遭公安局干警毒打,其中一名喇嘛似乎被打断了手。

86. 关于这几个人的案件,该国政府报告说,1991年3月,阿旺索巴、阿旺列谢、阿旺朗杰因从事旨在分裂祖国和推翻政府的非法活动,被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处6年、4年和3年徒刑。

87. 色拉寺原籍 Medro Lapdong 的一位喇嘛 Tsering Taschi 因参与1991年5月26日在拉萨八角街地区举行的一次示威活动而被捕并遭毒打。后来他被关进 Gutsa 监狱,并被强迫献血。

88. Ngawang Tsepak; Tachi Lhoka 的 Sonam Lhamo; Lhoka Chonggye 的 Ngawang Choezom; Phuntsog Tendrol; Pasang Wangmo; Pasang Drolma; Dechen Drolma; Lobsang Choedron; Dawa Chazom。这9位来自Chubsant 和 Shungsep 尼姑庵的尼姑据报于1989年9月在拉萨被捕,后被关进 Gutsa 监狱。在拘留期间,她们的手脚被捆住,并被吊起来毒打他们并使用电刑。

89. 近些年,一些在西藏自治区各监狱和拘留所关押的犯人据报在拘留期间或在获释后几个星期之内死去。显而易见,这是因为在拘留期间受到虐待或缺乏治疗所造成的结果。特别报告的案件以下:

- (a) 1991年8月底或9月初, Gutsa拘留所关押两年半的拉萨一位女商贩 Tsamla获释3个月后死去。至少她被拘留的前6个星期是秘密拘留。在此期间,据说她在受审时多次被拳打脚踢。在拘留期间,她的健康状况

越来越差。1991年5月或6月,据说她被送往附近的一家诊所,后来又被送到拉萨市人民医院,并显然在这家医院里作了检查,发现她的脾脏已坏裂。住院时,显然有人通知她说她已获释,并应回家。3个月之后,她死于家中,这明显是她在囚禁期间受伤所造成的;

(b) 1989年3月8日午夜左右,居住在 Tarpo Lingka 的一名拉萨画家Yeshe 据说因参加几天以前的示威活动而被捕。在狱中,他遭毒打,浑身伤痕累累。他的生殖器严重受损,他在7、8月获释时小便失禁,行走困难。他死于1989年8月22日;

(c) Chozed Tenpa Choephel (chos-mdzad bstan-pa chos-'phel) 于1988年1月被捕,并在狱中遭到毒打。1989年8月24日,他被从Sangyip监狱送往拉萨市人民医院。有报告说,他在第二天或者在8月27日死亡。据一位目击者说,尸体“全身发紫”。

90. 特别报告员还在上文提到的1992年9月7日的函件中向中国政府转交了关于1989年民主示威活动期间的工运积极分子韩东方案件的材料。1992年5月14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传讯韩东方,和他讨论收回住房问题。法院工作人员用电棍不停地毒打他,直到发现韩东方呼吸困难才住手。据报,韩东方被打后落下了胸腔积水的毛病。

91. 特别报告员还告诉该国政府说,他收到一份报告,报告涉及因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而被捕并被关在湖南省各所监狱、特别是被关在沅江、衡阳、零陵、怀化、郴州、龙西和长沙等地监狱的犯人遭受酷刑的各项指控。报告特别载列了以下各案。

92. 被关在零陵监狱的两名犯人余志坚(Yu Zhijian)和喻东岳(Yu Dongyue) 据称自1989年底以来一直被单独监禁,并受过各种苦刑。结果,他们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喻东岳大小便失禁。

93. 关于湖南浏阳县余志坚一案,该国政府报告说,1989年8月1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因他触犯刑法而将其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关于湖南省浏阳县喻东岳一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9年8月8日因他触犯刑法而将其判处20年有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5年。

94. 湖南大学退休教授彭玉璋(Pen Yuzhang) 于1989年6月中被捕,后被关进长沙第一监狱。据报,在狱中,他一连3个月被铐在叫作“铐板”的刑具上。这是一块差不多和门大小一样的横板,木板的四个角上装有金属铐具,底下有一大洞。犯人把头朝上放在木板上,手脚被紧紧铐住。犯人只能通过大洞大小便。

95. 该国政府说,湖南大学职工彭玉璋,男,因参加1989年动乱而被长沙市公安局拘留,但后已获释。

96. 1990年,周志荣(Zhou Zhirong)被叛7年徒刑后关进龙西监狱。1991年2月12日,他被转到湖南省零陵地区省第三监狱单独禁闭惩罚处。据报,一到那里,他便被铐上“铐板”,而且一铐就是3个月。

97. 该国政府报告说,湖南省安乡县的周志荣因触犯刑法而于1990年3月29日被湖南省中级人民法院判处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

98. 范中(Fan Zhong)于1989年6月底被捕,后被关在长沙第二监狱。据报,在狱中,他身体敏感部位屡遭电棍点击。他还被锁到铐板上。

99. 该国政府报告说,范中因参加1989年动乱而被公安局拘留,但后来获释。

100. 湘潭电机厂工人陈刚(Chen Gang)于1989年6月被定罪,据说他曾有10个月一直戴着手铐和脚镣。

101. 该国政府报告说,陈刚,男,因流氓团伙罪,被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此人仍在服刑。

102. 除上述案件外,特别报告员还为下列人士向中国政府6次发出紧急呼吁,担心这些人可能会遭受酷刑。发出紧急呼吁的日期见每一小段结尾处的括弧。

103. Gao Shuxian 曾经是衡阳石油公司的干部,他因被控贪污公司公款而于1989年8月在衡阳被捕。据报,他已被秘密监禁达2年多,并在受衡阳南区检察院的一名调查人员审讯时被殴打。结果,据报他的一只耳朵失去听觉;但受伤后他未能看病或获得任何治疗。他就其所受到的待遇向当地有关机关申诉,但均未得到任何答复。此外,据报他尚未被起诉或审判。有人担心他可能会被逼供,从而会进一步受到虐待。(1992年2月7日)

104. 学生Liu Gang、Zhang Ming 和 Kong Xianfeng;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人Tang Yuanjuan、Li Wei 和 Leng Wanbao。据报,这6名持不同政见者分别被判处3至20年徒刑,并被关押在中国东北辽宁省凌源劳改营。据报他们在那里深受虐待。他们除每天被强迫劳动14小时外,还经常受到拳打脚踢,电棍触击,和皮带抽打。据报,3个月前,刘刚(Liu Gang)的手臂被监狱警卫打断。(1992年2月14日)

105. 1992年4月29日,该国政府就这些案件答复说,Liu Gang、Tang Yuanjun、Kong Xianfeng、Zhang Ming、Li Wei 和 Leng Wanyu因触犯中国《刑法》,而被依法定罪,目前正在辽宁省辽源劳改队服刑。分派给刘刚和其他人的劳动强度及劳动时间与其他犯人的劳动强度和时间一样,从未要求他们从事过于繁重的劳动或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以外劳动。他们身体很好,从未受监狱管理人员的虐待。说刘刚的

手臂被打断,纯属无稽之谈。

106. Tanak Jigme Zangpo以及其他3名犯人被关在拉萨以北三公里处的监狱。他们因被控在4名瑞士外交官于1991年12月6日访问该监狱时呼喊要求西藏独立的口号,而被关进与他人完全隔绝的惩戒室。(1992年3月4日)

107. 1992年3月17日至19日,在拉萨Karma先生、Monlam先生和Gyatso先生拉萨Maldro Gungkar区Gyama Trigang村被捕。据报,他们因涉嫌该区张贴的一些墙报有关而被捕。他们后来被带到Maldro Gungkar区监狱。据说他们在那里被打。(1992年6月5日)

108. 1992年10月26日,该国政府就这些案件报告说,西藏公安机关进行了反复调查,但自1990年以来,没有在拉萨逮捕过名叫Karma、Monlam或Gyatso的任何人。

109. 任晚町是北京第二监狱关押的一名犯人。据说,如果他不立即获得治疗的话,就有双目失明的危险。据报,任晚町可能会视网膜脱落,这可能会造成永久性失明,但尽管如此,自1991年7月以来,他一直未获充分治疗。(1992年11月9日)

110. 1992年11月24日,该国政府报告说,任晚町在狱中受到人道的待遇。他身体很好,视力也很正常。声称他可能会“失明”是毫无根据的。

111. Ngawang Dechoe 于1991年4月10日被捕; Ngawang Gomchen于1991年8月被捕; Ngawang Zangpo 于1991年8月被捕; Jampel Nyima 于1991年8月被捕; Ngawang Ludrup 于1991年5月16日被捕。据报,这5名哲蚌寺喇嘛被关在Gutsa警察(公安局)拘留所,并受到酷刑。有人担心,他们可能还会受到这种待遇。(1992年11月17日)

哥伦比亚

转交给政府的资料

112.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8月21日的一封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已收到了关于下列据称在哥伦比亚发生的酷刑案件的报告:

(a) 1991年3月5日,Jaíme Ramírez Corzo、José del Carmen Najas和

Omar Merchan 在阿劳卡的埃斯梅拉尔达被一只军事巡逻队逮捕,他们被指控是一游击队团伙的成员。他们被剥光衣服、遭受酷刑和死亡威胁。Jaíme Ramírez 头被强迫喝盐水、丝毫不能让喘息。他被迫躺在地上、一名士兵踩他的肚子。释放前要求他们在一文件上签名,说军队处理恰当。

- (b) 1991年9月28日, Harold Alexander Jaramillo、Raúl María Salazar Villareal、Estanislao Anaya 和 Nelson Jaimes Quintero 在桑坦德的巴兰卡韦梅哈被国家警察人员逮捕。 他们被带往警察局接受审讯。因回答不善,他们被关押进水箱、剥光衣服、捆绑起来,稍后又遭毒打。他们的鼻子和嘴被盐水浸泡过的毛巾盖住,遭到电压达220伏的电击。 他们不断受到被强奸的威胁。就 Anaya 先生和 Quintero 先生的案件已进行了调查,对有关警察采取了纪律行动;
- (c) Norman Alexander Trujillo Correa 和 Alberto Alarcón Salcedo 都是学生,于1991年11月2日在 El Zulia(桑坦德北部)La Angelita街 Carlos Rosas 商店中被马萨机械化部队的士兵逮捕。 他们被迫绑住双手躺在地上。他们嘴里被塞进湿毛巾不让呼吸并遭到毒打。士兵踩他们的肚子;
- (d) Hugo Varela Mondragón 是律师、记者和人民住房组织全国委员会的会员, 于1992年4月21日在帕尔米拉(山谷)被两名自称是F-2成员的武装人员扣押。第二天在 Jamundi 的 Puente Velez 发现了他的尸体,上面有受酷刑的迹象;
- (e) Pablo León 是种植园经理,于1992年7月19日在马格达莱纳 Medio 的圣维森特附近遭到了第二机动旅士兵的拷打。士兵威胁要杀死他。已向市检察院提出了申诉;
- (f) Samuel Fernando Rajas Motoa 是考卡山谷省联合工人组织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和卡塔戈市工人联合会会员, 于1992年6月4日被驻扎在卡尔达斯省马尼萨莱斯的阿亚库乔营的情报股(B-2)人员从家中带走,送往 Ansema 军事基地。他在那里遭到酷刑、死亡威胁和假处决。他随后被送往里萨拉尔达省佩雷拉的圣马特奥营。他在那里还受到审讯、死亡威胁和不许睡觉;
- (g) Jose Delfin Torres Castro 是桑坦德省 El Cerrito 的 Tabeta 的警察巡官,据报于1992年6月9日在遭受 Garcia Rovira 营所属军事巡逻队酷刑后被处决;
- (h) Oscar de Jesus Silva Gutierrez 是声援政治犯委员会会员和学生领袖,于1992年5月1日在卡利被国家警察人员拘留,并受到他们的拷打和威胁;
- (i) 1992年6月22日, 国家农民土地使用者协会主席和 Chucuri 人权组织

会员 Gabriel Flores Oviedo 在桑坦德省 San Vicente de Chucuri 的 Montebello 被士兵逮捕。他在受审时遭到酷刑。

113. 特别报告员也收到了关于 Yolanda González Villamar 女士案件的资料。她是好牧羊人国家妇女监狱的囚犯。她于1992年2月8日因中暑死亡。据收到的资料, González Villamizar 女士健康状况一直很差,但未被允许出狱接受适当的医疗。她在狱中几乎或根本未得到治疗。

114. 根据第1992/59号《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合作》的决议,特别报告员就收到的关于 Cesar Chaparro Nivia(工会分子和爱国联合会会员)和 Vladimir Hincapié Galeano 的案件的资料,向政府发出紧急呼吁。1992年2月29日,这两人在波哥大肯尼迪区被行政安全部门的人员逮捕,并带往部门所在地。Chaparro Nivia 在被捕时被子弹击中。在大约下午5点,Hincapié Galeano 先生得到允许去 San Juan de Dios 医院,据报他因遭酷刑受伤。第二天12点35分,Chaparro 先生也被允许去医院。据证人说,安全部门人员一直在看守着两人、阻止他们与家人说话。Chaparro 先生于3月4日死亡。他曾告诉一名护士他遭受了酷刑,要求她告知检察官办公室。3月18日下午6点30分,他的妻子 Margarita Agudelo Alzate 和她的弟弟Hernando Agudelo Alzate 接到匿名电话以死亡相威胁。据报这一威胁是由于这家人就 Chaparro 先生的死亡向检察官办公室提出申诉所引起的。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先前报告所载案件的资料

115. 1992年7月21日,政府就 Emiro Bustamente 先生的案件做出了答复,他于1989年2月10日在苏克雷省被拘留。此案于1990年6月6日被提请政府注意(E/CN.4/1991/17,第49段)。答复指出,Bustamente 先生于1989年2月11日在 San Benito Abad 警察局被警察逮捕,第二天获释。人权办公室认为,关于 Bustamente 先生受酷刑的指称不令人信服,1992年5月4日作出决定不准进行正式的纪律调查并命令将此案归档。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委员会第1992/42号决议的资料

116. 政府在1992年7月24日的信中报告说,国外的各种暴力团伙直接阻碍了享受《世界人权宣言》和诸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文书中宣布的权利。这些行动除了造成物质损失外,严重影响

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还对所引述文书中规定的权利造成各种影响。许多受害者都是知名度高和很受尊敬的政治工会和公民领袖。

古巴

转交给政府的资料和收到的答复

117.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8月21日的信中通知政府、他已收到关于古巴各种酷刑和虐待案件的资料。政府在1992年11月2日的函件中做了答复。

118. 所提到的某些案件涉及东部综合监狱的10名囚犯,列举如下。

119. 1991年11月9日, Jesus Hernandez Luis 因要求较多的食物,头部受到木棍和电棒的重击。他尽管受了伤,却得不到治疗,还被送往一个惩罚间。

120. 政府报告说,关于此犯人未发生任何事件。监狱记录中看不出此事件的迹象。犯人说他从未被置于惩罚间中,也未受虐待。

121. 1991年11月, Luis Enrique Ramos 因要求较多食物,便被带上手铐,遭电棒击打直至昏迷。

122. 政府报告说,监狱记录中没有符合这一描述的囚犯。

123. 1991年12月2日, Leonel Baro Abscal, Pedro Eduardo Caseira, Rene Téllez González 和 Leonardo Mascaquel Gómez 遭警棍、棍棒和水笼软管的毒打。Leonardo Mascaquel 一支手臂被打断。

124. 政府报告说,1991年12月20日,所提到的囚犯和其他同屋囚犯在牢房中制造混乱。监狱当局审查了罪魁祸首(Casellas Díaz 和 Téllez Gonzalez),劝说他们停止行动,这事便告一段落。没有受害者,也无人受伤。

125. 1991年5月21日, Daniel Drito Vázquez 遭到一些新兵的警棍拷打,不得被送往监狱医院。

126. 政府报告说,监狱记录中没有符合这一描述的囚犯。

127. 1991年4月28日, 1号楼特别区的一名囚犯 Jose Ramon Morales Hernández 遭到此区的看守长 Alejandro 警官的橡胶棍棒拷打。他腹、肩和胸部出现血肿。

128. 政府报告说,此囚犯攻击一名监狱看守,被后者使用执法警棍打退。因纪律法庭裁定可以在不使用警棍的情况下制服此囚犯,所以对这名看守采取了纪律行动。Morales Hernandez于1991年9月13日被释放。

129. 1991年5月4日, Carlos Font Reyes 在2号楼特别区遭到 Erasmo看守和其他士兵用橡胶警棍的拷打。

130. 政府报告说,监狱记录中没有符合这一描述的囚犯。

131. 1991年12月27日, Santiago A.Miranda Castillo 遭毒打。左颊上的伤缝了三针。他右臂骨折,失去知觉并被送往监狱医院。

132. 政府指出,囚犯名叫 Santiago Miranda Rodríguez,他未卷入任何事件。1992年12月26日,他因左肘受伤接受了治疗。受伤不是因暴力造成的,而是出于意外。

133. 特别报告员也向政府转交了有关下面11起案件的资料。

134. 1991年4月, Remedios 的 Noel Toledo Delgado 遭到比亚克拉拉省级监狱三科一名看守的棒击,腹部被踢。

135. 政府指出,这名囚犯在省级监狱中被一名看守殴打。这名看守接受了纪律法庭的审判并被解职。这名囚犯未因此事留下后遗症。

136. Remedios 的 Arnaldo Pérez Martí 在比亚克拉拉省级监狱遭到 Juan de la Cruz 中尉指挥的一伙卫兵的拷打。这名囚犯被单独监禁、两次失去知觉。

137. 政府报告说,这名囚犯多次被判罪,几次违反监狱纪律。1991年2月,一名看守指出他违反监狱纪律,他便攻击这名看守。他被监狱当局制服,有关法庭判了他三个月的额外监禁,也即对打人的惩罚。

138. 1991年3月14日,Caibarién 的 Raul Figueroa Castro 在比亚克拉拉省级监狱中遭到班长 Joaquin Calloso 指挥的10名内务部卫兵的毒打。班长踢他的嘴,造成上唇受伤,缝了三针。其他用棍棒和大砍刀打他的看守是 Savino González Rodríguez、Gustavo、Machín、Omar、Marin 和 Mesa。随后,他被锁进一个惩罚间。

139. 政府报告说,1991年3月14日,这名囚犯在比亚克拉拉省级监狱中攻击并打伤了一名看守。其他看守干预制服了这名犯人。犯人随后被释放。

140. 1991年2月初, Antonio Serrano, 也即 Tony Arcenta, 在卡马圭的基洛第7监狱被 Llero 警官毒打。囚犯不得被送进监狱的加强治疗科。

141. 政府指出, Rodríguez Serrano 因犯有各种罪行--包括谋杀、打人和偷盗,接受了11次审判,他正在服期间为30年的徒刑。1992年2月6日,他与另一名囚犯发生争吵,用一件粗钝武器将对方脸颊上砍了一个12厘米长的伤口。监狱当局进行了干预。在恢复秩序后, Osvaldo Yero Cervantes 警官超越权限打了囚犯。囚犯被送往省医院接受治疗。Yero Cervantes 警官被判六个月监禁。Rodríguez将因打

人受审判。

142. Bernardo Cruz Pérez 在 Alambrada de Manacas 监狱受到 Alexis Olivera 警官和 Humberto 看守的严重拷打。他不得被送往医务室接受治疗。后来,他再次遭毒打。他遍体鳞伤,得不到治疗并被关在惩罚间里。

143. 政府指出,Manacas监狱中有一名囚犯第二个姓是 Mena 而不是 Pérez。他未卷入与看守有关的事件。这得到了监狱记录和囚犯本人的证实。

144. 1991年5月,Boniato 监狱的一名囚犯 Daniel Cardó Hernández 遭毒打。后来,他被带到哈瓦那警察总局、又被紧急送往 Carlos J.Finelay 军事医院。

145. 政府指出,该囚犯在所指明的日期以及这之前或之后未遭殴打。

146. Canaleta、Giego de Avila 监狱的一名囚犯 Jorge Nuard Rodriguez 向自己手臂注射油以期接受治疗。他不但未得到帮助,反而被送进惩罚间呆了12天。1991年6月7日下午两点,他被送出牢房、昏迷不醒、两臂有坏疽。他的双臂不得不从肩处截去。

147. 政府指出,这名囚犯注射油,希望这种伤害使他获得释放。他先是在省医院、后在 Morón 医院得到迅速治疗。因坏疽引起的败血症扩散造成死亡危险,不得不截去他的双臂。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他随后得到释放。

148. 1991年6月27日,比亚克拉拉省 Manacas 的 Pedro Luis Garcia 在 Alambrada de Manacas 监狱被 Alexis Olivera 警官用警棍殴打。其他看守用橡胶警棍殴打他。他遍体是伤,被关在禁闭间中。

149. 政府指出,这名囚犯在 Manacas 监狱时未遭监狱当局虐待。现已出狱的Pedro Luis Garcia 已证实了这点。

150. 1991年4月30日,圣克拉拉的 Marío Santana Fontela 遭圣克拉拉省级监狱第二科的一名看守卫兵毒打。

151. 政府指出,1991年4月30日,这名囚犯不服从命令、拒绝回牢房。他攻击一名看守,看守不得不使用执法警棍自卫。调查此事的法庭发现看守执行任务和自卫时采取行动、将囚犯制服。他未超越任务权限。

152. Francisco Martes Sánchez,16岁,El Cerro人,Jovellanos 监狱的一名囚犯。尽管他有气喘病,还是被迫做下蹲动作。他因拒绝而遭毒打,被紧急送往 Colon医院。1991年7月20日,他在医院死亡。当局声称他死于气喘病。但送他去医院的人中有一位称他死于头部受击造成的脑出血并称他身体布满血肿。

153. 政府指出,囚犯的正确名字是 Francisco Montes Sánchez。记录、证人

证词和文件都表明,他被送往一个医疗中心,可以在那里接受严重发作的气喘病的治疗;他在医院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亡。解剖证明气喘病发作造成了这次死亡;未发现任何外部暴力迹象。

154. Ifraín Suárez Lezcano, 一名圣克拉拉监狱的囚犯, 受到 Héctor Morales Otero、Iosvani Calloso、Osmany Mederos Gutierrez 和 Miguel López Montero 等一伙卫兵的水笼软管抽打和脚踢。

155. 政府指出, Efrain Suárez Lezcano 和另一名犯人在玩被禁止的游戏时发生争吵。监狱当局进行了干预, 在行使职责时未过度使用武力。

156. 特别报告员也通知政府说, 他已收到东部综合监狱拘留条件恶劣的报告, 包括拷打和一些患艾滋病的囚犯得不到医疗和药物治疗等情况。他们的名字是: Oscar Pérez Celles、Ismael Duquesne Arteaga、Heriberto Pedro Almeida、Abel Martínez Marto、Ariel Rodríguez Leon、Lázaro Valdés Ramírez 和 Güilfredo Reinaldo Aguilar García。

157. 政府指出, 1992年7月11日, Ismael Duquesne 在哈瓦那的 Miguel Enríquez 国民医院死于艾滋病。1992年7月8日, Abel Martínez Matos 在服满刑期后被释放。监狱和医院记录中未发现名叫 Lázaro Valdés Ramírez 的犯人。Oscar Pérez Celles、Heriberto Pedro Almeida、Ariel Rodríguez León 和 Güilfredo Reinaldo Aguilar García 在狱中接受了同其他艾滋病患者在国家健康系统医院中接受的相似的治疗。这包括增加饮食营养和给予专门的医疗和药物治疗。所提到的犯人中无一受到监狱当局的殴打和虐待。

吉布提

转交给政府的资料

158.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8月21日的信中通知政府, 他已得到关于吉布提大多数政治案件中被捕的人在经预审后不久遭受酷刑的指称。酷刑通常是由情报和安全部门, 如 Ambouli 旅, 也称 Villa Christopher 旅或北方旅的人员施行。犯人通常在被拘留时受到酷刑, 该时不允许他们的家人、律师或医护人员见他们。

159. 使用酷刑看起来主要是引诱在押犯提供指控他人的供词, 并在负责检查的法官面前使用。被警察拘留后由检查法官进行的审问是在安全部队人员出庭的情

况下进行的,而恰恰是他们要对受审的人实行虐待和酷刑负责。据称在大多数情况下,司法警察人员在犯人从拘留中心去检察部门的路上威胁他们,即如果他们不确认已在被拘留期间签名的供词就对其实行进一步的酷刑。

160. 最常用的酷刑方法有:将瓶子硬塞入肛门、香烟烫伤、击打(特别是生殖器)、电击、悬挂(将犯人手脚捆在一根架在支架上的杆子上)。犯人口被塞住,遭绳、水笼软管和棍子击打。让犯人保持这种姿势,受侮辱;受害者被迫吞下塞口物中浸满的液体,几乎窒息。使用的液体包括:肥皂水、脏水和漂白剂。注意到了三个具体案件:

- (a) 1990年8月,一位外交部官员 Kassim Ahmed 和一位银行经理 Ali Couba 因拥有批评政府和鼓吹多党制的传单而被捕。前者在北方旅营部被拘留期间被捆在一根杆子上,站在一把椅子上;这样如果他从椅子上走下来就会被吊在杆子上。Ali Couba 被悬吊、拷打和电击;
- (b) 1989年4月, Houmed Dini Ali(也即 Lakisso)在塔朱拉被捕。由于在被警察拘留期间受到虐待,他的颞和一根肋骨折断。

多米尼加共和国

转交给政府的资料

161.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9月7日的一封信中通知政府,他已收到有关圣多明各自治大学文化促进处处长 Felipe de Jesús Medrano García 案件的资料。他在家中被国家反伪造警察小组的人员逮捕并被送往警察局,一直被关押到1月24日才获释。他身体各部分,包括臀部和生殖器遭木棒击打。他左耳也遭橡胶警棍的击打。

赤道几内亚

转交给政府的资料

162.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8月21日的信中通知政府,他已收到关于下列人员因遭酷刑而死亡的资料:

- (a) Alberto Alogo, 基埃·恩特姆省埃贝比因的 Ndumu Eseng 人。他于1990年初死在巴塔警察局。

(b) Diosdado Abaga Nvo, 基埃·恩特姆省埃贝比因的 Milee Nsomo 人。

1991年7月5日, 他在被马拉博警察拘留后死亡。死亡证明指出死亡原因是: 全身, 特别是胸部和腹部瘀血、多处受伤和血肿。

163. 特别报告员也收到了关于 Nicolas Masoko Elonga 先生案件的资料, 他是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1991年12月16日至24日被警察拘留。他被捆住用棍棒抽打、直至昏迷。

164. 特别报告员也为下述人员向政府发出紧急呼吁, 因为提供消息者说, 他们处于受酷刑或虐待的危险中。呼吁的日期写在各案件摘要后的小括号内。

165. Plácido Miló Abogo(社会民主集中党的发起人)和Pedro Motu Mamiaga 在马拉博被捕, 日期分别是1992年2月9日和23日。他们被送往摩洛哥士兵使用的军营。目击者说, Plácido Mikó Abogo 在遭八名警察毒打严重受伤后被送走。Dedro Motu Mamiaga 曾经根据普遍大赦法获释, 仅仅几天后又遭逮捕。(1992年2月27日)

166. 1992年6月10日下午, Pilar Mañana 她在马拉博拥有的酒吧中被安全警察逮捕。报告指出, 她因拥有反对党“社会民主集中党”的出版物而被捕。另一原因可能是她的亲属 Jose Nuumba Mañana 是反对党成员。他本人也在1992年5月被捕, 不久被释放。(1992年6月30日)

埃及

转交给政府的资料和收到的答复

167.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9月4日的信中, 向埃及政府转交了一份各主要指责的摘要, 这是有关在埃及实行酷刑的作法以及一些个别案件的。除此之外, 特别报告员为一些人发出两项紧急呼吁, 因为根据得到的消息, 他们处在遭受酷刑的危险之中。

(a) 转交给政府的有关施加一般酷刑的资料

168. 特别报告员得知, 普通警官在警察局以及国家安全情报局的官员在其设在开罗和各省的总部、甚至在像 Tora 这样的监狱中实施酷刑已成警察作业的惯例。实施酷刑的目的是逼取供词或惩罚政敌和嫌疑犯。

169. 据报, 在前总统安瓦尔·萨达特1981年遭暗杀后和由于一些政治伊斯兰

组织制造暴力事件,埃及实施了国家紧急状态,酷刑也随之恢复。过去十年,涉嫌属于这些组织的人占了酷刑受害者的大多数。

170. 然而,酷刑不仅施加于涉嫌的伊斯兰积极分子;它的受害者也包括涉嫌属于纳塞尔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的人,被指控怂恿穆斯林皈依基督教的基督徒和皈依了基督教的穆斯林。酷刑受害者也包括记者、律师、工人、医生、工程师、大学和中学学生及学童。巴勒斯坦居民和访问者也在埃及成为酷刑的受害者。

171. 除了政治案件,据报道,埃及公民在警察局每天都受到非人道的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在调查普通案件和审讯嫌疑犯时,酷刑和虐待已成为警察的习惯作法。

172. 酷刑的方法包括:用燃烧的香烟头烫受害者的身体,用鞭子、皮带和硬物抽打,以极度不适的姿势长时期悬吊--有时导致暂时或永久瘫痪,对生殖器和人体其他敏感部位施行电击。酷刑通常还伴有其他形式的侮辱,包括漫骂、威胁杀死受害者、强奸他或他的妻子或女性亲属。国家紧急状态立法允许的长期单独监禁为实施酷刑提供了便利。

173. 收到了特别是有关 Tora 监狱已被判罪的犯人、行政拘捕人员和受保护监禁犯人遭受侮辱情况的资料。这些侮辱包括鞭打和单独监禁, Tora 监狱当局广泛使后者而不用遵守法律规定的界限。此外,拒绝犯人在监狱院内白日放风和家人探视,以此虐待他们。还有,许多政治犯经常在深夜被移送出狱,送往设在 Lazoughly 的国家安全情报局总部,在那里遭受酷刑。犯人在受到监禁的前期最易受到这种待遇。

174. 受到指控和宣称遭受酷刑的政治监禁犯可以在 niyaba(国家检察院)或审判法院的要求下由法医进行检察。然而,未受指控和审判的行政拘留人员通常没有机会所遭受的待遇各主管当局提出申诉。

175. 医疗检查常常是在指称的酷刑发生很长时间后才进行。然而在某些案例中,法医能够得出结论,即政治监禁犯身体上的疤痕与他们描述的酷刑方法和所称的酷刑发生日期是一致的。

176. 特别报告员也收到了批评,1965年《关于监狱制度的第396号法》的报告,此法第43条第7款允许鞭打犯人作为纪律处罚;可以鞭打惩罚犯人,但不超过36下;如果犯人年龄在17岁以下则用细棍棒代替鞭子,但抽打不得超过10次。将犯人半裸着身体捆绑在一个木制结构上的鞭打惩罚适用于所有监狱,包括 Tora 监狱。此外,第396号法也允许将单独监禁作为对犯人的纪律惩罚,但将一次单独惩罚限制在15天之内。据所得到的资料, Tora 监狱经常超过这一时限,有些被拘留者的整个行政拘留期都生活在单独监禁中。

177. 根据报告,酷刑受害者通常并不提出正式申诉,要么因为他们并不相信会采取什么步骤进行调查,要么就是害怕报复。公诉部门认为仅仅记录一下对身体虐待痕迹观察的情况就行了,而并不作出认真努力追究肇事者。

(b) 转交给政府的个别案件

178. Mohammad Mu'taz' Ali' Abd al-Karim于1990年被逮捕和遭到酷刑时才15岁。他5月份第一次被关押了两个月。他仅仅自由了两周,便又遭到逮捕,并一直被拘留到1991年1月4日。这段时期,他被国家安全情报局拘禁在明亚、上埃及和开罗外的 Istiqbal Tora监狱。他被单独监禁在一个地下室房间中约一个月。他被蒙住双眼,捆住手脚。据报,他被剥去衣服,头朝下吊在一根搭在两张桌子上的横杆上。两只脚底板被打坏。脚肿时,就让他跑步或向脚上浇凉水以使肿胀消退。

179. Hana' 'Ali Farrag于1990年7月底在明亚家中被逮捕时,她是个才17岁的学生。她被头朝下吊在一个横杆上,脚底被用一根粗木棍抽打。

180. 在人民议会议长被暗杀后的大规模逮捕中,Ahmed Isma'il Mahmoud博士系一位医生,于1990年10月17日遭逮捕,并被指责与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最初他被关押在 Gaber bin Hayyan大街的国家安全局中心,他被蒙住双眼、剥去衣服,手脚紧紧地捆在一起。据说他脸被痛打,生殖器遭电击。据报,他一个人呆在一间肮脏的房子里,没有食品,没有衣服,这种情况持续了四天。他被送到 Abu Ia'abal监狱,呆了11天。后来被转送到国家安全情报局 Lazoughly广场总部。据报,酷刑特别是电击在这里继续使用。

181. Mohammad Khalaf Youssef是位教师,于1990年12月15、16日的夜间在艾斯尤特家中遭到逮捕。拘留期间他遭到严重拷打,妻子受到酷刑的威胁。他身体的敏感部位遭到电击并被捆住手腕吊起来。

182. Adel Sayyid Qassim Sha'ban 因为与1990年10月人民议院前议长遭暗杀有牵联而于1990年11月被捕。拘留期间,他身体的许多部位遭电击并从捆在身体后面的手上吊起来。

183. Al-Shadhly Ebeid Al-Saghir律师1991年9月9日在萨法加被安全部门密探逮捕并带往胡尔加达的中央安全部队营地。在转往 Istiqbal Tora 监狱之前他受到毒打,电击和悬吊。他曾于1991年6月7日被捕并遭受酷刑,右臂因而暂时瘫痪。

184. Abdel Moneim Gamal al-Din是 al-Shaab周刊的一位记者,1989年9月被传呼到了吉萨的国家安全情报局总部,并从那里蒙住双眼被带往 Lazoughly。他在

那里被蒙住双眼、受几位官员的酷刑和审讯达几个小时。酷刑使用了对身体敏感部位的电击和拷打,导致手、大腿和脚受伤和浮肿。

185. Talaat Fouad Qassem, 一位工程师, 1988年至89年多次被捕。在 Istiqbal Tora 监狱, 他被单独拘禁在惩戒楼的一个极小的房间里, 除一个小孔外, 所有的通气孔都被堵死。他得不到健康食品、干净水、必要的医疗、床和被, 每天只允许几分钟的时间出房间上厕所。他还在每天早上1点至4点被带往国家安全情报局 Lazoughly 总部, 在那里遭受有组织的酷刑。Lazoughly的酷刑包括: 严刑拷打、拔胡须、使用电击。

186. 曼苏拉的 Muhammad Rashad Abdurrahim al-Imam被逮捕, 并在家人面前遭毒打。他因此左耳变聋, 左肩脱臼。他也遭到电击。

187. Kassab Mohamed Abbas 于1988年3月11日被逮捕, 并被指控搞组织发动政变。被逮捕后, 他被绑进一只颠倒吊起来的椅子上。他就在这样的姿势下被鞭子和皮带抽打。然后, 他被送往 Abuza'abal监狱拷打, 又送往 Tora 监狱单独监禁了13个月。

188. Tal'at Fuad Qassim, 一位工程师, 1988年多次被捕, 并被关押在国家安全情报局 Lazoughly 总部、Tora 监狱和其他一些地方。他被长期单独监禁并反复遭拷打和电击。

189. 明亚的 Atif Jamil Mahmoud 1992年2月5日被一只20人的安全部队逮捕。他被带到明亚的新的国家安全情报局大楼。据报道, 他被带上手铐、躺在地板上遭受电击、几小时后他被释放, 但已不能移动手臂和小便。

190. Ahmad Thabet 17岁, 于1991年11月27日艾斯尤特被捕, 一直拘留到1992年2月6日。他首先被单独监禁在艾斯尤特的当地国家安全情报局办事处, 后被监禁在城外中央安全部队营地。据报, 他有好几次被浸入水中并立即遭受电击。有一次, 把他的手铐在身前, 捆住脚腕, 腿下放一根木杆, 吊在两把椅子之间, 然后抽打他的脚底板。他也被吊在一扇门上, 手从身后铐住, 施加酷刑的人则不停地将门开来关去。

191. Ahmad Fathey Hafez 17岁, 于1991年11月20日在明亚的学校中逮捕, 未经任何指控一直关押到1992年2月5日。他在明亚国家安全情报局的新大楼中遭到电击。

192. Fathiyya Sayyid Muhammed 1992年2月遭逮捕并送往国家安全情报局 Lazoughly 总部, 她在那受到侮辱, 脸部被打和受到电击。

193. Hani Abdel-Magd Haneh Saim 于1992年10月在开罗北部的坦塔被捕并送到国家安全情报局大楼。据报道, 他被拷打, 扇耳光和遭到电击。

194. Medhat al-Sayyid Ahmad于1991年11月15日在艾斯尤特被捕并送往中央安全部队营地。据报道,他被短时间地吊在一扇门上,浸入热水和凉水中并遭到电击。同时还用铁链捆住手腕把他吊在天花板上。

195. Khalid Sayyid Mahmoud 于1991年11月16日在艾斯尤特被逮捕,先被送往艾斯尤特警察局和国家安全情况局大楼,后又送往艾斯尤特外边的中央安全部队营地。

196. Khalid Muhammed Ahmad Omar 是亚历山大城的土木工程师,于1991年10月25日被捕,几天后被送往 Lazoughly。他在那里受到拷打,乳头和生殖器遭到电击。他手被拷住并捆在一扇窗子的金属栏杆上,脚刚刚能触到地,一直持续了五个小时。

197. 除了上面所讲的,特别报告员还代表下列人士发出紧急呼吁,因为担心他们可能会遭酷刑。发出这些呼吁的日期在摘要之后的园括号内标了出来。

198. Haron Talha 医生因为治疗了两名被警官射伤的人而在 Domyat 州被捕。尽管检察官已命令释放他,但他还是根据紧急法被逮捕(1992年1月9日)。

199. 1992年4月8日,政府报告说 Haroun Talha已在1991年12月22日被捕,因为怀疑他窝藏被指控在达米埃塔省攻击 Mutawi Abu Naga中校的若干在逃犯。1992年2月他被保释释放。未发现他遭受酷刑的证据,因为他未向主管当局提出任何申诉。

200. 国家安全人员1992年2月5日在Heliopolis的Hijaz大街186号 Salsabil 计算机公司总公司逮捕了 Hassan Izz ed-Din Malik、Muhammad Khairat al-Shatir 和 Taher Abdel Moneim,将他们带往 Tora 监狱,怀疑他们是 Ikhwan al-Muslimin 组织的成员(1992年3月2日)。

(c) 前面报告所提到案件的补充

201. 特别报告员在前面提到的1992年9月4日的信中向埃及政府转交了下述案件的补充资料:

- (a) Mohammad al-Sayyid Higazi。1991年9月23日,特别报告员为他发出紧急呼吁,埃及政府1991年11月19日给予答复(见E/CN.4/1992/17号文件,第76-77段)。根据收到的补充报告, Mohammad al-Sayyid Higazi 在开罗的国家安全情报局 Doqqi 分部和开罗的 Lazoughly 广场国家安全情报局总部遭受了几个星期的酷刑。他先是于1991年8月18日被

拘留在 Doqqi, 据报后来被转送到 Istiqbal Tora 监狱。几天后他被送回 lazoughly 广场的国家安全情报局总部, 据称他在那里又被关押了两个星期并遭受酷刑。随后他被送回监狱。酷刑方法包括电击身体敏感部位和长时间捆住手腕悬吊。

- (b) Afifi Matlar 1991年10月18日, 他的案子转交给了政府。1991年10月24日, 政府报告说没有任何向司法当局提出有关他遭受酷刑和虐待的申诉(见E/CN.4/1992/17号文件, 第84和86段)。1992年1月26日, 政府再次报告说, 因为 Muhammad Afifi Amer Matlar 从事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已于1991年3月2日出于安全原因对他采取了特殊措施。但他于1991年5月9日被释放, 没有证据表明他在拘留期间受到任何形式的酷刑。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补充报告表明, Matlar 先生的律师已将酷刑情况通告了总检察官和法院, 但未见采取任何行动。

202. 至于特别报告员1991年10月18日转交的有关 Mamdouh Ali Youssef 妻子的案件(见E/CN.4/1992/17, 第85段), 政府于1992年1月26日报告说, 没有找到有关她因受到酷刑而流产的证据。在她丈夫被捕时间前后, 她因所提到的怀孕生了一个孩子。

萨尔瓦多

转交给政府的资料

203.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8月21日的信中通知政府, 他已收到关于下列酷刑案件的资料:

- (a) Vlises Arnulfo Rivas Hernandez 18岁, 在圣萨尔瓦多被国家警察逮捕, 遭受了三天拷打。实施酷刑者威胁要杀死他、还不让他睡觉。
- (b) Hugo Ernesto Sanchez Rosas 鞋匠, 于1991年6月6日在圣萨尔瓦多的伊洛潘戈区的 del Ejercito 大街上被国家警察逮捕。他被带往中央兵营, 关进一间极冷的屋子遭到毒打。
- (c) 1989年9月11日, Carlos Baltazar Recinos Cortez 在松索纳特省亚美尼亚城被国家卫兵逮捕。他被带往国家卫兵驻地并遭受酷刑, 如电击左乳头和使用“称量器”(将一塞满沙子或其他重物的容器拴在睾丸上以造成巨痛)。实施酷刑者不断威胁要杀死他。

从政府收到的有关委员会第1992/42号决议的资料

204.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政府的一些来文，其中按时间顺序列举了 Farabundo Marti 全国解放阵线1992年对生命和财产进行的一系列袭击。

希腊

转交给政府的资料和收到的答复

205.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8月21日的信中告知希腊政府，他已得到有关这个国家酷刑做法的资料。政府1992年10月30日对这封信做出答复。

206. 根据这一资料，执法官员在个人或一批人受拘禁时虐待和对他们施用酷刑。对此负有责任的部门据说是负责刑事调查的安全局和执行一般警务的正规警察。还据报，被拘留者在审讯结束和在供词上签名之前，经常无权和律师接触。另一方面，希腊法律不保证一个人在被警察拘留初期会见亲属和朋友的权利。被拘留者是否有权接触亲属由负责审讯的警官自行决定。据称，此种法律缺陷导致了酷刑的施用。

207. 除上所述，许多据称给受拘禁的人造成严重伤害的官员很明显未受到惩罚并继续执行任务。同时，当受害者或他的律师提请司法官员注意所称的酷刑和虐待行为时，这些官员看起来并没有充分调查这种指称，在有些情况下，未能采取适当的行动。一共报告了下面21起个别案例。

208. Dimitris Vavatsikos 和一个朋友1990年2月5日在雅典市中心被捕。据报道他们受到E警察局警察的木棍拷打和谩骂。

209. 政府就此案报告说，Vavatsikos 先生是一群示威者中的一个，他们被捕后，先被送往雅典第4警察局，后又被送往阿蒂卡的安全处。他在这些地方即未提到任何伤害，也未要求医疗检查。警察也未见到任何明显的虐待迹象。警察对 Vavatsikos 先生和所有其他人的行为是合法的和适当的。他可能受到的伤害是因参加骚乱造成的。他在骚乱中逮捕，毫无疑问，伤害在他被捕前就造成了。很明显，Vavatsikos 先生是在警察与示威者的冲突中受伤的。

210. 1990年2月5日，Kostas Stamateas 在雅典 Omonia 广场附近被捕。他被强行推入警车，据报道受到木棍击打和谩骂。医疗报告证明了他脸上、头上和身

体其他部位的擦伤、肿胀和瘀伤。

211. 政府就此案报告说, Stamateas 先生和两个同案犯因破坏《军队法》被捕, 并由 Vlavogilakis 警官送往阿蒂卡的安全处。警察官员在三人的转送和拘留期间的行为是合法的和适当的。Stamateas 先生的任何伤害都是因为参加他被逮捕的那次事件造成的, 很可能是在警察和示威者的冲突中造成的。无论如何是在他被拘留前造成的。他的两个同案犯未提出任何有关虐待的申诉, 他本人也未对警察官员提出申诉。

212. 1990年3月24日, Sotirios Kalogrias 和一个朋友在 Exarchia 广场被捕。他们被推入一辆警车、遭到约15名警官的拳击和谩骂。他们随后又被戴上手铐送往安全警察总部, 据称, 警官在那里继续打 Sotirios Kalogrias 的脸部。

213. 政府答复说, 尽管法医将 Sotirios Kalogrias 身体伤害定为轻伤, 雅典的检察官已对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警察开始了法律诉讼, 根据现行的刑法, 此种行为要受到严重的刑事惩罚。1992年7月24日, 两名警察被判受审, 将在1993年10月6日举行。如果他们被定罪, 将被施以有关的纪律性惩罚。

214. Sehms Ukus 是库尔德人并为土耳其公民, 1990年7月4日在雅典市中心被警察逮捕。据报道, 他被带往一高地区, 剥光衣服, 吊在树上。后来他被放下来, 用香烟打火机烧、用棍棒打击他的脚底和生殖器。

215. 政府答复说, Ukus 先生向检查官办公室对三名警察提出申诉。在相应调查结束后, 申诉因无根据而被驳回。Ukus 先生也因此未得到法医的检查。他未就此决定提出上诉。由公共秩序部下令, 阿蒂卡的安全处执行的调查得出的结论也是否定的。

216. 1991年1月16日, Pantelis Tsoumbiris 在雅典被两名警察逮捕。他们用警棍打他的头、脚、背和生殖器。他们随后又把他带往G警察局继续拷打。

217. 政府答复说, 雅典治安法院的检察官因 Palskovitis 巡官和 Theofilopoulos 和 Ntovros 警官给 Tsoumbiris 先生造成轻度身体伤害和进行谩骂而开始了对他们的法律诉讼。Tsoumbiris 先生可以在审判中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除此之外, 公共秩序部在进行行政调查的基础上, 断定这三名警察违纪并对他们施以罚款。

218. Suleiman 是土耳其难民, 因涉嫌是贩卖毒品者而于1991年1月21日在雅典被捕。他随后被送往雅典的KAT医院, 因一小肠破裂施行了手术。据报道, 医院发现他三根肋骨断裂、头骨和大脑严重损伤、身体大面积擦伤、生殖器也受伤。他于1月29日死亡。

219. 政府报告说, Suleiman Akyar 的受伤和死亡促使公共秩序部和主管警察当局迅速做出反应。从第一刻开始, 就保证满足对这一案件进行仔细、客观地司法和行政调查的所有要求。司法调查是由雅典第十九正规检查法院进行的。行政调查发现, Akyar 的死是由于警察在自卫时对他打击引起的身体伤害, 警察使用了相似的方法。然而, 什么是防卫的必要限度, 把此事的判断留给法官被认为是合适的。如此事件涉及的警察被判罪、那么他们也将被处以相应的严厉的纪律处罚。

220. 1991年4月7日, Vasilis Makrinitzas, Vasilis Makripoulias 和 Argyris Kavatas 在提佛的安全警察局受到拳打、脚踢和转轮手枪的威胁。其中一个人的脸被香烟烫伤。

221. 政府报告说, 1991年4月11日, Vasilis Makripoulias 和 Argyrios Kavatas 同时来到提佛的警察局, 并宣誓作证说他们希望撤回对两名警官的指控, 不希望他们受到惩罚, 并补充说, 他们1992年4月7日(他们提出申诉的那天)酒后做出这种事。然而, 公共秩序部还是在1991年4月9日下令进行了一次行政调查, 1991年4月25日完成。结果表明, 警官在上诉人被捕和拘留期的行为是正确的、因而未对他们采取纪律措施。

222. Artan Malaj 17岁, 阿尔巴尼亚人, 1991年5月3日被警察逮捕送往雅典亚历山大大街的安全总局。监禁期间, 他的头和腹部被殴打。

223. 政府报告说, 根据雅典地方法院检察官下令进行调查的初步结果, Malaj 先生因从所骑的偷来的摩托车上摔下来受伤。检察官据此认为这一申诉毫无根据。根据对 Artan Malaj、有关公民和警官的口供, 医疗检察报告和案件诉讼情况的文件等进行了行政调查, 结果表明, 除其他事项外, Malaj 先生的指控不可靠, 而且明显出于报复原因: 试图逃跑未成功后, 他才向检察官提出了申诉。

224. Mehmet Hayrettin Arat 库尔德人也是土耳其公民, 于1991年6月25日因与毒品有关的指控被捕。拘禁期间, 他脸被打, 受到转轮手枪的威胁, 头上套了一个塑料袋不能呼吸。他还被施以 Falanga (击打脚底板), 然后再迫使他用肿胀的脚跑步。

225. 政府答复说, 在针对 Mehmet Hayrettin Arat 先生进行法律案件过程中, 没有人向任何司法和行政当局提出有关虐待的任何申诉。他的共同被告, 其中一个是他的抗同胞, 也未提到任何虐待行为。

226. Dimitris Papatheodoros 是位商人, 于1991年7月4日在雅典被警察逮捕并送往第四警察局。在拘禁期间, 他被扇、踢、打, 被剥光衣服搜身。

227. 政府报告说, 雅典第13(警务)治安法官正进行初步调查。在司法当局做

出决定之前，公共秩序部不会就涉及此案的警察纪律责任做出明确的决定。

228. Stella Evgenikou 于1991年7月18日，被大约10名防暴警察逮捕，他们踢她，用警棍打她。她随后又被带往警察总部，据报在那里她脸部再次被打。Evangelismos 医院发现她胸部有瘀伤，断了两根肋骨。

229. 政府回答说，雅典的法院委员会决定将 Harilaos 警官送交一个三人地方法院，就单纯身体伤害进行审判。Evgenikou 女士听说这一消息后，提出了上诉。就此上诉尚未做出决定。阿蒂卡的警察行动处得知上述决定令后，命令进行行政调查。调查尚未结束。

230. Avgoustis Anastasakos 于1991年9月因涉嫌偷窃在帕特莫斯岛上被警察逮捕。他们把他的手捆在背后，然后踢他的颈部、脸和生殖器。据报道，他们后来又用绳子打他的背，并打掉了一颗牙齿。

231. 政府报告说，Kos 的检察员命令司法官员进行初步检查，以便确定是否有理由采取刑事行动。这一检查正在由雅典的一个地方法院进行。行政调查确定，根据医疗报告，Avgoustis Anastasakos 的瘀伤和擦伤在他被捕和拘留的前几天就造成了，警察官员的行为是合法的、合适的。

232. 1991年9月，Pavlos Nathaniel 和 Kostas Diavolitsis 被警察铐在一起，受到棍打脚踢。结果，Kostas Diavolitsis 左肾区被擦伤，Pavlos Nathaniel 的右腿需要缝合。

233. 政府回答说，主管法院正在调查以便做出有关上述伤害的情况的最后结论，或更具体点说，决定此事是出于偶然，还是由追赶他们的警察官员造成的。审判将于1993年5月11日进行，这期间申诉人有权要求赔偿。公共秩序部在作出对受到指控的警察以纪律处分之决定以前正在等待判决结果。

234. 特别报告员也向政府转交了一些资料，表明1991年11月2日有33人在雅典的一条街道上贴政治标语时被6名警察逮捕并予以拘留。他们都被带往亚历山大街的安全警察总部，其中有些人在那里遭到虐待。特别报道了下面几个案例。

(a) Yannis Ballis。他被打以致断了一只手，并受到处决的威胁；

(b) Michael Bachsevanis。他被吊在一扇窗子上，并受到被扔出去的威胁；

(c) Dina Kanalou。她全身受到毒打。

(d) Maria Nikolaides。据报道，一位警官拽着她的头发，将头向墙上撞。

(e) Geogios Meriziotis。他的头、肋和腿受到棍击。

235. 政府就这些案例报告说，对于无意的严重身体伤害、危险的身体伤害、轻微身体伤害、谩骂和威胁负有责任的警察，检察官已对他们作出刑事指控，并命令雅典的第15地方正规检查法院进行调查。此项调查尚未完成。阿蒂卡的安全处对案件进行了行政调查。结果表明，造成的伤害由下面的事实得到解释，即当警察准备逮捕贴标语的人时，他们谩骂警官并进行抵抗、妨碍警察执行法定职责，因此警察不得不使用暴力，这是完全必要和合法的。如果在案件的司法调查中，证明某些警官应对其行为负责，公共秩序部也将作出适当的纪律处罚。

236. 政府在结束对个别案例的答复时指出，从对现有证据的分析中可以公正和客观地证明，有关酷刑和虐待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或至少是夸张的，不应提出埃及的酷刑和非人道待遇问题，因为：

- (a) 为保护人权和自由、防止任何形式的非人道待遇而建立的法律框架不仅充分、也符合联合国宣言的精神和条文，而且也得到完全的遵守和实施；
- (b) 对在42,000名警察中，少数警察出现不当行为或不合法行为的极少的和孤立的案件，已根据刑事和纪律条款进行了调查，并施加了适当的惩罚。这些案件中，有些司法和行政调查尚未结束，将来会做出适当的惩罚。尽管从事件(超越自卫限度、暴力骚乱等)发生的背景和条件出发可能出现有利于被指控警官的可使罪行减轻的情况，尽管世界上所有警察部队都可能存在类似情况，所有此类案件总是受到司法和行政调查和管制。

从政府收到的有关先前报告提到的案件的资料

237. 1992年2月10日，政府就特别报告员1991年10月18日转交的下述案件(见E/CN.4/1991/17，第101段)做出了答复。

- (a) Liam de Clair, 1990年7月17日被逮捕并带往伊奥斯警察局。政府报告说，他于1990年7月17日被捕并于次日交给检察官。如果他受到了虐待，那么肯定会向检察官申诉。他也未和律师接触，因为在伊奥斯小岛上既没有律师，也不可能给他提供一名。警察局外他被拘留的小屋是一间正常的拘留房间。至于 Liam de Clair 先生接受了医疗检查并证明有瘀伤的消息，应当记住，许多被拘留者伤害自己，要么想

制造假象，要么想住医院来减少住拘留室的时间；

- (b) Emmanouil Kasapakis 于1990年9月23日被警察拷打。政府报告说，1990年9月21日至22日夜，在 Kasapakis 先生的邻居抱怨他房间里的人破坏安静后，警察来查问他。在第三次查问时，Kasapakis 和另外两人攻打和侮辱了警察。结果，Kasapakis 先生和一名警官受伤并随即送往医院。对此进行了调查，但确定这一事件所涉警官不要负责任。Kasapakis 先生自己拒绝去警察局就此案作证；
- (c) 1990年3月23日，Kostas Andreadis 因涉嫌参加“警戒无政府主义者”组织而被捕。政府报告说，塞萨洛尼基的主管警察部门进行的调查表明，Andreadis 先生自愿承认他从事的非法行为（拥有武器、纵火、抢劫等）。1990年3月24日，警察当局让 Andreadis 先生接受电视和报纸记者采访。在记者招待会期间，他讲述了自己的行为，但未暗示自己受到了任何酷刑和虐待。

危地马拉

转交给政府的资料

238. 1992年8月21日，特别报告员通知政府，他已收到有关下列在危地马拉发生的酷刑案件的报告：

- (a) Walter Federico Flores 17岁，于1991年10月23日在危地马拉城一区第4和第19大街之间的 Botellon 区被两名身着警校校服的年青人毒打。他被扔在一座桥下，不省人事；他后来在 Casa Alianca 接受了治疗；
- (b) 1991年9月22日，Douglas Gadea Morales 系尼加拉瓜人，在危地马拉城飞机场被警察和毒品管制局驻危地马拉的代表逮捕。他遭电击和毒打五个小时。他还受到被杀死的威胁。
- (c) 1991年11月20日，国际食品及有关企业工人工会联盟的官员 Juan Pablo Zemus Silva 在墨西哥的蒙特卡洛被警察逮捕。警察将他打至半昏迷状态。他后来又被带往第19区的国家警察第4警察局再遭拷打。
- (d) Eduardo Amado Lopez 14岁，于1992年4月27日在一次中学生示威中

被“Hunapu”人员逮捕。这是一个刚刚成立的单位、由国家警察、机动宪兵和武装部队人员组成。他遭拷打、被迫喝漂白剂。

239.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关于下列街头儿童遭虐待的资料：Moises Rivas 15岁、Maroin Antonio Mejia（也叫 Diego Chouza Franco）16岁、Manuel Lopez 16岁、Carlos Antonio Contreras 17岁、Boris Velasquez 17岁、Juan Lopez Gonzalez（也叫 Tijuana）12岁、Erik Mendoza Zopezl（也叫 Leprosy）17岁、Jose R. Lopez 和 Luis Antonio Roldan。

240. 据收到的资料，1992年3月6日，包括上述儿童在内的16名儿童在危地马拉城第1区被机动宪兵逮捕。根据证人的话，他们被捕即加上手铐。1992年2月24日，其中一名，Carlos Antonio Contreras 被指控偷太阳镜而遭国家警察毒打。

241. 1992年3月18日，Melvin Enrique Giron 和 Omar Francisco Moran 在危地马拉城1区 Barrajuste 市场被四名 Hunapu 人员逮捕。他们被捕时遭殴打；所提的第一人遭“中国棍”的电击。

242. 1992年3月19日，Jose Vidal、Nelson Larios、Mario Rene Hernandez Aguirre 和 Fernando Sarceno 也在 Barrajuste 市场被 Hunapu 人员逮捕。他们被带上一辆卡车遭到拷打并从开动的车上给扔下去。

243. 1992年1月20日，Felipe Gonzalez（也叫 Chiripa）14岁，和 Jose Corrado Mendoza（也叫 Olindo）18岁，在危地马拉城1区遭到据信与安全部队有牵联的人的毒打。

244. 此外，1992年4月7日，特别报告员根据第1992/59号决议就 David Estuardo Mejia Paiz 和 Axel Mejia Paiz 案件向政府发出一份紧急呼吁。在以前的几个月，Paiz 家成了不断遭到威胁和骚扰的目标，他们的房子受到据信与安全部队有牵连的人的经常监视。Axel Mejia 是 Casa Alianza 紧急中心的督导。此中心已向联合国提供了有关街头儿童经常遭受虐待的资料。（见E/CN.4/1992/17，第104段）Mejia 先生是对被指控卷入1990年11月7日一次事件中的不同警察单位26名人员进行审判中的主要证人。当时，安全部队人员在 Casa Alianza 紧急中心外毒打了三名儿童。在他作证后，威胁次数增加。1992年3月12日，一些穿便服、驾驶一辆装有偏光窗的黑车的人绑架了 Axel 的哥哥 David Mejia Paiz，将他扣押了几个小时。

245.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危地马拉政府转交的关于一些非正规团伙活动的资料。他们的活动造成几人被处决和受伤，两人因被丢弃的地雷爆炸死亡。他也获悉这些非正规团伙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

海地

从政府收到的有关委员会第1992/42号决议的资料

转交给事实上海地政府的资料

246.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10月5日的信中通知事实上政府，他收到的报告表明，因政治原因被捕的人几乎不可避免地在被捕时受到拷打、随后在狱中遭受虐待。他接受了下列23起案件的报告：

- (a) 1991年10月7日，太子港市长兼民主联合会联盟的领导人 Evans Paul 在马伊斯门国际机场被士兵逮捕。他们当着证人的面剥去他的衣服、用头盔和转轮枪打他，用热得发红的步枪管烫他。他被关押在一座监狱和一所军校几天，接二连三地遭到士兵拷打。他被释放时，肋骨骨折，多处瘀血，背、头和眼受伤并有一处热枪管造成的严重烫伤；
- (b) 1991年9月30日， Danny Toussaint (船长)和 Pierre Cherubin (警长)在国家大厅被安全部队拷打，还受到被杀的威胁；
- (c) 1991年10月16日，中央省安什 Papaye 农民党的一名成员Aldajustes Pierre 因被指控拥有地下报纸、被安什军事基地的士兵逮捕。根据得到的消息，他遭毒打，得不到治疗；
- (d) 1991年11月11日，Casimir Rosalvo 在戈纳伊夫工人阶级区遭受军事袭击中逮捕。他遭士兵拷打，造成生殖器、耳和眼浮肿。一名士兵要割去他一只耳朵，但被另一名士兵阻止；
- (e) 1991年10月24日，民主运动全国委员会和农村发展组织的成员Raymond Toussaint 在阿蒂博尼特小河区被捕。他先后被拘留在小河区和圣马克。他遭毒打，特别是头部和右耳部；
- (f) 阿蒂博尼特山谷韦雷特的 Francois Destin 是青年宗教组织的成员，于1991年11月10日被捕。他被带往韦雷特军事基地。证人说，他在那里遭士兵拷打和施以“杰克”酷刑，亦即将棍子置于受害者的大腿下和手臂上；
- (g) 1991年10月， Napoleon Saint-Fleur 在被士兵逮捕时遭受拷打。他被送往海地角监狱。据其他囚犯说，他经常遭受拷打；

- (h) Cheneker Dominic 遭一伙企图逮捕他父亲的士兵毒打，他父亲是大湾省热雷米的商人。他因这次毒打，一个星期不能行走；
- (i) 1991年10月28日，Ernest Charles 遭穿制服警察的殴打，造成耳、嘴出血。他后来又被命令每三天向警察局做一次汇报；
- (j) Jean-Claude Musean 也叫 Klodi 是莱凯的教师，因被指控张贴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标语而于1991年12月30日被捕。他头部遭毒打、臀部被刀割伤。他于1月6日获释，两天后死亡，可能因为拘留期间遭受酷刑和得不到治疗；
- (k) 1992年3月5日，Renoir Saint 在阿蒂博尼特省的戈纳伊夫被捕，并送往 Toussant L'Ouverture 军营。他遭毒打，特别是脸、眼和耳部；
- (l) 1992年3月19日，Yvon Desrose 在中央高原的 Mirebalais 遭受两名士兵毒打。他们指控他到处乱涂乱写；
- (m) 1992年3月8日，Renand Damilus 也叫 Ti Zonbi，在西部省 Ti Plas Boudet 的农村股遭到股长的警棍毒打；
- (n) Valentin Villard 是 Fort-Liberte 人民国民运动成员，在东北省的 Trou-du-Nord 被警察逮捕。他遭毒打并据报因受虐待而无法行走；
- (o) Jaquelin Louis 在 La Fossette (海地角)被两名武装平民逮捕。他被捕时遭受暴打。狱中拷打继续进行，造成他的死亡；
- (p) 1992年5月20日，Camille Chalmers 教授在太子港人文学院被捕。他被带往防治匪帮处，在那里遭受步枪枪托和金属椅子击打，主要打后颈、肩胛骨和脊柱。他几次被打耳光，造成右耳膜穿孔；
- (q) 1992年5月21日，Marlene Chery 是女学生，被捕后被送往太子港的防治匪帮处。她的下腹部遭受铁棍毒打；
- (r) 1992年4月28日，Moleon Zebrun 在海地角利蒙纳得的 Bois de Lance 被捕。他被送往利蒙纳得警察局，两周内每天都遭毒打；
- (s) 1992年5月11日，Valentin Villard 和 Jerry Rosefort 是两名 Asanble Popile Veye Yo 的成员，在 Trou-du-Nord 被捕。他们在被拘留期间遭受酷刑。Valentin Villard 因此死于自由堡监狱；
- (t) Jean Luckner 是皇家堡的 Petit-Goave 人，于1992年5月16日被捕并被送往最近的军事哨所。他在那里遭受棍棒、电线抽打，严重损伤

了背部;

- (u) 1992年5月24日, Wilcena Dorleus, Petit-Goaves 的一名教师, 在太子港 Sylvio Cator 体育馆被武装部队逮捕。他被送往“咖啡厅”拘留中心和国家教养所并遭受毒打。据医疗报告, 他头骨和胸部受伤、右臂骨折。

247. 除上面描述的案件外,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1991年底和1992年初被捕后遭受酷刑的人的名单。名单上的人包括: Adissou Codio、Aji Lusma、Aubourg Etzer、Deina Joseph、Destin Francois、Elsie Mehu、Erichard Zinne、Leridor Simon、Madsen(Ti Yaya)、Paul Anelo、Cosenia Gabriel、Vanesse Cadeaux、Vaudre Abelard、Deshommes Odilon、Desravines Fritz、Legagneur Jean Robert、Nelyo Desana、Pierre Jaques、Pierre Jeannel、Senpreuil Jaques、Vilbrun Lebrun、Charles Roosevelt、Jean Baptiste Dieulaime、Demesvar Joseph、Dieuseul Dieupanou。

248.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记者 Paul Jean Mario 一案更多的资料。1991年12月10日, 特别报告员为他发出紧急呼吁。根据这一资料, 他因遭受酷刑, 健康状况大为恶化。据说他被拒绝去医院接受治疗。

249. 特别报告员也为下面提到的人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发出的时间在每段摘要后的小括号内注明。

250. Paul Laroche 是教师, 于1991年10月16日被士兵逮捕。他被捕时遭受野蛮拷打, 不得不被送往国家教养所医院。尽管他健康状况极差, 看来他尚未得到治疗或大夫检查(1991年12月19日)。

251. 1992年1月18日, Kechnerd Pierrilis (圣米切尔教堂的司事)、Alfred Elouis 和 Marc Andre 在 Germaine 附近被 Cazale 农村股股长及其助手逮捕。他们毒打这些犯人, 然后将他们送进监狱(1992年1月30日)。

252. 1992年6月3日, Tessonot 先生(Cayes 学校的校长)、Olivier 先生(这所学校的教师)、T.Nixon Bogat(Cayes 的海地国际广播电台的前记者)、Verdier 神父和 Guillite 先生(Cayes 的副市长)被士兵逮捕并送往军营。他们被捕时遭受毒打, 特别是 Guillite 先生据说健康状况极差(1992年6月5日)。

253. 1992年12月1日, 12名学生包括 Antoine Wesner 和 Marilide Noel, 在海地州立大学农学院的示威中被武装部队逮捕。据报他们被送往防治匪帮处。一位参加示威的女学生遭受毒打。据报她的健康状态极为危险(1992年12月11日)。

印 度

转呈政府的资料

254. 在1992年8月21日的一封信函中,特别报告员向印度政府转呈了所收到的有关该国实行酷刑的主要指称的概要及若干具体案件。此外,特别报告员代表根据所收到的资料有遭受酷刑危险的人员发出两份紧急呼吁。

(a) 向政府转呈的有关一般酷刑行为的资料

255. 根据收到的报告,刑事嫌疑犯在印度的酷刑受害者中占很大比例。对刑事嫌疑犯实行酷刑的主要目的是逼供信。无论罪行多么轻微以及事实上是否犯罪(人们可能因为轻微的原因,例如“行动可疑”或无票乘坐火车而遭拘留)。甚至连年仅六岁的儿童也因与轻微的刑事罪行有牵连而被捕并据称遭受酷刑。

256. 其他受害者为因政治罪或与在东北、查谟和克什米尔及旁遮普存在的武装冲突情况有牵连而被捕的人。在这些情况下,酷刑是一种逼取供词和收集情况的手段,但也用来威慑和报复武装集团的袭击。在这些武装敌对的地区,保安部队根据《(防止)恐怖主义与破坏活动法》,有权逮捕嫌疑犯,并且可以在既无指控又不审判的情况下将嫌疑犯拘留长达一年的时间,以便对广义犯罪行为进行调查。

257. 最常见的酷刑有毒打(有时将受害者倒吊起来毒打)和电击。还有的是用压土机碾压、用火烧烫、用锐器刺戳、阉割性器官以及把干辣椒或粗棍等异物塞入人的直肠。在全国各地似乎到处都有警察强奸或虐待妇女的现象。在东北各邦及查谟与克什米尔,已形成这样一种做法;如果发现有人支持武装判乱分子,武装部队与准军事部队就会强奸妇女。

258. 根据《刑事诉讼法典》,警察不会因执行公务时的行为,而受到起诉。在该国经常发生武装对抗的地方,公诉豁免是专门法规明文允许的。因此,在行使目前在旁遮普、查谟和克什米尔以及阿萨姆与东北地区其他各邦实施的《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所规定的权力时,保安部队事先获准免受可能提出的公诉。普通的法律保证条款并不适用。该法第六节规定:“除非事先得到中央政府的准许,不得对任何人因其行使本法所授予的权力时所做或欲做的任何事情提起公诉、诉讼或其他法律诉讼。”此外,对于中央政府直辖邦,1991年9月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保

护所有政府官员不会因其执行公务时所采取的行动而被提起诉讼。在这些邦,只有征得中央政府的准许,才得对官员提出诉讼。

259. 除此之外,逃避因违反人权行为而受到起诉的一些早已确立的程序性方法给全国的警察与保安部队提供了非正式却行之有效的豁免。其中包括不记录控告、不承认拘留或不实施其他的法律保障条款,否认负有责任;伪造法院记录和验尸报告(有时在警察医院进行验尸来伪造验尸报告);恐吓证人和原告;让同一分局的警察进行调查以左右调查并延缓调查结果的出台和起诉时间。这些方法得到了习惯做法与官方政策的支持,因为官方政策规定只对那些应对关押期间的暴力行为负责的为数甚少的警察或士兵实行最低限度的制裁。

260. 在这些情况下,亲属们很少能成功地对据称负有酷刑责任的警察官员提出刑事诉讼。另一方面,对受害者或其家属的补救几乎不可能获得,再说他们大多数入既无所需的材料也无所需财力来寻求补救。由于当局不提出公诉,有些亲属提起自诉。但是,这些自诉很难予以证实,因为举例来说,对关押期间致人死亡事件的大多数调查,如果进行的话,也是由政府官员而不是由独立的权威机构进行的,而且这些调查与验尸检查报告经常被扣压。再者,私人刑事诉讼费用昂贵且旷日持久。

(b) 向政府转呈的具体案件:

261. Mohammed Akbar,是查漠与克什米尔Checksiri的农民,于1990年5月在Kalsiri村被边防保安部队的警察逮捕。在他被关押的12天期间,他曾遭毒打。1990年11月19日他再次被捕并被带到Hyderbeig Pattan分区的一个军营。在Hyderbeig期间,他的手脚多次遭棍打;在一个人扭住他同时,另一个人持辣椒粉撒入他的双眼。

262. Ghulam Mohiuddin S.,是查漠与克什米尔Baramulla区Pattan分区Palhalan的一名教师,于1990年6月5日被边防保安部队的警察逮捕。他连续数小时被迫弯腰并多次被打。警察在他大腿上用重棍滚压并用沉重的军靴踢他。

263. Abdul Qayoom,是查漠与克什米尔Pattan分区Gaughipora的店主与兼职裁缝,于1990年9月19日被2名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的警察逮捕。在他被拘留期间曾遭毒打。曾一度用绳子把他吊在天花板下,而且在吊着他的时候,用蜡烛烧他的耳朵与胡子。

264. 还报告了下面15例酷刑致死案件:

(a) Bashir Ahmad于1991年8月23日被Madanapalle镇警察局的警察逮捕。

次日，他死于或是Madanapalle监狱的拘留所或是政府医院，据称是警察拷打致死；

- (b) Uppuleti Chandraiah, Karimnagar区Peechupalli人，于1991年3月5日因抢劫嫌疑被捕。四天后，他死于Husnabad警察局，据称因酷刑致死；
- (c) Bubul Barua, Lakhimpur, Mauza Kherajghat Puli Nahoroni人，1991年10月12日在Bandardawa村被捕。据报告，10月22日他死于酷刑所致的伤害。医疗报告表明他的肾因拷打而破裂；
- (d) Dibakar Handique, North Lakhimpur, Narayanpur Dholpur Maiza, Basapukhuri的Rajgarh学院办公室助手，于1991年9月28日被捕，据称因受酷刑于10月1日死于一所军营；
- (e) Dhruvajyoti Gogoi学生，于1991年3月17日在Tinsukia, Doomdooma被军队逮捕。两天后，他的尸体被移交给警方，上面带有酷刑留下的伤痕；
- (f) Gambhir Gogoi, Dibrugarh区Duliajan Nagajan的茶树种植园雇工，于1990年11月被军方逮捕。几天以后，他的尸体被移交给警方上面带有酷刑留下的伤痕；
- (g) Doka Babonga于1991年11月21日被东Singhboom区Gua警方逮捕。12月4日，他死于MGM学院医院的监狱病房。医疗报告表明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可能遭受的酷刑造成内伤导致腹部连续失血；
- (h) Darshan Singh(又名Darshan Lal), 德里东部新Seelampur Colony人，因与一抢劫案有牵连于1992年3月10日被捕。据报，他曾在德里东北区警察局反窃东股受到酷刑。3月17日，他死于LNJP(Irwin)医院，据称是因为警察实施酷刑所致的伤害而死。医疗报告表明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头部创伤；
- (i) Savinder Singh, 商人，德里南部居民，于1992年2月28日被捕并被带往位于Khan市场附近Loknayak Bhavan的财政部执法司。次日，人们在Lok Nayak Bhavan 大楼里发现他的尸体。其家属声称他遭受酷刑折磨，被迫跳楼自杀；
- (j) Jairam Singh于1991年8月18日被Patel Nagar警察局的警察逮捕，不到几小时便死亡。验尸报告列出了钝器所击而致的17处外伤；
- (k) Trivandrum Neyyattinkara的Kuttappam于1991年7月3日被Trivandrum Parassala的警方逮捕，次日死亡。验尸报告表明死于因

据称受到的酷刑而致的脾破裂；

- (l) Ram Singh, Arra Koder村的Sarpanch, 于1992年4月初死亡, 据称是Bohandiguda警察局警察实施酷刑造成多处受伤而致；
- (m) Muthusamy, Dindigul区 Oddanchathram人, 因与一偷窃案有牵连于1992年初被Oddanchathram警方逮捕。后来, 他的母亲、妹妹与父亲也先后被捕。据报道, 他们都遭到了殴打, 结果Mathusamy死亡；
- (n) Dushyant Tiyaagi于1992年4月13日当天或前后被Siani Gate警察局的8名警官逮捕, 两天后死于政府医院。据称他是在警察局关押期间被活活烧死的；
- (o) Kuber Lal于1991年7月25日被Sandila警方逮捕。他死于Hardoi监狱, 据称是因为警察的酷刑与监狱当局医疗上的玩忽职守致死。

265. 除上述案件外, 特别报告员代表下列在关押期间担心有可能受到酷刑的人员向印度政府转呈了紧急呼吁。在相应的概要末尾的括号里列有发出呼吁的日期。

266. 据报道, Tejinder Singh于1991年11月11日下午四时在其住宅被Amritsar刑侦处的警察逮捕。1991年11月14日, Tejinder Singh被带到法庭受审, 在法庭上的陈述中, 他声称受到了酷刑。据称在1991年11月16日一份报纸的报道中, 警察声称Tejinder Singh在关押期间越狱潜逃。然而, 其家属声称这不属实, Tejinder Singh正处于未得到承认的关押之中, 有受到进一步酷刑的危险。(1991年12月20日)

267. Iqbal Singh, 是Amritsar区Fatehpur的居民, 据报于1991年11月12日在Amritsar火车站附近被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的警察人员拘留。Iqbal Singh最初被带往Amritsar区Sadar警察局附近的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的一个营地, 他后来据信被转移到Gharinda警察局。(1991年12月20日)

268. Charan Singh, Amritsar区Muchhan村的居民, 据报于1991年11月7日在其住宅被Majitha警区的助理警监与Ropar警方的警察拘留。其亲属曾几次代表Charan Singh向旁遮普邦的警方、司法与政府高级人士发出电报、申诉与正式书面陈述；然而, 他并没有被带到法庭受审。(1991年12月20日)

269. Amarjit Singh, 系Kapurthala区Begowal的居民, 他在Miani小学当老师, 据报于1991年10月24日被Hoshiarpur警方拘留。他连续十天被关押在Hoshiarpur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的一个营地, 后来又被转移到Jalandhar关押。(1991年12月20日)

270. Ajit Singh Bains大法官, 旁遮普人权组织主席, 于1992年4月3日在Chandigarh高尔夫俱乐部被警方人员逮捕。根据得到的资料, Bains法官患有心脏疾

病,但无法得到药物治疗及家人的探访。(1992年4月14日)

印度尼西亚

转呈政府的资料与收到的答复

271. 在1992年8月21日的一封信函中,特别报告员向印尼政府转呈了他所收到的有关该国存在的酷刑做法的资料及若干具体案件。印尼政府于1992年12月10日对此信作了答复。根据报告,在该国各地区对被关押者实行酷刑以便获取政治与其他情报或用来恐吓受到怀疑的政治活动家,及其同事与亲属。参加过示威游行的工人也受到酷刑审讯并被强迫在辞书上签字。据说对实施酷刑负有责任的人员是军事官员与准军事警察部队“Brimbo(机动旅)的成员。酷刑与虐待的形式包括:上电刑;用刀片与刀子乱划乱割,包括在嘴里割;用拳头、警棍、铁棒、瓶子、石块与电缆殴打头部、胫部躯干;猥亵强奸妇女;用沉重的军靴踢;用烟头烫;用枪威胁与故意伤人;长时间浸泡在臭水中;单独关押以及不准睡觉。

272. 据报告,发生了下列具体案件:

- (a) Mohamad Jafar, 1990年8月因嫌疑帮助Aceh Merdeka运动成员在Aceh被捕。据目击者说,他在遭到木棍和电缆的殴打之后被带走,去处不明;
- (b) Mahdi Yusuf博士、Amiruddin博士、Abdullah Ibrahim博士、Idris Ishaq博士与Ibrahim Hasar博士1991年初在Banda Aceh监狱关押期间受到酷刑毒打。结果,其中有一人致残;
- (c) Syaifulah在1990年9月至1991年2月期间曾被关押在Medan Brimob(机动旅)总部。目击者报告说他被拳打脚踢,并被剥光衣服然后用金属钳子夹其生殖器;
- (d) 据报告,Abbas 1991年年中在Medan Brimob(机动旅)总部受审期间遭到粗电缆的抽打。他还被迫在双膝后夹上一节木棍蹲在地上,然后由另一个囚犯骑在他肩上向下压,结果他的一条腿骨折。
- (e) Adnan Beuransyah博士, Serambi Indonesia 报的记者,因被指控与Aceh Merdeka有牵连于1990年8月被捕。在地方军官审问期间,他双脚、生殖器与耳朵曾遭电击;头发与鼻子遭烟头烧烫,并被拳打脚踢;
- (f) Marwan于1990年10月3日在Aceh被军方成员逮捕并受到酷刑拷打,结果

他的鼻子被打断;

- (g) Wardoyo、Latif与Samsudin,茂物Evershinetex厂工人,1991年6月26日在(Korem 061)军营受到严重酷刑拷打。据称他们被指控参与了示威游行并被迫在辞职书上签字;

273. 关于上述(a)至(d)案件,印尼政府报告说这些人既未受到关押也未遭受酷刑。关于案件(e)与(f),印尼政府告知这些人参与了治安骚扰运动的活动。经过审判,这些人被分别判处9年和6年监禁,并关押在(Banda Aceh)Lhok Nga监狱。在其被关押期间,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受到任何酷刑。关于案件(g),政府报告说在罢工之后,该公司拒绝继续雇佣当事人,因为他们参与了破坏公司财产的活动并企图在墙壁上书写反对华人标语来煽动种族骚乱。解雇他们是经人力资源部批准的。

转呈政府的有关据称在东帝汶发生的酷刑案件的资料

274. 在上述1992年8月21日的信函中,特别报告员还向印尼政府转呈了有关资料;据此资料,在1991年11月12日事件后在东帝汶有一些人被捕并受到酷刑毒打。其名字提供如下:

- (a) Abel Madeira, (Ermera) Gleno人; Jose Reis, 在Ermera Gleno被捕; Joao Lequi Mau, Ermera Gleno人; Florindo Santos, Ermera Gleno的公务员; Armando Exposto, Ermera Gleno的公务员; Jonny F. Goncalves, 在Ermera被捕并被带往警察局; Lebi Mau, 在Ermera被捕并被带往警察局; Julio Soares, Ermera Gleno人; Julio Carvalho, Ermera人; Serafim Macedo, 学生, 在(帝力)Pite被捕并被带往警察局; Dionisio Reis Gusmao, (帝力)Pite的学生; Paulo Sousa Guterres, Venilale的学生, 在(帝力) Pite被捕; Manuel Barreto, 在(帝力) Fatubolu区被捕; Raimundo Silva Monteiro, Viqueque的学生, 在(帝力) Colmera 区被捕; Leonard Costa, Viqueque的学生, 在(帝力) Colmera区被捕; Acacio Bernardino, Los Palos的学生; Eduardo Mamanuk, Manatute人; Antonio Ximenes Guterres, (Baucau) Venilale的学生。关于这些案件,印尼政府报告说这些人从未被关押,也未受到酷刑;
- (b) Amau Madeira, (Ermera)Gleno人; Joao Madeira, Ermera Gleno人; Juvenal H. Madeira, Ermera Gleno人; Adelino Soares, Ermera的公

务员; Fernando Deus, Ermera的公务员; Carlos Deus, Ermera Gleno的公务员; Jose Pinto Baptista, 在Ermera被捕并被带往警察局。关于这些案件, 政府报告说这些人1991年11月15日曾遭拘留审问, 第二天就被释放。没有任何受到酷刑的迹象;

- (c) Alcino Freitas Vital, (Baucau) Ossoluga人; Agostinho Freitas, (Baucau) Ossoluga人; Custodio Freitas, Baucau Ossoluga人。关于这些案件, 政府报告说这些人1991年11月30日曾被审问, 经劝诫后于1991年12月3日被释放。没有任何受到酷刑的迹象;
- (d) Filomeno Gomes, 在帝力Caicoli被捕; Matias Gouveia Duarte护士, 在(帝力)Taibesse区被捕并被带往警察局。关于这些人, 政府报告说他们从未被拘留, 只是接受了劝诫。在此之后, 他们参加了社区组织的学习班;
- (e) Arcanjo Anjos Paixao, 来自Ermera的公务员。关于他的情况, 政府报告说他曾因按照Ermera主教的指示收集资金的活动被拘留审问。1991年12月19日他被释放。没有任何受到酷刑的迹象;
- (f) Eliseu Soares, 来自Ermera的教师。政府报告说他于1991年11月25日接受劝诫后获释;
- (g) Jose Maria Pompeia Saldanha Ribeiro, Denpasar大学学生, 1991年11月24日被印度尼西亚情报局逮捕, 先是被带往Denpasar警察总部, 后又被送往雅加达警察总部。政府报告说此人现在Denpasar居住, 从未遭拘留。

275. 除上所述, 特别报告员还代表下列人员发出了两项紧急呼吁, 因为人们担心这些人在被拘留以后可能受到酷刑:

- (a) Xanana Gusmao, (帝汶争取独立革命阵线)阵线领袖, 1992年11月20日上午6时在帝力军人医院附近被捕(1992年11月23日)。1992年12月8日, 印尼政府答复说Gusmao先生现关押在雅加达警察局接受警察和检察院官员的审问, 等待法庭审判。把他从帝力送往雅加达完全是为了他的安全; 他的审判将在犯罪地点进行。在接受审讯和等待判决期间, Gusmao先生所受到的待遇符合人道主义考虑与国际标准, 对他的审判将严格按照印度尼西亚的法律进行。法院将开庭审理, 被告将被给予充分的司法协助。同时, 国防部长还命令有关军事当局要尊重Gusmao先生的身心健康。外交部长亲自向特别报告员保证Gusmao先生身体健

康,并未受到任何方式的虐待;

- (b) Abilio Baptista, Afonso Maria, Avalino Baptista, Fernando Conceicao, Francisco Goncalves, Henrique Guterres, Ildefonso Soares, Jorge Cortinnal, Mario Miranda, Pascal Soares, Rui Miranda, Vitor Viegas, Rufina Conceicao Araujo, Augusto Pereira, Aliance de Araujo, Ligia de Araujo, Jorge Manuel Araujo Serrano, Regina Conceicao Araujo Serrano, Francisco Almedia Araujo, Armandlina Gusmao, Gilman Exposto, Olandina Caceiro Alves and Oscar Lima。所有这些人均于1992年11月期间被军事与警察部队逮捕并遭单独监禁。(1992年12月3日)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转呈政府的资料

276. 在1992年10月27日的一封信函中,特别报告员通知伊朗政府他已收到了资料。据此资料,由于政治而被关押的囚犯通常刚一被捕就要受到酷刑,而且在审判之前及之后的监禁期间还可能随时受到酷刑。据称实行酷刑及其他形式的肉体与心理虐待不仅是为了获取情报,而且也是为了逼供,有时被拘留者的供述还要照相记录。

277. 常见的体罚包括长时间歪吊,用烟头烫,用电线或其他器具反复毒打背部与脚底。有时还用毯子或衣服塞入受害者的嘴里阻止其喊叫,使人难以正常呼吸。用刑时一般是受害者的眼睛蒙住,并把他们绑在一种床凳上或者让卫兵骑在他们背上。据报道,其他的任意惩罚的方法有拳打脚踢,罚站数小时,取消家属探访或减少食物。

278. 另据报道,政府未能采取最低限度的保障措施来防止酷刑,包括允许囚犯定期会见亲属、律师和医生,确保控诉能得到妥善的调查并将实行酷刑者绳之以法。转呈了下列具体案件:

- (a) Hooshang Sabetizadeh 1990年7月进入伊朗境内后被捕。1991年3月其亲属探访他时,他身上有受酷刑的伤痕。他的脸上,特别是眼睛与嘴唇周围一片青肿,两颗门牙被打掉而且几乎不能张嘴说话。1991年10月,他的亲属在医院探视了他,但他的身体状况很差,双脚因电线的抽

打严重感染根本不能走路。1992年3月，他被释放出狱两周之后即死亡；

(b) 据报，Khalil Akhlaghi 1989年11月在设拉子市被保安部队成员逮捕。在被判处15年监禁之前，他已在设拉子监狱被单独监禁了14个月。在此期间他受到了酷刑，例如毒打全身特别是脚底。由于挨了很重的耳光，他的右耳已完全失去听力；

(c) 据报，Ali Gaffari Hosseini 1990年8月在德黑兰机场被捕并被带往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进行审讯，在那里他多次遭到殴打，特别是在肾脏部位与脚底。他还被捆住双腕吊起来并他的一些脚指甲也被拔掉。

279. 除上所述，特别报告员代表与下列事件的有关人员发出了紧急呼吁。发出呼吁的日期列在相应的概要句尾的括号里。

280. 从1992年4月中开始，在马什哈德、阿拉克、恰哈尔--马哈尔、哈马丹、呼罗马巴德、设拉子、舒什塔和德黑兰等地相继发生游行示威和骚乱，此后据报有几百人被捕。在马什哈德，据报由于市政当局企图摧毁非法建造的大楼并强迫驱赶大楼中的居民以及由于人们对社会与经济状况不满，1992年5月30日爆发了示威游行，此间约有300人被捕。人们担心这些人可能会受到酷刑或虐待。(1992年6月10日)

281. Gholam Ghahremani是在迪拜的一名伊朗难民。据报他于1992年8月3日遭绑架并被送往德黑兰Evin监狱。人们担心他可能会受到酷刑。(1992年10月23日)

282. Abdollah Bagheri, 库尔德反对派组织Komala的前成员，于1992年11月初在靠近伊拉克边界的Mariwan郊外被捕。据报，Bagheri先生被单独监禁，人们担心他可能会受到酷刑或虐待。(1992年12月11日)

伊拉克

283. 在1992年12月3日转呈的紧急呼吁中，特别报告员通知伊拉克政府他已收到有关资料；据此资料，自1992年4月军事当局命令伊拉克南部沼泽地带的当地军民撤离该地区以来，一直实行一项故意针对非战斗平民的政策。尽管自1992年8月起实施的空中禁飞区制止了空袭，但是，据报政府军在加强地面攻击的同时，主要是实行大规模的任意逮捕与酷刑。这样的情况9月在(巴什拉省)al-Muduina附近的al-Salem村就有发生。10月份第二周，据报政府军在官方所称的“讨伐运动(al-Hamea al-Tadibiyya)”中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据说有几千人被捕，特别是在

米桑省；其中许多人据报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在家里或街上被保安部队漫无目的地逮捕。被拘留者据说关押在al-' Amara市的第四集团军总部，虽然其中有一小部分人后来又被转移到巴格达。人们担心他们可能会受到酷刑或虐待。

以色列

转呈政府的资料与所收到的答复

284. 在1992年8月21日的一封信函中，特别报告员向以色列政府转呈了它所收到的有关该国实行酷刑的主要指称的概要及若干具体案件。除此之外，特别报告员代表根据所收到的资料有遭受酷刑危险的人员发出了紧急呼吁。

(a) 向政府转呈的有关一般酷刑行为的资料

285. 根据收到的资料，被占领土的以色列当局在审讯犯人时一贯使用相当于酷刑或虐待的方法。其中包括拷打、强迫保持某种姿势(Shabeh)、扰乱感官的正常功能(主要是通过蒙住双眼、不许睡觉与进食以及单独监禁的方式)及使用感官紧张术(把在被拘禁者关进他们叫做“棺材”或Khazayen的单人小牢房中禁闭或挨冻)。还有报告说，根据被占领土的以色列军事司法，被拘留者通常要在18天之后才能见法官，而会见律师与亲属则要等更长的时间。

286. 从理论上讲，被占领土的军事法庭不准使用在胁迫情况下获取的口供。如果被告认为其口供是在胁迫下提供的，被告律师可在所谓的“审判中的审判”或者“小型审判”中对口供提出质疑。公诉人在这种一般秘密举行的诉讼程序中，则要证明口供的自愿性。公诉人传唤参与获取口供的证人，而被告则通过出示证据证明据称逼供时所遭受的虐待。如果起诉方不能证明供词是自愿提供的，供词就不能得到承认，而且法庭在以后的正式审判中将不予接受。

287. 但是，这一保障措施据报在实践中并未得到有效实施。律师们认为在“审判中的审判”中，法官们经常自动地接受起诉方证人的证词而拒绝接受被告的证词。屡遭长期单独监禁的被告又找不到能代表自己的证人。其他因素也限制了律师寻求“审判中的审判”。进行这样的诉讼程序必然会延长案件的审理。因此，对被指控犯有较轻罪行的被告来说，选择“审判中的审判”可能意味着他或她将继续被拘留，而等待这种诉讼程序的时间要比一开始就服罪可能被判的刑期更长。此外，

据报法官及公诉人常常提醒被告及其律师服罪与节省法庭进行“审判中的审判”的时间与精力将被视为一种减刑因素。

(b) 转呈政府的有关具体案件的资料

288. Sharif Natsheh和他的弟弟Ashraf, Hebron人,据报于1991年4月21日被捕并被送往军事总部。他们身体多处包括脚底都遭到严重踢打,而且几次遭到电击。

289. Ramzi Da'na, Hebron人,据报于1991年9月16日被捕并被带往总部的警察中心。他遭到了毒打,大腿、脸部、肾脏部位和脚底的伤势尤为严重,并且受到了电击。

290. Amneh' Abd al-Jabbar Rimawi, 西岸工会总联合会副会长与Ramallah劳工研究中心主任,据报1991年11月12日在向传唤她的耶路撒冷Moscohiyyah拘留中心报到以后被捕并被带走审问。后来她又被转移到(al-Khalil)Hebron监狱。据说她在这两个地方都曾受到酷刑。

291. Suad Ganeim, Faradis人,1991年8月5日被捕并被送往Jalame拘留中心。在那里她被连续审问了24小时。她被蒙上双眼、戴上手铐,连续罚站几小时。

292. Nariman Shamasna, 17岁, Ramallah区Katana人, 1991年8月26日被捕并被带到俄罗斯人居住区拘留中心并遭毒打。

293. Fatme Abu-Khdeir, 耶路撒冷Shonafat人, 被捕并遭毒打后被转移到俄罗斯人居住区。她被蒙上双眼和戴上手铐,连续罚站几小时。

294. Ghazat Hassan Abu Khadir和Saladin Abu Khadir 1991年7月1日被Shin Beth(安全总局)的警探逮捕并被送往Ramallah监狱,在那里他们遭到了毒打。Ghazat Hassan Abu Khadir连续10天不准睡觉。

295.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有关以色列保安部队1992年1月22日在西岸逮捕和酷刑折磨几名巴勒斯坦人的材料。以色列保安部队指控这几名巴勒斯坦人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成员。材料中特别提到下列人名:

- (a) Mnstafa' Akkawi, 他被抓到(al-Khalil) Hebron监狱,连续几天被关在非常寒冷的走廊上,审问时,他被蒙上双眼,双手铐在椅子上,并且不准他睡觉。1992年2月3日晚上,他心脏病发作,医生助手查不出任何病症,但又不请医生。后来他被置于通常叫做“冰箱”的一件狭窄的单人牢房中,不久他就不行了,随即死去。

- (b) Ribhi Ramez Salim Haddad, 西岸纳布卢斯人。1月22日被捕以后,他先后被关押在 Ramallah 监狱、Petah Tikva 拘留中心、(al-Khali) Hebron 监狱和 al - Dhahiriyyah 拘留中心。1992年2月6日, al-Dhahiriyyah 拘留中心举行的庭审时, 他的拘留期被延长30天, 此后他又被送回Petah Tikva拘留中心。2月10日有位律师探访了他, 他告诉律师他大约连续五天被双手反铐, 坐在一低椅上在摄氏零度的气温下罚谏;
- (c) Ghadir 'Awad, Ramallah 的一位数学教师。据报, 士兵本来是要抓她的邻居, 结果不在家, 就把她抓走了。据说该公寓每个住户都被抓走一人。她被带往Moscobiyyah拘留中心并接受了两天审讯。被关押期间, 她的两眼被蒙住, 双手反铐在铁杆上, 连续几天不准睡觉并遭单独监禁。她还受到了性骚扰;
- (d) Ya'qub Yusuf Musa Fathu, 耶路撒冷 al-Sawaneh 人。他被抓到耶路撒冷Moscobiyyah拘留中心的安全总局受审, 他在那里显然被铐成痛苦的姿势并且不准睡觉。

296.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有关位于南黎巴嫩的Khiam拘留中心囚犯状况的报告。Kkiam显然是由南黎巴嫩军在以色列的协助与监督之下于1985年初建成的一座永久性拘留中心。据报有许多被关押者在受审期间遭受酷刑或虐待, 包括用电线抽打、用水浸泡、电击、不准睡觉、禁食以及不提供卫生条件。

297. 除上所述之外, 特别报告员还向以色列政府转呈了有关下列人员的紧急呼吁。发出呼吁的日期列在各摘要末尾的括号里。

298. Sheikh Ahmad Yassin, 关在加沙地带一座监狱中的老人, 据说健康状况极差, 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关押期间受到了殴打与虐待。据说他已截瘫, 有一只眼失明, 并患有皮肤病。人们担心如果他病情得不到所需要的治疗的话, 他的健康状况会进一步恶化, 并可能有生命危险。(1992年7月29日)

299. 关于这一案件, 以政府于1992年9月1日和11月19日告知, Sheikh Yassin 现在Ashmora监狱而不是加沙地带服无期徒刑。其监禁条件是公平和人道的, 同监狱当局关押的所有犯人的条件一样。监狱条件符合法律与国际标准。Sheikh的健康状况很稳定并未恶化, 而且正受到监狱医生和医务人员的医疗监护和治疗。此外, 还把两个囚犯安排在他的牢房, 提供他个人所需的帮助。有关他身体状况是由于关押期间受到殴打与虐待造成的指称毫无根据。

300. I'taf Daoud Hussein I'elyan在Tel Mund中央监狱已被单独监禁了三

年半。自5年前因酷刑打断了她的鼻梁以来,她也一直没有获准接受所需的外科手术。另据报告,为抗议她的遭遇,她进行了绝食,结果她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1992年9月16日)

301. Ahmad Suleiman Musa Qatamesh 1992年9月1日被捕,据说被关押在 Ramallah 监狱。据1992年9月23日获准探视他的律师说,Qatamesh先生由于审讯期间受到酷刑与虐待,包括长时间不准睡觉、扭曲肢体、蒙住眼睛以及令其窒息等,他的胃部和头部有几处伤痛,呼吸困难而且多次失去知觉。另据报告,还拒绝给他提供医疗保健。(1992年9月30日)

肯尼亚

转呈政府的资料

302. 在1992年11月12日的一封信函中,特别报告员通过肯尼亚政府他已收到下列资料;1992年3月3日,环境组织“绿带运动”主席 Wangari Maathai 女士与其他为争取释放政治犯进行绝食的三名妇女在内罗毕 Uhuru (独立) 公园遭到防暴警察毒打。据报告,她们被棍棒打得失去知觉,不得不送进医院。与此同时,其他绝食的妇女也被棍棒打伤或受到扔进她们正在使用的帐篷里的催泪弹的危害。

303. 此外,特别报告员于1992年7月22日向肯尼亚政府发出了关于 Rumba Kinuthia 先生的紧急呼吁,据说他是一位因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正在候审并关押在内罗毕肯亚塔国家医院的律师。据称,1990年 Kinuthia 先生被捕后不久即受到酷刑,结果送进医院时,他患有高血压病、头痛严重、鼻子流血、神经衰弱以及咳血。尽管身体状况很差,据称 Kinuthia 先生仍然每天有23小时用铁链捆在床上;1992年7月8日医生未被获准前去探访,尽管1992年4月15日的法庭令已经允许,其家属也未获准见他;照料他的医院职工受到看守他的武装狱卒的骚扰。Kinuthia 是1990年10月23日紧急呼吁所涉及的几位人士之一。肯尼亚政府在其答复中证实对这些人,包括 Kinuthia 先生提出的是刑事指控而不是政治指控,并补充说在法庭上见过他们的人没注意他们身上有什么受过酷刑或虐待的迹象。

科威特

转呈政府的资料

304. 1992年3月2日, 特别报告员向科威特政府发出了关于 Iman Thendon Abdul-Latif 的紧急呼吁, 她是科威特大学医学院实验室研究助理, 于1992年6月12日被捕。根据所收到的资料, Abdul-Latif 患有肾脏病, 在她动过阑尾手术后仅几天即被逮捕。据报尽管她健康状况很差, 但仍未向她提供必要的医疗保健, 而且不许她的家人探视。

莱索托

转呈政府的资料与所收到的答复

305. 在1992年8月21日的信函中, 特别报告员通知莱索托政府他已收到了关于下列酷刑案件的资料, 莱索托政府于1992年11月2日对其中部分案件作了答复:

- (a) Mofokeng Makakole 1991年9月27日在奥兰治自由邦的 Welkom 被南非警察逮捕并被转送到莱索托皇家骑警处关押。次日他便死亡, 显然是因为受了酷刑。家属要求对尸体解剖, 检查的结论是他遭到了棍棒或 Sjamboks (皮鞭) 等异物的殴打, 而且还可能遭受钝器的打击或踢打, 死因可能是“颈部受到压迫窒息而死”;
- (b) John Ralengana 和 Khabele Khaebana, Maseru 监狱的囚犯, 1991年8月31日遭到棍棒和皮鞭的毒打。John Ralengana 还因乌枪击中而受伤(乌枪子弹是乌枪发射的大量小铅弹制成的)。后来他们被剥光衣服, 单独监禁在故意放满水的牢房里;
- (c) Michael Sefali 博士1990年3月14日至22日被拘留。他曾整晚整晚地受到审讯, 受审时衣服被剥光, 两手反铐, 身上只披着一条毯子, 赤脚在铺满碎石的水泥地上罚站;
- (d) Samuel Mokete Tumo 上尉, 莱索托皇家卫队的军官, 于1990年2月20日被捕并被单独关押在 Maseru Maximum 监狱直至1990年3月7日。在受审过程中, 他被剥光衣服, 披着毯子, 戴着手铐, 跪在铺满碎石的

水泥地上;

- (e) **Lakia Pholo**, 莱索托银行的官员, 1989年7月被捕。他刚一到警察总部, 有人用一条毯子和一根绳子把他包捆起来, 并在他的脖子上套上一个摩托车轮胎。然后把他铐起来, 剥掉他的外裤和短裤。当他否认任何刑事罪行时, 警察就把碎石塞入他的鞋子, 并强迫他随着铃的响声上下跳跃。他的双手与腿部受到殴打, 腿部还遭到他称之为是一把老虎钳状的东西的挤夹。

306. 关于 **John Ralengana** 案件, 政府报告说, 发现 **John Ralengana** 藏有食物后, 监狱中发生了骚乱。只是在骚乱平定之后才发生据称的酷刑。然而, **John Ralengana** 确实在伊丽莎白女皇医院得到了医治, 后来又多次得到其家属委派医生的诊治, 医疗报告表明他双腿都受了枪伤。监狱当局的报告既未指出对此枪伤员有责任的人员也未说明是否进一步调查或提出诉讼。至于 **Khabele Khaebana** 案件, 政府报告说他在其父母在场的情况下得到了医生的检查, 觉得他的健康状况令人满意, 没有建议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对牢房进行了正式检查, 发现由于牢房的建筑方式, 不存在牢房涝水的可能性。

307. 除上述案件之外, 据报, 当局未能此种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者提出有效的诉讼。有些案件, 甚至在高等法院断定发生了酷刑或其他虐待之后, 都未提出诉讼。

马来西亚

转呈政府的资料

308. 1992年8月21日, 特别报告员代表寻求避难的43名亚齐人向马来西亚政府发出紧急呼吁。这些寻求避难者因为受到被强行遣返印度尼西亚的威胁而占领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驻吉隆坡办事处。人们担心, 如果发生这一情况, 他一回国便被关押遭受酷刑的危险。人们对另外400来人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心, 据说他们在马来西亚已被关押一年之久, 并且同样处于被驱逐回印度尼西亚的危险之中。

毛里塔尼亚

转呈政府的资料

309. 1992年9月28日, 特别报告员向毛里塔尼亚政府发出了有关据说发生在姆巴涅县 Sory-Male 村的事件的紧急呼吁。在一位阿拉伯商人被谋杀后, 保安部队于1992年8月23日包围了该村并把该村中的所有男子都带到学校去审问。据报道, 70岁的 Dia Hamath Atoumane 先生显然因为在审问期间受到了虐待而于次日死亡。至少有四人 (Sarr Alassane N'Dama、Niass Yaya、M'Bodj Hamidou 和 Diop Ismaila Demba) 被带往阿莱格并被正式指控犯有谋杀罪, 据报道, 他们在审讯期受到了酷刑, 人们担心他们可能会受到进一步的虐待。

墨西哥

转呈政府的资料与所收到的答复

310.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8月21日的信函中转交了他收到的关于在墨西哥实行酷刑的申诉的概要及各具体案件。墨西哥政府在1992年11月16日的答复中对这些案件作了评论。

向政府转呈的有关一般酷刑行为的资料

311. 根据收到的资料, 1991年2月对现行的刑事立法进行了修正以防止侵犯人权行为和减少酷刑行为。根据新的立法规定, 法庭不得接受供词为有效供词, 除非供词是当着法官或检察部门的成员的面并在被告律师或其他被告信任的人在场的情况下提供的。

312. 尽管作了这一改进, 酷刑行为似乎并未减少。在检察部门同警察之间存在着不加掩饰的行政联系, 而且被关押者经常在法官接手案件之前就被带到检察部门受审。这些联系增加了这样一种可能: 即便有被告律师在场, 被关押者可能因为害怕再次被警察关押时会受到酷刑而提供假供词。

313. 特别报告员还被告知全国人权委员会对政府军成员的不当行为提出的建

议没有得到普遍遵守，也没有得到充分实施。

314.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在北方还押监狱和 Santa Marta Acatitla 教养院受过审讯的180名囚犯中，有163人说他们在被关押之后受到警察的酷刑。妇女也受到了折磨，其特点是进行性骚乱、强奸和威胁要伤害其子女。

315. 在全国，各地的警察似乎都实行酷刑。使用的方法各种各样。对身体的各个部位通常是生殖器、乳头、嘴巴和眼睛施行电击。用塑料袋把囚犯的头罩住并收紧口袋直至他喘不过气来。将受害者的头轮流浸入装有粪便的脸盆、化粪池或水池中。把矿泉水(有时还加入辣椒)注入人的鼻孔。揪住受害者的头发拉过来拉过去。进行性骚扰甚至强奸或者以假处决、威胁等恐吓囚犯。据报道，医生经常在官员的施压下出具假的医疗报告。

转呈政府的关于具体案件的资料

316. Agustin Diego Garcia、Odilon Garcia Serafin、Abraham Miguel Prudencio、Efrein Miguel Prudencio、Alberto Martinez Hernández 和 Daniel Muez Garcia 都是瓦恰卡 Choapan Santiago Yaveo La Trinidad Yaveo 的印第安社区成员，1992年1月25日被州警察和法警逮捕。他们被带到 Maria Lombardo 警察收容所并遭到毒打。Alberto Martinez 的头被人揪住往墙上撞，他和 Daniel Muez 俩人的手遭到了热蜡的烫灼。

317. 关于这一案件，墨西哥政府说全国人权委员会进行调查后并没出具有关上述酷刑的证据。囚犯在法庭的供述中说他们的手是被一种具有烧灼性的溶液弄伤的。这似乎是州检察部门为检查他们手上的火药痕迹而进行的测试所造成的。

318. Ruben Diaz Diaz、Italo Ricardo Diaz Diaz、Rey Venegas Castro 和 Delfino de Jesus Aguilar Hernández 1991年6月7日被联邦区的法警逮捕。他们先被带到交通与安全署的 Alvaro Obregón 办公室，后又被带到联邦区检察部门办公室。有好几天，他们受到了毒打、电击，还有人把 Tehuacan 水注入他们鼻孔以逼迫他们供认各种罪行并承认是秘密的工人革命党人民联盟的成员。还威胁说要杀死他们并折磨其家属。

319. 政府答复说因为申诉代理人没有提供所要求的全部文件，全国人权委员会未能得到此案的全部材料。但是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正在得到支持。

320. David Cabanas Barrientos、Ana Maria Vera Smith 和 Blanca Lirio Muro Gampo 1990年6月12日被联邦区法警逮捕。在七天之内，他们多次受到死亡

威胁、毒打，有时他们的头被套上塑料袋或被浸在水中憋得喘不过气来，还有时遭到电击和烟头的烧烫。由于审讯期间遭受酷刑--其影响将持续好几年，Cabanas Barrientos 在一份供词上签了字。他在供词中指控贝尔托华雷斯和瓦恰卡自治大学前校长、全国人民民主阵线领导人 Felipe Martinez Soriano 博士犯有谋杀罪。结果 Martinez Soriano 博士被判处九年监禁。

321. 政府答复说由于全国人权委员会的努力，已中止对北方还押监狱上述被关押者的监禁和隔离并帮助他们获得医治。由于申诉代理人没有提交所需的文件，该委员会没能得到此案的全部材料。但是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正在得到支持。

322. Francisco Quijano Garcia 因与一刑事调查有牵连于1990年6月21日在墨西哥城被法警逮捕。一年后，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上面留有明确无误的受过严重酷刑的痕迹。

323. 政府答复说全国人权委员会已向检察部门提出了建议，要求就此提起刑事诉讼。委员会认为检察部门迄今所采取的行动是不完备的和不能令人满意的。

324. Raul Vázquez Hernández, 15岁，12月8日在塔巴斯科州的比亚埃尔莫萨被捕并被带到警察局。在被单独监禁期间，他浑身上下到处被打，还有人企图勒死他。由于被打伤，他第二天就被送往 Juan Graham 公众卫生医院。

325. 政府答复说塔巴斯科州检察部门已通知全国人权委员会该囚犯并没受到负责关押他的人员的虐待。他自己曾试图上吊自杀。委员会的专家检查确认这青年身上的伤痕是第三者所为。调查还在继续进行。

326. Santiago Jimenez Sanchez 1992年1月8日在塔巴斯科州比亚埃尔莫萨被州警察逮捕。他被带到州检察院并在那里受到拷打，罚吞咽三枚硬币，还有人往他嘴里喷水。他被告知将用手枪枪毙他。几天后，人们不得不将他送进 Juan Graham 医院。

327. 政府说全国人权委员会正在调查这一案件。

328. Jesús Arturo Narváez Herrera 1992年1月26日在塔巴斯科州的 Tacotalpa 被公安警察逮捕。他被关押了几小时，在此期间他遭到了踢打，还有人用枪托对他殴打。

329. 政府回答说主管当局尚没有收到关于这一事件的申诉，因而无法进行调查。

330.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九届会议(1992年11月9日--20日)审查了墨西哥的定期报告。该报告被收入在 CAT/C/17/Add.3号文件。

331. 特别报告员还被告知约有100人，其中多数是 Ch'ol 和 Tzeltal 印第

安社区的成员，1991年12月下旬在恰帕斯州的 Palenque 参加和平示威游行时被捕。他们被带到图斯特拉--古铁雷斯州检察部门。所有人都受到了拷打和死亡威胁。他们一连几天既得不到食物也得不到医治。部分被关押者的姓名如下:Antonio Ramirez Jiménez、Efrain Gutiérrez Gómez、Rámon Parceró Martínez、Lorenzo Gómez Jimenez、Sebastián González Cruz、Francisco González Gutiérrez、Tolentino Gómez Cruz、Victor Méndez González Samuel Benito Pérez 和 Manuel Martínez Pérez。

332. 政府回答说因与上述事件有牵连而被关押的印第安人已获释，包括九名最初被还押待审的人。

摩洛哥

转呈政府的资料

333.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11月12日的信函中通知摩洛哥政府他收到下列报告：警察局经常施用或威胁施用酷刑来恐吓被关押者或逼供。一些被关押者在受到酷刑后死亡。有一个叫 Driss Touati 的，21岁，1991年4月18日在拉杀迪耶被捕，被带到警察局后几小时便死亡。

334. 特别报告员还被告知 Samir Alsadi Jassin 的案件。他是西班牙公民，1989年12月31日在丹吉尔被国家安全警察逮捕后带到其总部。他在那里受到了毒打。警察把他吊起，手臂和两腿被绑在一金属杆上，并打他的脚掌。他于当天被释放。

缅甸

转呈政府的资料与所收到的答复

335. 在1992年8月21日的一封信函中，特别报告员向缅甸政府转呈了他所收到的有关该国施行酷刑的主要指称的概要及若干具体案件。1992年10月26日，政府对此信作出了答复。此外，特别报告员代表根据收到的资料中报告有受到酷刑危险的人员发出了紧急呼吁。政府还对其中的某些案件作出了答复。

(a) 关于一般酷刑行为的资料

336. 根据所收到的报告, 缅甸武装部队(tatmadaw)和准军事保安部队 Lone Htein 继续在该国乡村地区任意逮捕和虐待少数民族与宗教上的少数成员。受害者包括因士兵怀疑其可能是多年来一直与武装部队作战的少数民族游击队的同情者或支持者而遭拘留者; 还有被武装部队逮捕的人, 这些人被迫干搬运工作--运载粮食、弹药和其他补给或扫雷工作。在这些据称受虐待的人中, 有克伦人、孟族人和印度人等少数民族, 这些种族包括了属于基督教、泛灵论和穆斯林等宗教上的少数。政治组织的成员也遭到逮捕、长期单独监禁和遭受酷刑。虐待的方式包括用刺刀割、用棍棒打和用重靴踢。丈夫被抓走当搬运工后妻子遭强奸的现象也很普遍。

337. 关于这此指称, 政府于1992年10月26日答复道: 法律要求缅甸武装部队与准军事部队在履行其职责时严格遵守行为准则, 不准任意逮捕或虐待同胞, 对履行职责时的任何胡作非为绝不姑息。

(b) 转呈政府的具体案件

338. Bo Bo Htun、Yangon 大学物理专业毕业班学生, 于1991年12月9日在 Yangon 艺术和科学大学校园里的一次学生排球赛中被捕, 并据说受到了酷刑。

339. 关于这一案件, 政府报告说, 根据记录没有关押过叫这名字的人。但是, 有一个叫 Bo Bo Han 的人, 1991年12月9日因为在 Yangon 大学主校园娱乐中心的楼上发传单煽动学生闹事而被逮捕。1992年3月25日, 他受到了 Yangon 军区军事法庭的审判, 并且根据《紧急措施法》第5(j)条被判处15年监禁。

340. Magin Sayadaw, 71岁, 和尚, Zaw Myo Win 和 Thein Han, Yangon 的两位律师, 三人皆为 Thayet 监狱的犯人, 据说1991年4月期间遭到了毒打。结果, 他们小便失禁。

341. 关于 Magin Sayadaw, 政府报告说, 他已准备以教授外语为借口从事地下活动。他还成立了一个叫做 YMF 的非法青年和尚阵线, 由他幕后操纵。他于1991年1月15日被捕, 1991年5月6日, 根据紧急措施法第5(j)条被判处七年监禁。

342. 关于 Zaw Myo Win, 政府告知他与一个叫做 Da-Nya-Ta 的非法组织接触并从事制造动乱的非法活动。他于1989年7月24日被捕, 1989年11月20日根据紧急措施法第5(j)条被判处八年监禁。

343. 至于 Thein Han, 政府报告说他带领一伙暴徒, 扬言要对 Yangon 区域选举委员会使用暴力, 迫使其接受 Daw Aung San Suu Kyi 为1990年1月10日和1月11日举行的多党民主大选的候选人。由于这一罪行, 1990年3月9日他被判处三年监禁。1992年7月10日他从 Thayet 监狱获释。

344. 关于上述案件, 政府还告知已采取了适当的法律程序而且在拘留或监禁期间并未施用酷刑。

345. 除上所述, 特别报告员还代表下列人员发出了紧急呼吁。发出呼吁的日期列在相应的概要末尾的括号里。

346. Fazal Ahmed, 争取人权全国民主党党员和 Maungdaw 第二选区的当选代表, 据称1992年6月下旬在若开邦被军方人员拘留。人们担心他和另两名据说与他同时被拘留的当选议员(姓名不详)可能会受到肉体上的虐待。(1992年7月17日)

347. 1992年8月24日, 政府报告说 Faizal Ahmed 因参与企图在布迪当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桥上布雷的活动而被捕。在关押期间, 他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酷刑或虐待。

348. Mohamed Ilyas, 争取民主全国联盟在若开邦 Maungdaw 镇 Myothugyi 村的支部书记, 据称于1992年6月16日被军方人员关押。1992年6月19日在军方拘留期间被打死。(1992年7月17日)

349. 1992年8月24日, 政府报告说 Mohamed Ilyas 因参与企图在布迪当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桥上布雷的活动而被提起诉讼。Mohamed Ilyas 现年65岁, 在对他提出诉讼很久以前就有因为严重胃痛而接受治疗的记录。在被捕期间, 他抱怨有严重胃痛并得到医治。但是他还是病死了。有关他被捕期间被打死的指称不属实。

350. Maung Nay Yein Kyaw, 淡汶学生; Maung Tun Tun, Thaketa 学生; Maung Naing Naing, Thaketa 学生; Maung Soe Naing, Kyimindine 学生; U Tin Tun, Bohtataung 人, U Tun Shein, Pazundaung 看手相者; U Swe Tint, Kanbe 人。这些人于1992年6月8日被捕并在 Mi-7 拘留中心接受了几天的审讯。8月3日他们在 Hlaing 法院出庭受审时, 其中有些人似乎带有肉体受虐待的痕迹, 表明他们受到了酷刑。法庭审问一直推迟到8月17日, 犯人们就被关押在 Insein 监狱内的简陋收容所内。将根据1950年《紧急权力法》第5(j)条对他们提出指控。人们担心他们可能会受到进一步的虐待。(1992年8月12日)

巴基斯坦

转呈政府的资料

351. 1992年10月27日，特别报告员致函巴基斯坦政府并告知他已收到如下有关因政治原因被警察拘押的囚犯经常受到酷刑的材料。酷刑拷打的目的似乎是逼供，当时某些情况下施用酷刑是为了获取反对党政治活动的有关情报。对酷刑负有责任者很少被绳之以法。最常报道的酷刑方法有上脚镣、皮带抽打和倒吊。

352. 另据报道，因政治原因而被警察拘押的女囚犯经常遭到强奸。强奸受害者报案时必须在事发之后的很短时间内作医学检查以便证明其指控是有根据的，而要使法庭接受指控，医学检查必须由警方的医务人员来进行。在此种情况下，拘押期间的强奸案很少能得到审理，因为受害者常常感到十分害怕，不敢让警察进行所需的医学检查。

353. 提请政府注意的具体案件如下：

- (a) Essa Baloch, 因为据称参与了炸弹袭击(事件)被提交卡拉奇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特别法庭受审。他在法庭上陈述说他被倒吊起来鞭打。他的夫人 Khurshid Begum 告知当她1991年11月13日在法庭调查中看见其丈夫时，发现他双手因为皮肤已被刮去而直流鲜血。在参加完他丈夫的庭审以后，便衣警官把她强行推上警车驶往一无人知晓的地方，毒打并强奸了她。
- (b) Rajesh Mittal, 一位印度外交官，据报于1992年5月24日在伊斯兰堡被三军情报局军情处成员逮捕。他被关押了几小时，在此期间，他被蒙住眼睛并遭到殴打和电击；
- (c) 两名记者，即英文日报《民族报》的 Mohammad Ishaq 和信德日报 Aftab的 Shafi Bejoro, 据报他俩于1992年4月28日在信德省 Sanghar 区采访中期选举时被当时执政联盟的警官和武装部队官员拘留。据报，他们遭到脚踢和枪托殴打长达数小时；
- (d) Naseeruddin 由于被误认为是涉嫌谋杀法官而被通缉的政治活动家 Naseer Baloch 而于1991年10月24日被特别调查小组在卡拉奇逮捕。据报告警方拘押他三小时之后，他的尸体被送往卡拉奇公民医院。警方声称 Naseeruddin 在医院里死于心力衰竭；但是据报告，警方外

科医生证实他死于酷刑。

(e) Mohammad Yusuf Jakhrani, 反对党成员, 因涉嫌窝藏暴徒在根特果德被捕, 据称6月12日在遭到军方的酷刑审讯以后死于一所军队医院。

354. 还收到了关于逮捕和虐待政治反对派家属与朋友的报告。Zulfikar Baloch 就是这样与他父亲一起于1991年10月4日被警察从他们在卡拉奇 Malir 家中抓走的。据报告, 在对其父亲的活动进行审讯期间, 他被倒吊拷打。1991年10月12日他被释放时据说身体状况较差。根据他母亲的证词, 他的肩关节脱臼, 全身上下一片青肿。

秘 鲁

转呈政府的资料与所收到的答复

355.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8月21日的信函中通知秘鲁政府他已收到有关秘鲁酷刑案件的资料。秘鲁政府在1992年11月6日的信函中作了答复。特别报告员被告知军队和警察使用酷刑作为一种审讯工具和惩罚方式。在处于紧急状态下的地区, 印第安社区成员在军事设施中受到了酷刑。在城镇, 刑事嫌疑犯、武装敌对集团的可疑成员、工会会员、学生和其他活动分子受到了酷刑。最常用的酷刑方式有毒打、把头浸入水中使囚犯喘不过气来、捆住双臂长时间吊起来以及威胁要杀死囚犯或剥其手足。在实施紧急状态的地区, 军人经常强奸妇女。

356. 报告了下列具体案件。

357. Peter Anderson Rodriguez 是 Jungle 工学院的学生, 1991年6月30日在塔拉波托被士兵逮捕。他被带到莫拉莱斯军事基地后, 被剥光衣服并受到了拷打, 直至失去知觉。

358. 政府答复说 Anderson Rodriguez Flores 于1991年6月被军队逮捕。他被判定犯有恐怖主义罪后现关押在塔拉波托监狱。目前尚未收到声称他受到肉体虐待或酷刑的申诉。

359. Rolando Garcia Navarro 1990年11月25日在圣马丁省(上瓦亚加)塔拉波托州的埃尔绍塞被士兵逮捕。士兵毒打他, 威胁要杀死他并动手把他绑吊。

360. 政府答复说 Rolando Garcia Navarro 向圣马丁省检察署提出了申诉, 声称绍塞军分队司令在1990年11月25日逮捕了他并对他施用酷刑。检察官吩咐他作医学检查, 但是申诉者并未露面。鉴于申诉者没有回音, 检察官决定将此申诉

记录在案。

361. Roger Quinteros Garcia 被士兵关押在塔拉波托并受到拷打、电击等酷刑。

362. 政府答复说 Roger Quinteros Garcia 被军人关押。后来他提出控诉，声称他在军营中受到了酷刑。他去医院作了医疗检查。医疗报告说他的右臼齿部位有伤，左外耳道有血肿，左耳鼓膜受到损伤。医生给他开了五天病假。检查之后，控诉者没再露面，于是决定将此案记录在案。然而高级检察官裁定应请瓦亚加军区的军事指挥员查明有关士兵的身份并应提出正式指控。

363. Henry Bartra Solso1 被圣马丁省莫拉莱斯 Mariscal Caceres 军营的军人关押。他受到了毒打、被绑成痛苦的姿势和浸泡在脏水中，他还经历了假处决。

364. 政府答复说 Henry Bartra Solso1 1990年8月被军人关押，当月21日就获释。没有提出受到虐待的控诉。

365. Limber Garcia Mozambite, 16岁，1991年9月15日在塔拉波托被省技术警察的成员逮捕。他被带到警察局后受到毒打，后不得被送进医院。在那里，他的一只手动了手术。

366. 政府答复说该青年是在塔拉波托练兵场被捕的。当时他是醉酒带枪。在他被捕后，已确认他左手的伤是在他拒捕紧紧抱住栏杆不放时造成的。因为不能归罪于警察，此案被归档保存。

367. Jorge Nabad León Ramirez 1992年1月12日在阿亚库乔他家门口遭到 Los Lince 兵营四名成员的袭击。他被打成肋骨骨折，不得被送进医院。1992年3月6日，军人又袭击了他的弟弟 César Augusto，并用铁棍击打他的鼻子。

368. 政府说内政部已开始进行调查。

369. Olivia Pérez Fernández, 15岁，已怀有7个月的身孕，1992年4月28日受到了瓦亚加军区总部塔拉波托兵营一支军事巡逻队的粗暴虐待。结果，据说她流产了。

370. 政府答复说她的流产是她的男友 Emegardo Pua Vela 被捕前粗暴对待她造成的，塔拉波托地区医院的记录表明 Olivia Perez Fernandez 是在1992年4月16日住院的。挂号记录上写有“有早产危险，怀孕28周，胎儿未受损伤”。她4月23日出院，29日又住院，诊断为早产。应本人要求，她4月30日出院。Emergardo Pua Vela被判定犯有恐怖主义罪，现被关押在塔拉波托刑事看守所。

371. Froyli Mori Vera, 是一位14岁的中学生，1992年6月7日在贝亚维斯塔

省新利马的尤宁遭到了贝亚维斯塔军事基地一名中尉和六名士兵的轮奸。

372. 政府答复说贝亚维斯塔省检察官进行了调查，并于1992年9月15日对驻塔拉波托的 Leoncio Prado 军分队各有关人员提出了轮奸罪的指控。

373. 特别报告员还代表下列人员发出紧急呼吁。每次呼吁的日期列在概要之后的括号内。

374. Reigen Sajami Cumapa 和 Meldin Pinedo Aspajo 是两个农民，1992年4月25日在圣马丁省拉马斯州塔瓦洛索斯的 San Miguel Del Rio Mayo 被一支军队巡逻队逮捕。据说他们在被捕时当着全村人的面就受到了酷刑。(1992年5月5日)

375. 1992年5月6日上午，警察和武装部队的成员试图将“光辉道路”的一些在押犯从利马 Canto Grande 监狱转移。根据收到的资料，这次行动导致了保安部队与在押犯(他们看来已有了武器)之间长达几小时的冲突。冲突造成的伤亡人数不详。人们担心作为对此事件的报复而仍被关押在 Canto Grande 的“光辉道路”的在押犯可能会受到酷刑。(1992年5月18日)

376. 关于这一案件，政府答复说所有囚犯的安全都得到充分的保证，秘鲁政府的作法是不对囚犯实行酷刑。女囚犯现已被转移至经过特别装修专门收容女囚犯的 Santa Monica 女子监狱。事件首先是由囚犯挑起的，他们袭击了进入监狱楼女牢房的手无寸铁的警察。正如美洲间人权委员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团所证实的那样，被转移的囚犯的身心健全是得到保证的。

377. Roli Cachique Amasifuen, 17岁，1992年6月4日在塔拉波托 Juanjui 车站附近被军事情报人员逮捕，并被带往莫拉莱斯 Marisca Caceres 军营。在那里，他的腹部中弹受伤，在医院里躺了30多天都没有得到治疗。(1992年7月9日)

378. 政府答复说该青年于1992年6月30日被军人逮捕并被带往 Leoncio Prado 军分队的驻地。到达驻地后发现他有一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这是他在 Cainarachi 峡谷 Tupac Amaru 革命运动的恐怖主义罪犯和军队巡逻队之间的一次冲突中腹部中弹造成的，为此他已在塔拉波托医院接受了治疗。1992年7月16日，他的案子被移交给塔拉波托州第一区副检察官，结果他被释放。

379. Wilger Saldana Cotrina, 技工; Jose Vega Rivas, 农民; Gipson Tuanama Fasabi、Limber Tuanama Fasabi 和 Luis Alberto Gonzalez Rucoba, 也都是农民; 他们1992年6月22日在圣何塞--德锡萨被军人逮捕。人们担心他们可能有受到酷刑的危险。(1992年7月9日)

政府根据第1992/42号决议提供的资料

380. 政府在一系列的普通照会中就过去12年,特别是1992年秘鲁恐怖主义组织的暴力行为提供了大量资料。1992年头7个月有安全部队306名官兵、1,029名平民、729颠覆分子和10名贩运毒品者丧生。

菲律宾

转呈政府的资料

381.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8月21日的信中向菲律宾政府转呈了他收到的有关下述一些酷刑案件的资料:

- (a) Ricardo Manalac、Mascardo Manalac、Bienvenido Sibal、Ernesto Muli 和 Idelfonso Magcalas 于1991年7月9日被 Santa Rita 和古阿瓜国家警察以及驻邦板牙省圣费尔南多 Olivas 兵营的 RECOM III 士兵们逮捕。他们在被押往监狱的途中,在军车中遭到粗暴的对待;尽管 Ricardo 和 Bienvenido 已经被枪弹打伤,但是 Ricardo 仍然遭到烟头的烫烙, Bienvenido 遭到 M16 步枪托的敲击;
- (b) Terry Pahimnayan 于1992年4月25日在北萨马省的蒙德拉贡Barangay Imelda 被公民武装部队地域分队的士兵逮捕,同时还杀害了他的兄弟, Charito。他被带往 Barangay Imelda 营地,在那儿他遭到了酷刑,第二天才获得释放;
- (c) Nelson Matugas 于1991年5月17日在宿务省 Danao 市附近的 Pili 村被警察以及公民武装部队地理分队的成员逮捕。他遭到严酷的殴打并且被绑住双手悬空吊起,以迫使他承认他是新人民军的成员;
- (d) Jaime Cabohocan 和 Felimon Cabanatan 于1992年4月18日在东萨马省的 Giperles 镇,第一巴兰盖被军队人员逮捕,他们被押往Giperles 监狱,在那儿他们遭到酷刑。当第二天他们的亲属前往探访时,他们两人声称全身疼痛,难于行走;
- (e) Larry G uillema 是内格罗艺术界关心者联合会以及菲律宾学生联盟的成员, 他于1992年6月22日在西内格罗学院门前被一伙身着工作服的

的武装人员逮捕，据认为这伙人是军方情报队的成员。在关押期间，他遭到严厉的拷打并且受到点着的烟头烫烙。

382.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下述有关遭到军方人员强奸的妇女的资料：

- (a) 巴丹省的 Cherry Mendoza 和 Cecilia Sanchez 于1990年12月遭到性骚扰和威胁，以迫使她们承认她们是新人民军的成员；
- (b) Malicbong Abra 的 Julia-An de la Vega, 14岁，于1991年1月27日遭到3名“Cordillera 区域特别行动部队”3名士兵的强奸。尽管医学报告证实了强奸的事实，但未对强暴者采取任何行动。

政府就委员会1992/42号决议提供的资料

383. 政府在1992年8月31日的信中报告，在1990-1992年期间，菲律宾共产党的新人民军、莫罗民族解放阵线和棉兰老伊斯兰解放阵线不断地犯下了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同时，人民武装部队地域分队以及民众自愿组织也被认为应为这些侵犯人权行为承担责任。

大韩民国

向政府转呈的资料

384.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11月12日的信件中向政府转呈了他收到的下述资料：资料涉及到四名于1992年8月根据全国治安法，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被捕的人，他们被押往全国治安规划署，并且不允许同律师联系。还有报道称，在整个审讯期间，他们遭到殴打并且不准睡觉。这些人的名单如下：Kim Nak-jung 8月15日被捕和 Shim Keum-sup、Kwon Du-young 和 Noh Jong-sun，于8月27日被捕。

俄罗斯联邦

向政府转呈的资料

385. 特别报告员于1992年8月4日就圣彼德堡 Kresty 预审监狱的监禁情况向俄罗斯联邦政府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根据报告，1992年2月27日大量囚犯遭到殴

打,其中一名被毆致死。据报道,此后又发生了其他一些毆打囚犯的事件。在这些据称遭到此类虐待的囚犯中有Pavel Posokhov、Valery Alexeev、Igor Mazurov、Anatoly Morozov 和 Yury Lovric 等人的姓名。此外,据说,Kresty 监狱的囚室十分拥挤,卫生条件极差而医疗照顾实际不存在。

卢旺达

向政府转达的资料及收到的有关答复

386.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8月21日的信中通知政府他收到有关在1990年10月大批逮捕行动之后数月内囚犯受到酷刑的报告。据称,在逮捕时就曾使用暴力,随后在中央情报处、保安警察和国家宪兵进行审讯时又施酷刑。据报告酷刑发生最多的拘留中心是被称为“中央档案”和“刑事处”的 Kigali 中部的宪兵营、Gikondo 和 Muhima 拘留中心和在 Kigali 的武装部队总部。下面是报导的一些案件:

- (a) Charles Mukuralinda 于1990年10月被捕, 并被送往 Gikondo 的国家宪兵拘留中心。他被转送到卢旺达西北部的 Ruhengeri 大监狱。在审讯时,保安警察抽打他和踢他并将电线绑其右手。他被禁闭在被称为黑洞的没有光线的牢房内数日之久;
- (b) Donatien Rugema 被保安警察于1990年11月16日逮捕并被以电缆拷打。他被带上手铐,关进黑洞数日;
- (c) “Kaberinka”报刊的 Godefroid Nshimiyimana 于1991年12月6日被捕。在他被拘留的三天中,他受到严刑拷打。
- (d) “Umurange”报刊的 Boniface Ntawuyirushintege 于1991年12月被捕,并在 Kigali 的保安警察总部受到拷打。

387. 由于在任意拘留方面没有保障,特别是不准家人、律师和独立的医生接触被拘留者,酷刑和虐待就变得很普通。其他的因素包括欠缺对拘留的司法监督,被捕后的拘留期达数星期和数月之久;及在审讯案件时,被告作证说受到酷刑,但国家安全法庭却不下令调查。

388. 特别报告员另外接到有关在被军队拘留时受到虐待的报告。军队将囚犯捆绑的方式使他们受到伤害。手臂在手肘以上被紧绑背后。在一些情况下,腿被吊起绑到手铐上。在许多情况下,由于绳索把手臂捆得太紧而引起受伤。

389. 特别报告员代表 Totsi 少数民族的八名成员向政府提出紧急呼吁。这些成员是：Shabani Gasiwga、Ali Hitimana、Kayziranga、Hadj haruna Maboyi、Louis Nkusi、Evariste Sissi、Bosco Uwizeyimana 和 Mbundi 的儿子 Vianney。他们据说是在六月被逮捕的，并被控协助为反对党卢旺达爱国阵线吸收支持者。他们被拘留在 Kigali “中央档案”拘留中心并受到酷刑。然后他们被转往 Kigali 中央监狱。恐怕他们会再次受到虐待。

390. 政府于1992年9月3日通知特别报告员，上述人士被逮捕，他们是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不是因为种族成分而被控诉的。临时拘留的所有程序都得到遵守对被指控曾在逮捕犯人时虐待他们的司法警察的行为已在提出司法调查，并正在由 Kigali 初审法庭审讯。根据政府与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停火协定，上面提到的所有人都于1992年7月17日被释放。

沙特阿拉伯

向政府转呈的资料和收到的有关答复

391. 特别报告员为以下一些人发出了紧急呼吁。这些紧急呼吁的发出日期在以下相应摘要的结尾括弧中注明。

392. Muhammad al-Fasi 是一名沙特阿拉伯商人，他于1991年10月2日在安曼被约旦的治安部队逮捕，并随后转交给沙特阿拉伯当局。据报道，他被单独监禁在利雅得的调查总署(al-Mabaheth al-'Ammah)，并据说，他不断遭受诸如对他全身进行殴打和打脚板之类的酷刑。还据报道称，他在整个监禁期间都带着手拷脚镣，并且长时间地被蒙住眼睛(1992年2月14日)。

393. 叙利亚国民 Maha Sa'ad-ul-Din Banat 于1992年3月10日被利雅得的 Shariah 紧急事务法庭判处鞭笞200下。Maha Banat 被指控为与 Ahmed al-Zahrani 通奸，但是她声称她根本不认识这个男人。沙特公民 Ahmed al-Zahrani 被同一法庭判处3个月的监禁和鞭笞100下。由于正值斋月期间，鞭笞被推迟执行。据报道，Maha Banat 以及她15岁的女儿 Ansaf Banat 和 Ahmed al-Zahrani 被“颂扬美德和防止邪恶委员会”的成员逮捕。这是在 Maha Banat 指责 Ahmed al-Zahrani 向她的女儿提出要求而引起两者之间争吵之后，他们俩于2月12日在利雅得被捕的。这场争吵引起了颂扬美德和防止邪恶委员会一位成员的注意。显然为了否认上述指控，据称 Ahmed al-Zahrani 声称，他曾经给

了 Maha Banat 500里亚尔的性酬金。他们三人被押往颂扬美德和防止邪恶委员会设在利雅得 al-Muraba' 总部。在审讯期间，据称 Ahmed al-Zahrani 遭到殴打，并且被迫在一份供述他与 Maha Banat 发生性关系的招供上签字。据报道，Ansaf Banat 也遭到威胁并且被迫签署了一份声称其母亲认识 Ahmed al-Zahrani 的招供。Ansaf 在五个小时以后被释放，而她的母亲在监狱中关押了4天，据报道未提供给她任何食品。最后，利雅得 Shariah 紧急事务法庭指控 Maha Banat 和 Ahmed al-Zahrani 通奸并且下达了上述判决。据报道，当时既无辩护律师，也无证人出庭，而且不可能对该法院裁决提出申诉。(1992年4月13日)。

394. 关于此案件，政府于1992年4月23日的报告称，指控纯属捏造。如果真有其事，叙利亚驻利雅得大使馆将会毫不犹豫地与沙特阿拉伯的主管当局进行接触。

塞内加尔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在以往报告中提到的案件的资料

395. 政府在1992年3月25日的复信中，就特别报告员1991年2月14日信中提到的 Bibta Niassy、Lamine Sane、Fatima Diatta、Louis Sadio 和 Kartiak 的其他居民和 Atome Manel Diatta、Viviane Sagna 和 Colobane 区其他妇女的案件(见 E/CN.4/1992/17第199和200段)作了答复。政府说：“塞内加尔当局，不论是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都没有接到据称的受害者、律师甚至是匿名消息提供者的控诉……但是，只举下列两个例子，RP第19/90号档案中的 Atome Manel Diatta Viviane Sagna在被预审法官起诉后于1990年6月26日被关押，他们尽管可得到律师的协助，却从未作出这方面的声明。”

396. 政府也提到 Samuel Assoua Diabone、Sekou Mary 和 Gabguilo Djiballene 的案件。特别报告员的信中说，他被告知上述人士由于酷刑致死。

397. 政府说，检察长已下令对 Samuel Assoua Diabone 的死因进行调查。由于调查的结果，Ziguinchor 预审法官已提起诉讼。

398. 关于 Sekou Mary 一案，已开始调查，但医疗证书中只提到表面损害、面部肿胀和左肘水肿。这些损伤不足以解释 Sekou Mary 的死亡。她的死亡可能是由于某种疾病。她的尸体没有经过解剖。她的父母亲也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只是领取了女儿的尸体埋葬。检察长不认为需要开庭审讯，因为从表面来看，并无他杀的证据。

399. Ganguilo Djibalene 被指控组织一个非法的协会，并密谋破坏政府的权力和国境的完整。他于1990年6月27日被拘留，同日被送往 Aristide le Dantec 医院的特别病房，为的是“由于皮肤多处擦伤化脓形成的传染性综合病征。”他于1990年7月1日死亡，调查并未能确定死亡原因。死者在 Casamance 被捕，在被转移到主管法官的所在地达喀尔之前曾入医院治疗。

南 非

向政府转达的资料

400.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11月12日的信中向政府转达了他收到的下述一些因酷刑而死亡的案件资料：

- (a) Solly Maele Mogashoa 是 Phalaborwa, Namakgale 的一名教员，也是南非民主教师联盟的一名积极成员。根据目睹者，他于1991年10月13日被驻扎在德兰士瓦省 Phalaborwa, Namakgale 警察所的 Lebowa “家园”警察逮捕并遭到殴打。然后，他被押往 Namakgale 警察所，随后于1991年10月14日在警察所死亡，显然这是在遭到进一步殴打后所致。一位曾经对死者尸体进行私下检查的病理学家报告，Solly Maele Mogashoa 多处被打伤，包括头颅破裂和肋骨折断，而且全身上下有多处青肿紫块。这位病理学家裁定，他的死因是头颅破裂，硬膜外出血和休克所致。为此，Lebowa 警察部队的两名警官遭到谋杀的起诉；
- (b) David Mokgalaka 是 Lichtkraal 农场的农业工人，他于1991年11月1日被驻扎在 Louis Trichardt 的南非警察成员逮捕。根据报告，他的双手被反绑至他的双脚，然后这些警方成员握紧拳头对他进行拳打脚踢，并踩在他的身上。同时，他还遭到皮鞭的抽打。随后，他被押上警车带走。当天晚些时候，有两名南非警察来到 David Mokgalaka 的家中，把他的父亲和祖母带往 Louis Trichardt 警察局，他的祖母认出了他的尸体，头上的伤口仍在流血。根据一名独立病理学家对死后的尸体进行的检查，死亡是由于他头部被子弹打伤所致，同时在他的胸口以及他的一个手臂上也发现了其他一些枪伤。同时尸体的全身上下发现由钝器敲击造成的青紫块。

西班牙

向政府转达的资料和收到的有关答复

401.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8月21日的信中通知政府他收到据称在西班牙发生的酷刑案件的报告。他于1992年11月2日收到有关下列案件的答复：

- (a) David García Gomez 是一名学生。他于1992年3月21日在家中被国家警察逮捕，并遭到殴打和威胁。政府说 David García Gomez 由于被疑是 ETA-M 恐怖分子组织的一个支助集团的成员，于1992年3月20日被 Bilbao 警察总局的警员逮捕。他于3月22日在一名法庭指派的律师出席的情况下在警察局作了供词。3月24日他被预审法官的第1号法庭接管。若干司法委员会于3月21、22和23日对他进行了体格检查，并没有发现他受到酷刑的证据。司法当局没有再采取行动，并决定不提起诉以确定事实的刑事诉讼。
- (b) Mario Artola Mebdibe 于1992年1月6日在他 Donostia 的家中被保安警察拘留。他遭到严重殴打，特别是左腿，胫骨和腓骨都折断。政府说，Artola 先生由于被怀疑是 ETA-M 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被捕。他看到保安警察来时，企图从屋后逃走，从一楼跳下。当他跌到地上时，警察命令他站住。他不单没有站住反而开枪。为了防御，保安警察向他腿部开枪以免造成致命伤。嫌疑犯由于跳楼跌伤，左腿折断。被捕后他立即被送往 San Sebastian 红十字医院，直到医生允许将他移往 Gregorio Maranon Madrid 省医院。预审法官后来下令将他转移到监狱总医院。嫌疑犯从未被关在警察所里。他一直在医院里，他的供词也是在律师出席的情况下录取。在医院途中乘的也是救伤车，医疗人员从未提到或抱怨说他受到看管人员或其他人的虐待或酷刑；
- (c) Jon A rriaga Gorizelaia 于1992年1月29日在 Gernika 被保安警察逮捕。他被殴打和威胁，头上被套上塑料袋，几乎把他闷死；
- (d) Imanol Elorriage Bilbao 于1992年1月29日在 Gernika 被保安警察逮捕。他被殴打并被施以电震，并威胁对他妻子施酷刑；
- (e) Juan Ramon Rojo 于1992年1月29日在 Basauri 的家中被保安警察逮

捕。他受到侮辱和火器的威胁，被拉着头发到处跑，身体的敏感部分并受到殴打；

- (f) Josu Eguzkiza 于1992年1月29日在他 Santurtzi 家中被保安警察逮捕。他被殴打，施以电震，遭受性骚扰和被假装行刑；
- (g) Inaki Bereziartua Gonzalez 是一名学生，他于1992年1月29日在 Bilbao 家中被保安警察逮捕。他被殴打和施以电震。
- (h) Pedro Cacigal Becerril 于1992年1月29日在 Barakaldo 家中被保安警察逮捕。他被殴打四五个钟头并被迫再三屈膝；
- (i) Itxaso Sevillano Vidaurre 已怀孕七个月，于1992年1月29日在 Gernika 家中被保安警察逮捕。他受到性骚扰及替她进行人工流产的威胁；
- (j) Encarni Blanco Abad 于1992年1月29日在 Santurtzi家中被保安警察逮捕。她被套上头罩，遭受恶打。她也受到性骚扰；
- (k) Paula Garcia Rodriguez 于1992年1月29日在 Basauri家中被保安警察逮捕。她受到侮辱、死亡威胁、手、腿和肚皮上都被殴打和施以电震。保安警察威胁对她儿子施刑；她并被迫听着她丈夫受酷刑。
- (l) Itziar Amezaga 于1992年1月29日在 Getxo 家中被保安警察逮捕。她被套上头罩和受到殴打，又用塑料袋将她头罩上。她也受到性骚扰；
- (m) Jose Maria Arazamandia 是一名工人，他于1992年1月29日在 Elorrio 家中被保安警察逮捕。他受到重打；
- (n) Maria Angeles Larrea 是主妇，她于1992年2月1日在 Getxo 家中被保安警察逮捕。她被殴打和受到性骚扰；
- (o) José Felix Marias Matyrana 是工人，他于1992年2月3日在 Elorrio 家中被保安警察逮捕。他被殴打和施以电震；
- (p) José Maria Azpitarte Ispizua已退休，他于1992年2月5日在 Bermeo 家中被保安警察逮捕。他被殴打和受到威胁。
- (q) Rosa Maria Aran Txakartegi 是工人，她于1992年2月5日在 Gernika 被保安警察逮捕。她受到殴打，头上被罩上塑料袋，身上敏感部分被施以电震。她并受到性骚扰；
- (r) Begona Ezkerra 是女侍者，于1992年2月6日在 Bermeo 被保安警察逮捕。她被迫再三做屈膝动作，受到殴打和性骚扰，并几乎被罩在头上的塑料袋闷死；

- (s) **Alejandro Casanova** 是侍者, 他于1992年2月25日在 **Barakaldo** 被保安警察逮捕。他被迫再三做屈膝动作, 睾丸、胃部和腰子都受到殴打;
- (t) **felix Gonzalez Huidobro** 是失业者; 他于1992年2月25日在 **Barakaldo** 家中被保安警察逮捕。他受到重打, 几乎被头上罩的塑料袋闷死, 并被施以电震;
- (u) **Estanislao Davadillo** 是电工; 他于1992年2月25日 **Barakaldo** 家中被保安警察逮捕。他被恶打, 施以电震并受到性骚扰。

402. 政府声明所有上列人士都受到正当的待遇。他们一直处在司法监督下, 因为高等法院的执勤法官和逮捕所在地的法官在逮捕发生后立刻接到通知。除了 **José Felix Marias Maturana** 和 **José Maria Azpitarte** 在分区总部被释放外, 所有其他被拘留者都被带往保安警察总部, 并拘留在那里直到他们作了以后向国家法院呈交的供词。在总部时他们得到国家法院法医的诊断, 法医并没有报告他们之中任何人身上有伤痕。

403. 特别报告员被告知, 根据刑事诉讼法, 由于嫌疑与一伙武装人士有关系而被逮捕的人, 在得到司法当局批准后, 可被单独禁闭达五日之久。嫌疑犯家人不被通知拘留的事和拘留的地点。法庭指派一名律师。根据消息来源, 这种做法有助于酷刑的施行。

404. 特别报告员于1992年3月13日作出一项紧急呼吁。这是关于一伙关在加那利群岛 **Las Palmas** 的 **Salto del Negro** 监狱中的犯人绝食行动。这些监犯的姓名是: **Itziar Arrizabalaga Osa**、**Patxi Cabello Perez**、**Inaki de Juana Chaos**、**Ander Errandonea Arruti**、**Esteban Esteban Nieto**、**Jon Etxeandi Zorroza**、**Jon Gaztelumendi Uribarren**、**Pedro Guridi Arozena**、**Joxean Kortadi Alustiza**、**Manuel Muinõs García**、**Xabier Oregi Etxebarria**、**Jon Tapia Irujo**、**Daniel Vidal Magallanes** 和 **Jose Ma.Zabarte Arregi**。据报道这些监犯不断受到殴打, 并被关在惩戒监房中。其中两名, **Jon Etxeandia Zorroza** 和 **Daniel Vidal Magallanes** 于1992年2月1日受到恶打, 因而引起绝食。据报导, 监犯没有医疗照顾, 他们的家人探访时发现其中一些人的健康很差。

405. 1992年4月14日政府说没有发生过殴打、虐待和类似行为。所提到的监犯都在服长期徒刑, 为了保安原因受到管制和监督。在犯人由于不服从命令或可能引起的危险而被单独禁闭时, 所采取的措施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即被单独禁闭的犯人的牢房应与监狱的其他牢房一样, 并由监狱医生对单独禁闭的犯人进行每日视

察和提出报告。如果监犯生病，他回到原来的牢房服刑并有权每天作一小时的活动。绝食并不是由于犯人受到指称的虐待。于1991年底开始并于3月15日结束的绝食抗议是按照为所有西班牙监狱里的ETA犯人预先制定的总计划进行的，为的是对当局施加压力。在绝食抗议开始之前，犯人已累积了高能量和高蛋白质的食物。在整个绝食抗议期间，他们受到不断的和个人化的医疗照顾。

406. 1992年5月21日，特别报告员替于1992年4月24日在 Salta del Negro 监狱里开始进行另一次绝食抗议的12名犯人又提出了紧急呼吁。根据收到的资料，进行该次绝食抗议是由于监狱当局没有执行早些时候达成的协定。绝食者的健康情况据说引人关怀。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以往报告所列案件的资料

407. 1992年2月10日，从政府收到了关于 Maria Arrate Lejarza、Estibaliz Lejarza 和 Jesus Maria Salterain 案件的答复。他们是于1990年11月被逮捕，据称受到酷刑(E/CN.4/1992，第207段)。答复中指出，这些于1990年底向反对酷刑委员会提出的案件，从来也没有向西班牙司法当局投诉。

408. 政府说，Lejarza 兄弟是于1990年11月18日被捕，次日并接受体格检查。检查并没有显示体外伤痕。1990年11月21日进行第二次检查，也没有发现被虐待痕迹。同日，他们在律师出席情况下向法官作供说并没有遭到虐待。

409. Jesus Maria Salterain 于1990年11月19日被拘留。他被带往马德里第5号中央预审法庭的法医那里，并告诉法医他遭受殴打，被施以电震，并几乎被置在他头上的塑料袋闷死。他于1990年11月21日对预审法官、检察官和他的律师作了同样的声明，法官和检察官都不认为有必要调查 Salterain 先生所宣称的事件。被告律师也没有提出这方面的要求。

斯里兰卡

从政府收到的有关以往报告中所列案件的资料

410. 政府于1992年3月31日就 Florence Ariamalar Gnanakone 的案件作了答复。特别报告员曾于1991年5月22日就她的案件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E/CN.4/1992/17，第208段)。根据资料来源，她于1991年5月9日在科伦坡被刑事调查局逮捕；

1991年5月9日至15日她被关押在警察总部，在那儿，她遭到了严重的虐待。5月15日她被转送入科伦坡总医院，但是48小时之后，她又被押往 Welikada Remand 监狱，在监狱中她遭到身体上的凌辱。

411. 根据政府的答复，Ariyamalar 夫人是因持有海洛因而被捕的，并被押往警方的禁毒局。第二天，她的亲属被批准与她谈话并向她提供食物和药品。同一天，她被交给地方法官，法官命令把她立即转送 Welikada Remand 监狱。在警方禁毒局关押期间，没有任何一名警官对她进行骚扰或虐待。

苏 丹

向政府转达的资料和收到的有关答复

412. 特别报告员于1992年8月21日的信件中向政府转呈了他收到的下述一些指控在苏丹发生的酷刑案件材料：

- (a) Ahmed el Hussein, 联合民主党副书记，前任内务部长兼前任总理，据报道于1992年5月遭到治安部队的逮捕，殴打和酷刑；
- (b) Bothaina Doka 是在喀土穆公民医院工作的一名来自 Huba 山的护士，她于1990年12月被治安部队逮捕。在被关押期间，警方官员塞住她的嘴，(并从她背后)捆住她的双手和双脚悬吊在天花板上，并从早到晚进行殴打。不给她吃东西，不许上厕所，还威胁要强奸她；
- (c) 记者 Sharaf Eldin Yassin Mahmond; Nur al-Huda Mohamed Nur al-Huda; Iqd al-Jallad 乐队队长, Jamal Ibrahim; Iqd al-Jallad 乐队成员, Uthman al-Naw; Iqd al-Jallad 乐队成员, Omar Bannaga; Iqd al-Jallad 乐队成员, Anwar Abdelrahman; Iqd al-Jallad 乐队成员, Muhammed Shammatt; Khartoum 大学研究生院学生, Muhammed Mahmoud; 商人 Abdallah Muhammed Ahmed; 商人 Abdelwahid Muhammed Ahmed; 喀土穆大学雇员, Adel Hassan; 喀土穆大学工程系雇员, Al-Sir A b delkarim; 喀土穆大学农业系雇员, Baha's al-Din Hassan Daoud; 被禁报刊《al-Thawra al-Shaabia》记者, Omar Muhammed Saleh; 书画艺术家, Salah Sulayman Bakheit; 书画艺术家, Ali al-Amin; 报刊《al-Quwat al-Musallaha》记者, Abdelwahid Warrag; 书画艺术家 Al-Mardi ak-Mualim; 商人 Muhammed Ali; 书画艺术家

Mahmond Jah-Allah; 苏丹河航运局船长, Mustapha Ahmed Hassan; 士兵 Al-Amin Kuku Omdurman, al-Khalifa 清真寺的伊玛目, Muhammed al-Mahdi。上述是于1991年7月被捕的64人中的一些人员,这些人被押往国家治安机关的总部,在那儿他们遭到严重的殴打和死亡威胁。几天后,他们被转押至被称为“鬼宅”的 Beit al-Ashbah 拘留营,在那儿继续遭到用警棍和皮鞭持续若干小时的殴打。在Beit al-Ashbah 关押期间,他们与一些也遭到严重殴打和威胁的其他被拘留者关押在一座牢房里。那些人的姓名是: 经济学家 Adulaziz Gaafer, 记者 Abu-Bakr al-Amin; 商人 Alaa Eldin Himoura; 政府雇员 Adel Abul-Qassem; Muhammed al-Balla Abdallah; 被指控为从事间谍活动的埃及公民, Atef Amin; 埃塞俄比亚公民, Idris Muhammed; 埃塞俄比亚公民 Sulayman Muhammed Nur; 埃塞俄比亚公民 Tambai; 埃塞俄比亚公民 Taha Abdul-Gadir; 工会成员 Omar Adlan; 学生, Abdul-Rahman Ibrahim; 商人 Ali al-Umdah; 工程师 Mustapha Youssef; 和大学教员 Ibrahim Bakht;

- (d) 据报告, 喀土穆大学精神病学系主任, Ahmed Osman Sirraj 于1990年9月9日被捕, 并被押往治安总部。他被单独监禁了5个月, 在此期间遭到酷刑;
- (e) 工程师, Siddig Yousif Ibrahim 于1990年1月被捕, 和记者 Abu Bakr Al Amin 于1990年11月被捕。据报告, 上述两人遭受了一个月的严刑拷打, 然后才转押至 Kobar 监狱;

413. 政府于1992年11月23日就上述这些案件的报告称, 已经任命了由检察官为主席的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根据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 上述有些人根本未遭到监禁, 除一人之外, 上述被拘留者都未向主管当局提出声称遭到酷刑和虐待的上诉。就上述例外案件而言, 应承担责任的官员已经遭到审理并被判处一年的监禁。

414. 政府还报告称, 1990年初开始在国内到处流传着施行酷刑的谣言。为了能够区分证据确凿的案件与纯属政府反对派编造的谣言, 对国家治安法第(40)条进行了修订。经过修订之后, 司法机构被授权对任何酷刑或虐待的指控进行调查。并指定一名最高法院的法官受理并调查此类指控。此外, 并授权检察厅的一名律师探查所有拘留中心。他被授权可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拘留中心, 调查任何有关酷刑或虐待的上诉。

415. 已经被废除的1983年《刑法》并未载有禁止酷刑或虐待被拘留者的条

款。1991年的《刑法》(第115条),首次规定了对拘留者施行酷刑和虐待是一项应受到监禁惩治的罪行。上述措施表明,政府决心制止酷刑并惩罚任何违反这一政策的人。

416. 除上述案件外,鉴于有人担心下述一些人员可能会遭到酷刑,特别报告员就他们的案件发出了紧急呼吁。这些紧急呼吁的发出日期在以下摘要末尾的括弧中注明。

417. 据报告,被禁的苏丹铸币工人工会主席,铸工 Ali Al-Mahi Al-Sakhi 以及工人 Muawia Umran 于1991年11月的第三周,在喀土穆因政治原因被捕。据报告,Abdel Aziz Dafalla 和 Abul Hassan 也在差不多同时遭到逮捕,显然与在喀土穆散发反对派的传单有关。上述四人相信已在不予起诉和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在秘密拘留营。同时还有报道称,自1989年11月以来另外还有一些人遭到逮捕,被押往秘密拘留营,在那儿遭受到酷刑(1991年12月20日)。

418. Mustafa al-Tay 上校和其他40名在陆军和空军中服役的军官于1992年2月2日因参与被指称的政变阴谋而在喀土穆和 Omdurman 遭到逮捕,并据说被关押在由“革命治安部队”拘留营。据报告,被关押在那些集中营中的人,往往会遭受到诸如鞭笞和烙铁焚烫等严刑拷打。(1992年2月14日)

419. 来自喀土穆的工程师, Awad al-Sharif 于1992年1月1日被捕; Philip Akot Akok 曾任苏丹南部地区议会成员并是 Dinka 民族团体的成员。他于1992年2月中旬在喀土穆被捕; Adnan Zahir Surur 是律师,他于1992年2月12日左右在喀土穆被捕; Kamal al-Gizouli 是律师兼苏丹作家联盟的秘书长,他也于1992年2月12日左右在 Khartoum 被捕; Makoi Wuol Manuer 是苏丹教会理事会的重新安置方案主任以及来自Bahr al-Ghazal 的 Dinka 种族团体的成员,他于1992年2月9日在喀土穆被捕。根据收到的资料,上述这些人在既未遭到起诉或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在喀土穆的治安总部或被关押在一所秘密拘留营。(1992年3月30日)

420. 前任赤道省省长, Peter Cirilio 和朱巴省的警察总长, Nicola Aboya 于1992年6月中旬在朱巴省被捕,因为他们被怀疑在事前知道即将发生的叛乱而未向当局通报。还据称,在关押期间他们遭到酷刑,并且被转移至喀土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点。(1992年7月17日)

421. Omar Mohamed Mokhtar、Salah Mohamed Idris、Magdi Mohamedani、Mokhtar Fadul 和 Shehab Ahmad Gaafar 都是工会成员,他们于1992年8月下旬被捕,被单独监禁在喀土穆。据说,他们被监禁在首都其中一所被称为“鬼宅”的拘留营里,这些拘留营是由政府的治安部队管理的。(1992年9月25日)

422. 据报道, 记者 Mohamed Sid Ahmed Atig 和 Tigani Al Hussein Daffa El Sid 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 于1992年5月在喀土穆遭到逮捕, 并遭到单独监禁。据报告, 他们遭到酷刑, 并且很有可能进一步遭到此种虐待(1992年10月23日)。

从政府收到的有关前几次报告中所列案件的资料

423. 政府于1992年1月24日转呈了有关 Muawia Gaffaar、Zein Al-Abdeen Eltayed 和 Adnan Zahir Surur 案件的资料。特别报告员曾就上述这些的案件于1991年11月4日发出过紧急呼吁(E/CN.4/1992/17, 第219段)。关于 Muawia Gaffaar, 政府说正在进行调查。关于 Zein Al-Abdeen Eltayed, 据报告他从未遭到拘留。至于 Adnan Zahir Surur, 他已经获释, 有关他曾经遭受酷刑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捏造。

424. 政府还于1991年12月19日呈送了以下资料, 根据该资料, 高级法院并没有批准对 Haroun Abdel Karim 的“交叉截肢”(cross-limb amputation)的刑罚, 并将其改为终身监禁(E/CN.4/1992/17, 第218段)。

瑞 典

向政府转达的资料和收到的有关答复

425. 特别报告员于1992年4月10日就土耳其公民 Ahmet Aktas 一事向瑞典政府发出一份紧急呼吁, Aktas 是1991年6月25日被捕的, 1991年10月被 Gota (Hovratten) 法院判定为强奸罪, 判处5年监禁。他被关押在 Kumla 监狱。根据收到的资料, 他曾经多次遭到毒打。特别是1991年12月20和23日, 由于他拒绝签署一份他看不懂的瑞典文文件而遭到殴打, 1992年1月13日因为要求递送包裹, 再次遭到殴打。有人担心他可能还会受到虐待。

426. 政府于1992年5月8日送来了一份 Kumla 监狱典狱长的报告, 对此案件作了答复。根据报告, Aktas 是一个精神失常者, 他难以接受他的状况, 无法适应监狱的规则。1992年4月3日, 他无端地袭击一名监狱看守, 致使这名看守受了轻伤。一两天之后, Aktas 先生在监狱中作了例行肺部X光, 检查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他还试图劝说一名高级护士出具书面证明, 证实他曾遭到殴打, 但是由于

Aktas 先生在袭击看守时这位护士当时不在场，而且他本人没有明显的受伤痕迹，因此这位护士无法填写证明。Aktas 关押在 Kumla 监狱期间的医疗报告没有任何受伤的记录。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向政府转达的资料和收到的有关答复

427. 特别报告员于1992年10月27日向政府转达了他收到的资料，根据资料，各类治安机构经常使用酷刑，作为对嫌疑者提取口供的手段以及惩罚的形式。尽管宪法规定禁止使用酷刑，并且根据《刑法》应受到监禁的惩罚，但仍有酷刑发生。酷刑的手段众多，包括对身体各部位进行抽打：falaga（抽打脚板）；dullab（轮胎式的悬吊方式，把受害者捆在悬空的轮胎上，用棍棒和缆索抽打他或她）；和向受害者身上泼凉水。这里具体报道了 Aktham Nu'aysa 的案件。他是一名41岁的律师，因为他与所谓的叙利亚维护民主自由和人权委员会的活动有关，而于1991年12月被捕。据报道，他遭到严厉的酷刑，必须接受治疗，被送进大马士革附近的 Harasta 的军方医院。

428. 据报道，下列人士在警察关押期间由于酷刑而死亡：

- (a) Muhammad Dawud（也有人称之为 Abu Dawud）上校，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名高级成员，他于1990年12月或1991年1月死于 Saidnaya 的监狱的囚室中。据称，前一天他曾遭受过严刑拷打。据报道，对他施酷刑的原因与巴勒斯坦人和其他囚犯唱歌庆祝被占领领土起义的活动有关。他显然被怀疑为这次唱歌活动的策划者；
- (b) 据报告，Ziad Musa Qatnani 于1990年5月8日死于大马士革的 Fara' al-Tahqiq al-'Askari。在他死前的一个月，其母亲曾探访过他，当时他似乎相当健康。但是，当他的尸体被送还其家属时，尸体上显然有用电施行酷刑留下的痕迹，而且他的头颅也被打破；
- (c) 据报道，一名土木工程师 Munir Francis 于1990年4月死于酷刑。他是由于内出血，被送入大马士革的 al-Muwassat 公民医院以后去世的。他的尸体被交回家人，尸体上显然有遭到殴打的痕迹。

429. 除以上这些外，特别报告员还就下述一些人的情况发出了紧急呼吁，人们担心这些人在遭受单独监禁之时，可能会遭到酷刑。以下各段摘要末尾的括弧中

注明了发出紧急呼吁的日期。

430. 据报道, Aktham Nu'Aysa、Muhammad 'Ali Habib 和 Amjad Bahbuha 于1991年12月18日在 Latagiyya 被 Al-Mukhabarat Al-'Askariyya (军方情报部)的成员逮捕,并遭到单独监禁,既不能见律师也不能见他们的亲属。还有报道称,他们都遭到酷刑,并且由于酷刑, Aktham Mu'Aysa 感到肾发生疼痛,不得不送入大马士革附近的 Harasta 军方医院。(1992年1月24日)

431. Samir Mu'Aysa 是一名土木工程师,他于1992年1月18日在 Latagiyya 被军方治安部的成员逮捕。据报道,他的被捕是为了对他的兄弟, Aktham Mu'Aysa(在 Harata 军方医院被单独禁闭)施加压力,以迫使后者供出叙利亚维护民主自由和人权委员会的情况。(1992年2月7日)

432. 针对这一案件,政府于1992年3月26日的报告称, Samir Mu'Aysa 的逮捕并不是为了迫使其兄弟供出叙利亚维护民主自由和人权委员会的情况;他的逮捕是与其参与非法的共产主义行动党有关,而且其兄弟也是为此被捕的。这件事与维护民主自由和人权委员会毫不相干,毫无道理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企图寻求人们对该党行动的宽容,并且争取各国际组织的同情。上述该党从事的暴力行动的受害者对 Samir Mu'Aysa 提出民事诉讼,起诉是当着他的律师提出的,并且根据该国遵循的法律和人道主义程序进行了审讯。

433. 医生 'Abd al-'Azis al Khayyir; 前医科学生 Bahjat Sha'bu 和来自 Latagiyya 的 Khadija Dib 据报道于1992年2月初在大马士革因与被禁止的 Hizb al-'Amal al-Shuyu'i, 即共产主义行动党有关,而被军方情报部的成员逮捕。(1992年2月18日)

434. Akram Salim Ishti 是一名医生兼贝鲁特美国大学的讲师,据报道,他于1992年1月在贝鲁特被叙利亚治安部队逮捕,押往大马士革;据报道,黎巴嫩公民 Dani Mansurati 于1992年5月9日在他的朋友带着他驱车行驶在大马士革的街上时,被军方情报部的成员逮捕;据报道,他被单独禁闭在大马士革空军情报部的总部。据说 Rozit 'Isa 是于1992年2月被 Amn al-Dawla, 情报总部的成员逮捕的。据说大马士革 Dar al-'Asimah 出版社的经理, Marwan Ghazi 因与纳赛尔主义民主民众组织有关,于1992年3月9日在大马士革被捕。Ahmad Hassu 是一名叙利亚库尔德人和前医科学生,据报告,他于1992年3月17日被大马士革的 Amn al-Siyassi 政治治安部的成员逮捕,并且据认为他被关押在大马士革 Al-Qassa 区政治治安部的总部, Tammam al-Amin 和 'Abd al-Naser Hassu 是两名学生,据报道,他们于1992年5月被 Amn al-Dawla 的成员逮捕。(1992年9月2日)

多哥

向政府转达的资料

435.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11月12日的信中通知政府他收到关于多哥武装部队秘书和前任情报处处长 Esso Charles Pello 上尉于1992年7月28日在洛美被捕的报告。据说他被带往多哥北部 Kara 的宪兵队营部。他在那里受到殴打，被施以电震，并不给他食物。由于受到这种待遇，他在昏迷状态中被送往医院。

突尼斯

向政府转达的资料和收到的有关答复

436.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8月21日的信件中向政府转达了他收到的有关该国酷刑做法以及若干个个别案件的资料。该政府于1992年11月19日对上述信件作出了答复。此外，特别报告员还就若干人员的情况发出了两份紧急呼吁，根据收到的资料上述这些人具有遭到酷刑的危险。政府对上述各不同日期发出的紧急呼吁也作出了答复。

(a) 向政府转达的有关一般酷刑的资料

437. 根据收到的资料，人们认为在伊斯兰 al-Nahda 运动中，对被监禁者施行酷刑和虐待是通常的做法，在突尼斯下述三个主要拘留营里这种做法似乎成了例行公事：Bouchoucha 警察所、驻扎在 al-Aouina 的国家卫队兵站和内务部的囚室。据报道，大部分酷刑发生在监护监禁期，监护监禁期往往被延长超过第87-70号法律允许的10天最长期限。据称，施行酷刑的办法包括对身体各个部位进行殴打，特别是抽打脚心；捆住腿或以诸如“烤鸡”式的环型捆绑形式悬吊（即将被害者的双手与双脚捆绑在一起，并且从手脚之间的前面穿过一条横杆）或者“飞机”式（将手和脚从后面反绑），一般还加以殴打、电击；并从直肠塞入瓶子和性猥亵。

438. 还有报告称，《刑事诉讼法》未能明确地阐明对酷刑的指控应当迅速采取的程序。调查法官只是有义务将指控转呈给检察官，然后对原先起诉的罪行进行

调查。即使调查法官下令进行医务检查，也并不一定或者一般不会立即进行检查。

439. 政府于1992年11月19日致特别报告员的信件中阐明，1992年8月21日转达的那些有关虐待的指控不是近期而是在1991年--1992年间发生的。这次只是重新复述了大赦国际以前呈送给联合国人权事务中心一份报告的部分内容，而且政府已经于1992年7月10日呈送的一份内容详尽的备忘录就此作出了答复。1990--1991年期间，极端分子引起了骚动，并企图通过有组织的暴力破坏国家的稳定。骚动的唆使者和参与者于1992年8月受到公开审讯。在有关虐待的指控提出之后，根据共和国总统的提议设立了由一些独立的人士和与保护人权事务有关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这个被称之为“Driss委员会”的委员会就有关虐待的指控展开了彻底的调查。它与当事人及其家庭进行了面谈、查访了拘押点、查阅了警方拘押人员的记录及其它有关文件并于1991年10月向总统提交了报告。这份已公布了其结论和建议的报告查明是有一些违犯政府政策和总统指示的滥用职权的行为，但均属个别人采取的单独行动所致。在报告公布之后，对一些执法官员提出了行政诉讼而且法院按照现行立法正在对他们进行审理。

440. 此外，还按照总统的指示向那些受害者及其家庭提供了基本上属社会和人道主义性质的援助。援助包括颁发补助金和一笔数额颇高的抚恤金，而且不会对法院可能下令支付的赔偿金进行扣减。继 Driss 委员会报告之后，还按总统的建议于1991年7月完成了关于上述报告中所载调查结果和建议的最新情况的第二分报告并公布于众。

转呈给政府的一些个别案件

441. Abdellatif Tlili 是于1990年11月21日在 Ariana 被捕的，并据报道被单独监禁在内政部达42天。他被捆绑成“烤鸡”式的形状，遭到严重的殴打。他还遭到性骚扰和假处决。

442. Salah Hedri 于1991年4月23日被捕。据报道，他被倒悬，并被抽打脚和膝盖。

443. Abdelkhaliq Alaoui 于1991年3月在 Ksour 被国家卫队逮捕，单独监禁了数日。然后，他被送往医院，前往医院看望他的一位朋友说，他发现 Alaoui 遍身都是青紫块。

444. Hamide den Lazhar al-Said 于1991年10月3日被捕。在关押期间，迫他坐在一个瓶子上，致使他的直肠需要缝26针。

445. Mansouri Toumi 于1991年10月3日被捕。据报道，他在 al-Aouina 遭到酷刑，他被捆着双手悬吊在一根铁棍上，离地2米。

446. Fatima Guitouni 于1991年5月被捕，被关押在 Nabeul 警察所。在关押期间，在她坐在地上双脚被悬绑在架在两张椅子之间的铁棍上的同时，对她进行殴打。

447. 政府说六名被列入名单的人士并不属于暴行和虐待的受害者。

448. 特别报告员接到报道，下列人士在被逮捕后因酷刑死亡：

(a) Rachid Chammakhi 是非法的 Hizb al-Nahda 伊斯兰运动的支持者。

他于1991年10月24日被逮捕并带往 Slimane 警察局，在那里他受到殴打。过了几天，他被送往医院，在医院中死亡。根据证人他身上有多处青肿和伤痕。政府说已指示 Grombalia 的检察长考虑重新对有关该人的死亡是直接或间接由虐待导致的指控进行司法调查。检察官审查了这些指控，但并未发现可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进行重新调查的根据。调查因而被搁置；

(b) Nouredine Masi，是 Hizb-al-Nahda 的成员，他于1992年1月24日被捕后带往 Nabeul 警察局并在那里受到“烤鸡”式的酷刑。政府说关于 Nouredine Msedi（在特别报告员的信中称 Masi）已死亡的指控不实。他还生存；

(c) Abdelwahed Abdelli 是高等师范学院的4年级学生，他于或约在1991年6月30日死于 Sousse。根据 Sousse 警察所与他一起关押的监禁者，他被子弹击中腿部，在被逮捕两天之后死亡。据报道，他得不到医疗照顾，并遭受酷刑。显然并未向其家人提供尸体解剖报告；

(d) tarek Azitouni 是突尼斯文学和科学院的一名大学生。据报道，在他的头部遭到警察的敲破之后，他于1991年2月9日死于 Mareth 城；

(e) Wardya 城的 Amer Degachi 是突尼斯大学的神学系学生，据称他于1991年6月被捕，并于1991年7月11日在内务部因酷刑死亡。政府说上述三人不属于暴行和虐待的受害者。

449. 特别报告员还就以下一些人的情况作出了紧急呼吁，恐怕他们遭到酷刑。在以下摘要的末尾括弧中注明了上述紧急呼吁的发送日期。

450. 据报道 Ezzeddine Hadj Belgacem 于1992年2月7日被捕后一直被 Gabes 的警察关押。他的家人未被允许探访他，只准他们将衣服留在警察局。据称，他曾在警察监视下回了办公室一次，与他以前工作过的一间外国公司的代表进行了生意

会谈。该代表说 Hady Belgacem 先生似乎受到肉体虐待，看来不修边幅和极之疲倦。(1992年3月17日)

451. 1992年9月29日，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Gabes 的警察是于1992年3月19日而不是2月7日对 Ezzeddine Hady Belgacem 就他被认为犯下的非法行为进行了审讯。在被允许的警察拘押期结束后，他被交给 Gabes 初级法庭的检察官。检察官控诉他协助和隐藏通缉犯并举行会议以期采取有害于国内安全的行为。Hady Belgacem在向预审法官认罪后，被法官下令拘留。在拘留期间，他没有受到虐待。他被Gabes初级法庭于1992年4月29日判处两年零九个月的徒刑。Gabes 上诉法庭于1992年8月31日将刑期减至21个月。

452. Noureddine Mabrouk 据报告于1992年2月3日在他教学的 Bizerta 中学被捕。他被带往 Bouchoucha 警察局。后来，有人在内政部看到他，带着手铐并有被虐待迹象。(1992年3月17日)

453. 1992年9月29日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Noureddine Mabrouk是于1992年3月17日而不是2月3日被警察逮捕，他被怀疑严重违法。他很快地就被带到突尼斯初级法庭的预审法官前。他被指控是一个主张并行使暴力的协会的成员，法官下令拘留他，以待审讯。在拘留期间，他没有受到虐待。1992年4月16日突尼斯初级法庭判处他一年零16天监禁，并对他进行行政监督两年。突尼斯上诉法庭于1992年8月24日证实了这个判决。

454. Zouhair Mhiri 是 Ain-al-Idrahim 的欧洲文学教授，也是Khaled Mhiri的兄弟。他被怀疑是一个非法的伊斯兰组织 al-Nahda 的成员，于1992年4月15日被警察逮捕，带往内政部并受到单独禁闭。两日后，他的家受到搜查，他父亲被带到警察局审讯。(1992年5月7日)

455. 1992年9月21日，政府说 Zouhair Mhiri 于1992年5月16日被 Sousse 警察逮捕。他不是于4月15日被捕，也没有被带往突尼斯的内政部受到单独禁闭。他在Sousse被逮捕后，他的案件被Sousse的检察官接管，并被预审法官控告参与一个主张和行使暴力的非法协会。他于5月21日受到预审法官的审讯，当时他的律师在场。法官在同日下了拘押令。诉讼正按正常程序进行。Mhiri 先生在拘留期间没有受到虐待；他现在是在司法机关管制下。

456. Jamal Rizki 被怀疑为al-Nakda的成员。他和Habib Khmila 和10名其他突尼斯人在黎波里被捕并于1992年2月被驱逐到突尼斯。据说他们被带往突尼斯的内政部并被单独禁闭。(1992年5月7日)

457. 1992年9月21日政府说Jamal Rizki 于1992年4月25日被警察逮捕并于4

月28日被突尼斯初级法庭的预审法官提审。他于5月16日被初级法庭判处八个月的徒刑并受行政监督一年。Rizki先生已向突尼斯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正按正常程序进行。Rizki先生在拘留期间没有受到虐待。

458. 关于Habib Khmila, 政府说他被怀疑为一个阴谋破坏国家安全的集团的成员。他于1992年4月21日被警察逮捕。Ben Arous的预审法官根据刑法典第131、132和133条控告他参与一个非法组织。1992年4月25日对他下了拘押令, 该案件正在审讯过程中。在拘留期间他没有受到任何虐待。

459. 被利比亚驱逐到突尼斯的突尼斯国民是由于非法居留被利比亚当局逮捕。其中三名已被释放。另外11名由于犯案被当局通缉, 将受到审判。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以往报告中提到的案件的资料

460. 1991年5月30日政府就在1987--1990年期间报道的若干酷刑案件作了评论。特别报告员在1991年2月14日提出了有关这些案件的资料(E/CN.4/1992/17, 第233和234段)。由于一项错误, 去年的报告中没有提到政府的答复, 因此将其载在下面。同时政府指出保护个人免受任何肉体上的伤害是维护他的尊严和安全的一项基本条件。以酷刑和虐待来逼取招供或任何供词是为文明社会所不齿的。此外, 这样取得的招供或供词没有司法价值, 也不能作为任何决定或判决的基础。由于违反了文明关系的原则, 酷刑和虐待是受到突尼斯法律禁止的, 犯有这些罪的人会受到惩罚, 惩罚的轻重将与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和立法者对这些罪行的厌恶程度相称。因此突尼斯的立法当局在刑法典里对维护人身尊严和禁止任何危害这种尊严的事物予以特别重视。政府也指出在小学和中学的课程中以及私立和公立的各级教学中都包括了有关人权的题目。突尼斯与联合国各个有关人权的委员会合作, 向它们提供关于各项有关国际文书的执行情况报告。突尼斯已就《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执行情况提出一份初步报告, 并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执行情况提出第三份报告。突尼斯愿抱着负责和开放的态度与所有负责人权问题的国际和区域机构合作。关于特别报告员交来的资料, 政府转达了下面的答复:

461. Sayyed Ben Burawi Ferjani 在被讯问时, 没有宣称他受到警察的暴力。他说他脊骨痛, 因此在不同的场合, 受到不同的医生的检查。对他的诊断是他由于被逮捕而产生心理上的问题, 而并没有神经系统的病痛。

462. Lutfi Zaitoun 在被讯问时也没有提到遭受暴力。在他被逮捕不久

后，他的家人说他害头痛，监狱医生被要求对他进行检查和治疗。1988年7月11日，医生说他和一名神经病学专家检查了Zaitoun 先生。他的病理学情况正常，并无危险。医生给了他必要的药品。

463. Mohsin Habouria 在被讯问时并没有提到受到警察的暴力。他也没有受到暴力的迹象。

464. Taufik Mejri 的档案中也没有提到他遭受暴力，在讯问时，他也没有说受到暴力。

465. Salih Ben Abderrahmane El-Abidi 是一名退伍下士，他于1988年6月18日被捕，因为他违犯了军队条例。他的案件在1988年3月14日受到审理，并在1989年5月4日由于总统大赦而被释放。1990年2月14日，由于他拒绝将他的卡车开离一个非停车区而被带往El-Okba 警察局。他没有被逮捕，也没有遭受暴力。

466. Jamal El-Sayari 和Abdelkader Ben Omar Bonazizi 由于被怀疑为一个不被承认的组织的成员并带有颠覆性传单而被Siliana警察于1988年10月14日逮捕。他们受到Kef警察的讯问，和突尼斯有关当局的讯问。讯问按正常程序进行，并无施加压力。嫌疑犯身上的被禁文件已足以证明他们的成员身份以及非法行动。他们在受到不要再从事颠覆活动的警告后就被释放。

467. Moncef Matalla, Moulidi Abassi, Mohammed Taher Hamouda, Mabrouk Abdeljaouad 和 Nouredine Ibrahim 由于以行割礼的名义举行了一个未经批准的会议而于1989年6月15日被Ariana 国民警卫队逮捕。他们于6月22日被释放，并未受到虐待和酷刑。

468. Imed Ben Ahmed Amdouni 于1989年7月19日在Beja被逮捕，同日由于身体不适被转往区医院。他一直在警察监督下直到8月1日，那一天他被带到Beja 初级法庭并被控散布有毒思想、破坏和平、煽动和严重殴打官员等罪行。

469. Ibrahim Rejichi 于1989年8月31日被Monastir警察逮捕，后来被控对国家元首不尊敬、猥亵、殴打官员、毁坏财产、严重殴打和在公路上醉酒等罪名。他被裁定无罪。

470. Fathi Ben Ali Amor Hached 是邮差，他由于拥有颠覆性传单而于1989年9月6日被捕，又于同日被释放。

471. Murtadha Labidi 被 Gafsa 初级法庭控告参与非法协会、拥有和散发违反政府政策的被禁传单、诽谤国家元首和未经授权募捐等罪名。在诉讼过程中，被告的权利没有受到限制。上诉法庭裁定被告无罪。这就证明了诉讼是完全符合法律程序的。

472. Mohammed Mezzi 于1989年12月26日由于在他学校里进行颠覆活动、扰乱教学和散发传单被 Ariana 警察逮捕并带往法庭。他没有遭受到暴力或酷刑。

473. Raouf Critli 、Tarek Sallami 和Nizar Ouni 于1990年3月17日在 Mannouba 的 Saniat Ben Abdallah 区发生的示威和严重混乱后被逮捕。他们受到讯问并带往突尼斯区刑事调查部。他们于同日被释放。

474. Hedi Ben Allala Bejanri 由于在Sidi 区散发传单受到 Ariana 警察的讯问。他没有被逮捕。关于他受到酷刑的指控不实。他受到一个公共卫生局的医生的检查，医生签发了一张他健康良好的证明书。他提出了三份诊断书并提出控诉，但他的指控在他受到一名公共卫生局医生的体格检查后被驳回。

475. 司法当局没有关于一名叫做 Raouf Mthlouti 的人被刑事调查部逮捕的任何资料。

476. Monia Jouini 于1990年6月6日被 Sedjoumi 警察逮捕，她当时正在 Mellasine 区的墙上书写颠覆性的口号并散发工人共产党传单。她被带到法庭；在她的律师要求下，公共卫生局的一名医生对她进行了体格检查。医生出具了一张证明书驳斥了她受到酷刑的指称。

土 耳 其

转交政府的资料和所收到的答复

477. 1992年9月16日，特别报告员向土耳其政府转交了一份有关这个国实行酷刑作法和一些个别案例的主要指称的摘要。此外，特别报告员还代表一些人发出了12份紧急呼吁书，根据收到的资料，这些人面临遭受酷刑的危险。政府分别对其某几份呼吁书做出了答复。

(a) 转交给政府的有关一般酷刑行为的资料

478. 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酷刑通常是在警察局的特别部门，即现在所称的“反恐怖处”初审嫌疑犯时实施的。据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政治嫌疑犯和比例很高的普通罪行嫌疑犯在被拘留期间遭受酷刑。还经常收到一些专门涉及东南各省案件中酷刑和虐待的指称。

479. 酷刑包括：用警棍拷打、扒光衣服后捆住手臂和手腕、吊起、电击身体

敏感部位、把被拘留者置于几个叠起的轮胎中使之动弹不得，然后往其身上浇热水和凉水、向受害者喷高压水和使用 *falaga*（击打脚底板）。据报道，几乎每个遭受酷刑的妇女都受到性骚扰、有的甚至被强奸。受酷刑时，受害人通常是被蒙上双眼。

480. 另据报告，在送交法官之前，一个被指控犯有普通或“个别”罪行者一般可以被拘留24个小时；而被指控违犯1991年4月12日《反恐怖法》者则可拘留48小时。另外，在实行紧急法的10个省份，警察可以拘留被控犯有“集体和阴谋罪”的人最多30天，在该国其他地区为15天。根据报告，这种长时间的拘禁是造成不断使用酷刑的一个主要因素。同时也有报告说，土耳其法律不保证被拘留者在接受审讯时有律师在场的权利，但保证得到律师的一般权利。然而据报告，警察或安全部队经常拒绝让律师会同他们的委托人见面。根据法律，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拘留的情况通知被拘留者的家属；然而，实际上，亲属要花几天时间打听被拘留者的下落。没有人会告诉他们家人被关的地点。他们在查询这类消息时，也得不到当局的帮助。

481. 据报，医疗检查常常是在酷刑实际发生很长时间后才进行。有些检查不过是走走过场，有的则是在警察虎视眈眈的情况下进行的。也有报告说，国家医生有些时候屈于压力而开假证明。而只有国家医生的证明才能作为法庭上的证据，而其他独立的医疗检查机关的证明则不行。

482. 也有报告称，许多遭受酷刑的人因为惧怕受到进一步的报复而不敢对有关的官员提出指控。另一方面，对据称使用了酷刑的案例的调查是由当地警察进行的，这就意味着由受到指控的本人或与受指控的官员有密切关系的人进行。结果是，几乎没有任何涉嫌使用酷刑的案件得到认真调查。除此之外，《反恐怖法》第15条适用于实施紧急法的省份。这就意味着，如果提出如下申诉，即指称有官员对一个根据《反恐怖法》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而涉嫌犯有恐怖罪的人使用酷刑和进行虐待，那么这一申诉应交地方行政委员会进行调查，并由该委员会决定是否对本案提起诉讼。据报，行政委员会由地方政府官员组成。他们没有法律背景，并可能会受当地安全部队指挥官的影响。同时，这类听证会都是秘密进行，原告及其律师无法密切跟踪案件的进程。

483. 据报，1992年5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向总统提交了拘留程序的改革草案，由他最后签名批准。据称，这一草案规定在10个实行紧急法的省份中警察拘留有集体犯罪行为人的时间从30天减为15天，国内其他地区的这种拘留从15天减为8天。草案同时强调被拘留人员有权得到律师。根据收到的报告，这一修正草案被总

统否决，不得不由大国民议会再次进行辩论。

484. 也收到了有关位于安卡拉150公里处的埃斯基谢希尔高级安全监狱的报道。据说这座监狱的修建方式是将犯人置于完全隔离状态中；根据《反恐怖法》第16条，任何根据该法受审或定罪的犯人均应在极端条件下单独监禁。据报，1991年11月，大批的政治犯从全国各地移至此监狱。他们刚一到达，就被毒打一顿，致使许多人骨折、不能行走。

(b) 转交政府的个别案件

485. 1991年1月，Hüseyin Aten 和 Salih Yilmaz 据称在 Bilican 村 (Kavsakli) 被军官逮捕。他们整整九天没吃没喝，并遭毒打和电击。

486. 1991年5月6日，Ibrahim Türk 被捕并被警察押送到迪亚巴克尔。他在那里遭受拷打，电击高压冷水喷射，并被反绑，捆住手脚吊起。

487. 1991年8月14日，Erdogan Kizilkaya 在土耳其中部的开塞利被逮捕。在警察总部，警察让他扒在地板上，然后踩他；电击他的生殖器、手和脚，并用警棍打他。

488. 1991年9月，Semsettin Kocak 在凡城被捕并被带到凡城警察总部的政治处。据报，他在被拘留期间遭受拷打，高压冷水喷射、电击和沙袋击打。

489. 1991年9月底，Yusufhan Zorba (土耳其人权协会(IHD)的凡城分部委员会成员)； Mehmet Sirin Zorba； Senar Turgut (电影制片商)； Muhittin Aksin； Sakir Kanat (土耳其人权协会凡城分部的成员)； Cemal Kocat (土耳其人权协会凡城分部的成员)； Hüseyin Karakoyun； Sehmuz Karakoyun； Hayretlin Yacan 和 Salih Bagi 等人于警察在凡城的一次行动中被捕。他们的家被抄；据报，在前往接受审讯的路上，他们被殴打。他们被带到凡城警察总部的政治处后，据报又遭拷打。他们也被捆住手腕吊起。

490. 据报，1991年11月3日，Rauf Yildiz， Murat Günes， Ibrahim Burakmak 和 Hanifi Eser 在迪亚巴克尔被捕并被带往警察总部。据报，他们在那里受到拷打。方法包括：捆住手腕吊起，高压冷水喷射和用警棍殴打。

491. 1992年1月29日，Refik Akin 被安全部队在土耳其东南部穆什的Korkut 区， Sazlibasi 村逮捕。据称，他被迫赤身裸体地躺在雪地并遭受拷打。他因此于2月1日死于Elazig 国家医院。

492. 1992年1月10日，Fahri Tirpan， Haydar Emrah， Coskun Kilickaya，

Bektas Ozkan, Ali Ozkan, Gazi Köksal, Ali Haydar Emre 和 Ercan Karatas 于警察在安卡拉的一次行动中被捕, 后被送往安卡拉警察总部第一处(政治警察)。据报道, 他们在那里遭拷打、高压冷水喷射和长时间罚站。

493. 1992年1月9日, 锡尔万附近 Basbug 村的 Mehmet Celik 被捕, 后被带往勤务宪兵团总部。整整7天他被关押在一间极小的单人牢房里, 他只能站在里面。他也被剥光衣服、捆住手臂吊起、并遭受电击和高压冷水喷射。

494. 1992年3月24日, 出租车司机和 Yeni Ulke 报的记者 Celil Beyazgul 被捕并带往乌尔法的安全部门大楼。据报道, 他在那里遭受了三天酷刑。

495. 1992年3月4日, Sükrü Yilmaz 于土耳其东南部贝西里的 Sagosele 区被捕并带往勤务宪兵总部。据报, 他在那里遭受酷刑。他获释后, 独立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 他的生殖器部位受伤, 两臂大面积的伤痕与钝器造成的外伤; 左手和左臂严重肿胀, 脚心肿胀。

496. 1992年5月14日, 人权协会舍尔纳克分部的主席 Sekvan Aytug 在 Sirnak 被拘留并遭受酷刑。探访他的同事报告说, 他的左眉, 腿和膝上有伤痕累累。

497. 1992年5月23日, Huseyin Gocer and Hasan Guldal 在土耳其东北阿尔特温的 Savsat 区被捕。据报道, 他在受审期间遭受酷刑。Hasan Guldal 因此于6月死于阿尔特温的省宪兵指挥部。

498. 1992年4月27日, Agit Salman, 一位出租车司机, 在阿达纳被政治警察逮捕。他两天后死亡, 据称是因为在阿达纳的安全总部受到了毒打。

499. 1992年4月19日, Kadir Kurt 在土耳其东南迪亚巴克尔的 Bismil 区被捕。他当夜死于宪兵营指挥部。据说他被拷问时, 他哥哥就在现场。他是由于一根断裂的胸骨压迫肺部造成内出血致死。

500. 1992年4月18日, Mithat Kutlu, 一位银行官员, 在迪亚巴克尔的 Bismil 区被捕。被关押六小时后, 由于头部遭棍棒击打致死。据称, 解剖报告表明, 他的死因是脑出血和内出血。

501. 1992年4月11日, Tahir Seyham, 马尔丁省达尔盖奇特的一位人民劳动党官员, 在被警察拘留四天后, 据报, 由于遭受酷刑而死亡。解剖报告表明, 他是脑外伤致死。

502. 1992年4月, Nazli Top, 一位怀孕两个月的护士被伊斯坦布尔警察逮捕。在被 Bahcelievler 警察局和 Bayramtepe 警察总部拘留的十天中, 她遭受了

诸如拷打，电击和性侮辱等严重酷刑。

503. 1992年5月1日，Omer Ozaslan 被捕并据报道，他在宗古尔达克的警察总部拘留期间遭受了酷刑。他父亲探视后说，他的脸部和双眼肿胀，嘴、鼻受伤，前额上有一个伤疤。

504. 1992年5月18日，Atilla Kavak, Gulay Sartli, Zeynep Ozgül, Hatice Duman 和 Ayla Pekoz 被逮捕，并送往加济安泰普的政治警察中心。据报道，他们在那里曾受电击和拷打。

505. 1992年6月19日，Menice Kirtay，一位库尔德人，在迪亚尔巴克尔省锡尔万的 Mescit 区被警察逮捕。警察用警棍和枪筒插进她的阴道和肛门，大肆折磨致使她流产。

506. 1992年6月27日，Ismail Yilmaz 被捕，并被带往伊斯坦布尔的警察局接受酷刑。据报道，他被毒打、遭受电击和性骚扰。他同一只经过训练的警犬关在同一间屋子，结果他的双腿和手臂被咬伤。

507. 1992年6月30日，据报 Abdullah Arisoy 和 Sait Arisoy (吉兹雷的 Ozgür Gündem 报的记者)和Halil Arisoy 于其在舍尔纳克省吉兹雷的家中被捕，并在舍尔纳克警察总部受到酷刑。其中包括：电击、反绑手腕吊起。

508. 1992年6月底和7月初，Ali Komak (吉兹雷的Ozgur Gundem 报记者)；Erdal Gecit (律师)；Ahmed Dagli (气象学家)；Abdulkadir Bingol；Abdurrahman Aksoy；Melle Abdulhamit Tanriverdi；Emin Sores；Mahmut Kirmizigul；Faruk Sakik (穆什的 Ozgur Gundem 的记者)；Abdullah Yasin (小学校长)；Salih Baykara；Yusuf Sen；Aziz Sen；Nimet Elki 和 Ihsan Ogan 等人在吉兹雷被逮捕并送往警察局严刑拷打。几天后，他们又被带往舍尔纳克，关押在舍尔纳克警察局总部。据称，他们刚一到达该地就遭到拳打。

509.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载有指称存在对少年儿童实施酷刑现象的报告。这些儿童因普通罪行或政治罪行被逮捕并于警察局在没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受到审讯。报告特别提到了下面几个案件：

- (a) 1990年10月4日，16岁的 Nermir Alkan 在伊斯坦布尔被警察逮捕并送往彭迪克警察总部。据称她多次被踢打，头和背遭棍击。
- (b) 1991年9月1日，17岁的 Sevinc Ekinci 在伊斯坦布尔被捕并被带往当地的警察总部和 Gayrettepe 警察局。警察打她耳光，将她的头撞墙，撕扯她的头发，并用拳头击打她的背部和胸部。
- (c) 1990年3月18日，16岁的 Orhan Oztrk 和12岁的 Fatma Ozturk 于一

次示威中在伊斯坦布尔被捕，先被送往产 Gayrettepe 警察局，后送往地方警察局。两人均被扇耳光、脚踢和棍打。警察还故意踢Orhan腿上一处未愈合的伤口。

- (d) 1990年10月8日，14岁的 Osman Erdogan 被警察逮捕。他在地方警察局住了两夜，后又在 Gayrettepe 住了一夜。此间，他遭到殴打、辱骂、脚踢。警察还扇他的耳光。
- (e) 1991年8月，15岁的 Ali Akdag 被警察逮捕并在被拘留四天。此间，他的脚底、手掌和指尖被打；警察还剥光他的衣服，把他倒吊起来，并用粗木棍击打他的头部、脚腕、膝盖和肘部。他还被捆住双手、全身一丝不挂的吊起来、他的生殖器也屡遭电击。
- (f) 1992年3月，16岁的 kesan Ali 被警察官逮捕，后在迪亚巴克尔警察拘留期间死亡。官员报告说他是自杀；然而，他的家人报告说，他的头部缺少一部分，身体其他部位也都有受酷刑的迹象。
- (g) 1992年3月25日，16岁的女高中生 Biseng Anik 在土耳其东南的西尔纳克被警察逮捕拘留，三天后死亡。她的家人得到尸体时，她颅骨已被近距离开枪的子弹炸掉一半。拷打给她手和臂上留下了很深的伤口。腿的颜色发紫并且肿胀。

510. 除上述案件外，特别报告员代表下列人员发出紧急呼吁书。人们担心这些人在拘留期间可能遭受酷刑。呼吁书的发出的时间在其对应的摘要后的小括号内标出。

511. 1992年2月20日下午9时，警察一次行动中把 Hasan Durna 从其母位于布尔扎的家中抓去。这次行动是继造成检查官重伤，他的司机和警卫被杀的一次武装袭击后由警察采取的。Hasan Durna 的三个异父兄弟也因涉嫌参与此次事件被逮捕。根据收到的材料，Hasan Durna 先被关押在布尔扎警察局总部，后又转到伊斯坦布尔警察总部的反恐怖处。据报，他在那里是被单独监禁(1992年3月5日)。

512. 在1992年3月21日于凡城发生的军队和当地居民间的事件中，Yavuz Binbay，土耳其人权协会凡城分会的主席，被打成重伤。据报，3月30日，他在州立医院住院时被捕并被带往当地的军队医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担心 Binbay 先生可能会遭虐待并得到必要的医疗。

513. 1992年5月4日和6月4日，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称 Yavuz Binbay 于3月21日发生在凡城的事件中受伤，后被保安部队送到州立医院，他在医院一直住到1992年3月31日。Binbay 出院的当天，普遍警察便因其违反集会示威法和企图集体

骚乱和谋杀罪将其逮捕，并送交法庭。此人已于1992年4月3日被转到 Diyarbakir 监狱。

514. 在一次造成司机身亡和一名阿达纳警察总部工作人员重伤的武装袭击警车事件后，Sevgi Saymaz 于1992年3月25日在阿达纳的街道上被拘捕。据报纸报道，Sevgi Saymaz 被怀疑参与了这次袭击。在被拘留两个半小时后，Sevgi Saymaz 被拉去见电视和新闻摄影记者。1992年3月26日各报刊登的照片中，她双眼被蒙，蒙眼布上带有血迹，她的脸部浮肿并有擦伤。据报道，她在电视上出现时几乎不能站立。报纸报道说她在昏迷状态中被送往医院。根据3月28日的报道，她父母去了法医研究所。那里的一位医生告诉他们他知道这个案子，但 Sevgi Saymaz 不在该研究所。他们又去询问国家医院，那里的人说没有叫这个名字的病人。他们随后向阿达纳国家检查官发出呼吁，要求允许会见他们的女儿。据称，检查官同意做出安排。然而，当他们去阿达纳警察总部见女儿时却遭到了拒绝。据说 Sevgi Saymaz在被拘留前身体状况良好。另据报道，她被捕时未作出任何反抗或采用暴力。根据消息来源，报道所称的她的身体状况恶化是酷刑所致。人们担心她可能会在单独监禁受审期间受到进一步的酷刑。(1992年4月7日)

515. (法语)1992年6月4日，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3月25日 THKP/C Devrimci-Sol 恐怖主义组织革命部成员谋杀了阿达纳警察局维护和补救处处长及其司机后，Sevgi Saymaz 手持凶器被当场抓获。1992年4月9日，她在经审问后被提交司法当局并被拘留。

516. 1992年5月14日，人权协会 Sirnak 分部的主席 Sekvan Aytu，从安卡拉回来途中在西尔纳克被拘留，单独关押在西尔纳克警察总部。他被拘留可能与其向人权代表团和报界提供了这一地区库尔德新年前后出现的侵犯人权的情况有关。另一方面，他名字已出现在列有受到死亡威胁人员姓名的传单上。(1992年6月1日)

517. (法文)1992年6月18日，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 Sekvan Aytu 于1992年5月14日被舍尔纳克警察逮捕。逮捕是根据已于先前被捕和被指控的库尔德工人党 (PKK) 武装派 ERNK 成员的作证和其他证据作出的。根据作证书，Sevkan 在 ERNK 的通过合法组织支持非法行动委员会中一直很活跃。在州检察院批准后，他被警察拘留了15天。此间狱外无人试图与他进行接触。他未受虐待。5月29日，他被提交给检察官接受指控。他现被关押在舍尔纳克监狱。他从未报怨自己受到过死亡威胁。他也未要求采取保证他安全的措施。

518. 据报道, Nihal Aslanturk, 特拉布宗的政治杂志 Mucadele 的记者和另外两人在办公室被捕并被送往特拉布宗警察局。据报, 她过去多次被捕和遭受酷刑。

519. (法文)1992年8月10日, 政府指出 Nihal Aslantürk 已于1992年5月25日在特拉布宗被逮捕和拘留, 因为有证据表明他卷入了 THKP/C Devrimci-Sol 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1992年5月27日经审问后, 她被提交给主管法院并关进监狱等候审判。1992年5月27日的医疗报告证明她在被警察拘留期间未受虐待。

520. 1992年6月28日, Adem Kepeneklioglu 在伊斯坦布尔被捕并被送往伊斯坦布尔警察总部反恐怖处。根据收到的材料, 伊斯坦布尔国家安全法院的检察官授权从7月1日起将他拘留15天。也有报道说, 此人曾于1986年被判终身监禁, 但1988年从克尔塞希尔政治犯监狱越狱逃跑。他曾于1980年, 1982年和1985年被捕, 并遭受严重酷刑。可能由于曾被捆住手腕悬吊, 他不能正常地使用手和手臂。(1992年7月6日)

521. (法语)1992年7月30日政府指出, Adem Kepeneklioglu 在服无期徒刑时从克尔塞希尔监狱越狱; 1992年6月29日, 在针对恐怖主义组织革命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一次行动中, 他和三个伙伴在伊斯坦布尔被捕。目击者证明他参加了各种犯罪活动。主管法院已于1992年7月13日下令将其拘留。他在法庭上和检察官面前未指称自己在被拘留时受虐待或酷刑, 因此未下令进行调查。

522. Ali Sigirtmac, Efendi Oner, Ibrahim Coskun (Cizilciksuyu 村人), Murtaza Gök, Ali Seyidi Gök, Haydar Cüce, Mustafa Cuce, Cevet Demir, Abidin Tasci (Domuzdere 村人。)1992年6月20日, 大约有15名 Domuzdere 和这一地区其他村庄的村民(包括前面提到的人)被捕。据报告, 在这次行动中, Domuzdere 村年老的村长被宪兵殴打和游街。据报, 被逮捕者被带往 Avsin 宪兵站进行审讯。后来, 其中两人被放, 但明显在被关押期间遭受酷刑。根据报告, Ali Sigirtmac 被释放时已不醒人事, 而且全身到处都是伤痕。他被送到开塞利大学医学院, 现由他同时获释的哥哥照料。据说, 另一被释放的拘留者 Efendi Oner 因受酷刑身体状况极差。

523. (法语)1992年7月30日政府指出, 关于 Ali Sigirtmac 和其他提到的村民受虐待的指称已得到司法部的调查。调查证明所提到的人未被宪兵队拘留; 也证明在提到的时期内, Ali Sigirtmac 未在开塞利医学院接受医院治疗。

524. 1992年8月15日, 人民劳动党执委会成员 Diyadin koç 被捕, 现在迪亚巴克尔单独拘禁。

525. (法文)政府在1992年11月3日指出, Diyadin koc 因涉嫌是 PKK 成员而于1992年8月16日被拘留。1992年8月26日, 根据迪亚巴克尔国家安全法院的决定, 他已获释。根据迪亚巴克尔法医研究所的报告, 他在被拘留期间未受虐待。

526. Ferudun, Felemez Baskaya, Sakir Alay, Kemal Okutan Marun, Cakmak, Güren Ozatay, Cabbar Gezici, Sabahattin Ozaslaner, Hamit Geylani, Cemal Saruhan 和 Gunes Unsal。据报, 在安卡拉国家安全法院检查办公室对1992年9月19日人民劳动党 (HEP) 大会的进行调查中, 人民劳动党的上述成员于1992年9月底被捕。他们被带往安卡拉警察总部接受审讯。(1992年10月5日)

527. Ahmet (学生); Zeki Gürbüz (学生); Mustafa Peköz (学生); Ufuk Tan (学生); Hasan Polat (学生); Celal Meral (住 Camlica 区); Yildiz Meral (女, Celal 的妻子, 住 Camlica 区); Ziya Ulusoy (住 Camlica 区); Duriye Sezgin (女, 住 Camlica 区); Mehmet Ustundag (住 Camlica 区); Meryem Temur (女, 住 Camlica 区); Ali Bolat (住 Bahcelieuler 区); Hüseyin Kiliç (住 Bahcelieuler 区); Tülay Mercan (女, 住 Bahcelieuler 区); Gülay Mercan (女, Tülay 的妹妹, 住 Bahcelieuler 区); Iman Hüseyin Demir (住 Bahcelieuler 区); Ibrahim Timur Isik; Naci Uzun (Emegin Bayragi (劳动旗帜) 的记者) 和 Hulya Uzun (女, Naci Uzun 之妻)。11月4日至6日, 警察在伊斯坦布尔进行的一次行动中, 拘捕26人(包括上述人员)。据报, 他们当中无一人被作为拘留者在伊斯坦布尔国家安全法院登记入册。拘留程序规定必须登记。然而, 在未登记情况下被警察拘留几天后, 他们中有23人于11月8日得到登记, 警察获准拘留他们15天。他们被单独拘禁在伊斯坦布尔警察总部反恐怖处。但 Celal Meral, Ziya Ulusoy 和 Mehmet Ustundag 尚未得到登记。(1992年11月19日)

528. Sukru Yilmaz, Habip Yilmaz, Irfan Solak, Salih Solak, Bahri Gitmez, Serhat Baytar, Sirin Dogan, Resul Balta, Ebubekir Gunes, Nuri Adlik, Tahsin Adlik 和 Hacı Adlik。根据报告, 自1992年10月16日起, 他们先后被拘留, 现关押在勤务警察总部。亲属和律师都不许接触他们。据报, 检察官未表示他们将被关押多久。(1992年11月25日)

529. Mehmet Ozkan 和他的儿子 Lokman (15岁); Hali Ozkan 和他的两个儿子 Abdullah 及 Cengiz (17岁); Omer Ozkan 和他的儿子 Mahmut (14岁); Rusen Ozkan (14岁); Nezan Ozkan (15岁); Cuco Ozkan (14岁)。据报, 1992年11月21日, 安全部队在 Sanlturfa 省的维兰谢希尔拘留了大约50人, 其中包括上述这

些 Ozkan 家族的成员。当日上午10点, 6名警官搜查了Omer Ozkan 的住房。警察在搜查中查获了一名他们通缉的人。警察随后也搜查了Omer Ozkan 兄弟 Mahmut 和 Halil 的家并拘留了他们和当时在场的家族其他成员(名字如上所列)。据说, 警察自此每天都对这几家进行搜查。被拘者被带往 Sanlturfa, 据报, 他们被单独拘禁在 Sanlturfa 警察总部反恐怖处。

从政府收到的有关前几份报告中所载案件的答复

530. 1992年3月31日政府指出, Sait Seyit Ahmad (E/CN.4/1992/17, 第253段)因涉嫌建立一个犯罪组织而于1991年3月14日被安卡拉警察监视并于同日拘留。安卡拉国家安全法院宣判他无罪, 并于1991年5月14日将其释放。医疗报告证明他在被拘留期间未遭酷刑或虐待。

531. 1991年12月16日和20日政府指出, Huseyin Toraman 一案(E/CN.4/1992/17, 第243(n)段)正在由主管当局进行调查; 此人据说自1991年10月27日起一直杳无踪影。据司法部和内务部的主管部门说, Toraman 先生未被当局监视或拘留。因 Toraman 先生的父亲提出了申诉, Fatih (伊斯坦布尔)的检察官进行了调查。当局认为他的失踪可能是由非法派别间的冲突造成的。

532. 1992年1月8日政府指出, Sayan Yalçın, sedat Erozsoy, Mehmet Gücel, Ayse Sultan Yazici 和 Muhittin Civelek (E/CN.4/1992/17, 第250(b)段)因帮助和窝藏 THKP/C Devrimci-Sol 的成员并组织这一恐怖组织成员越狱而于1991年1月5日被捕。1991年11月18日, 他们被伊斯坦布尔国家安全法院关入监狱。内务部已证实他们在被拘留期间未遭酷刑或虐待。

533. 1992年1月8日政府指出, Cengiz Gejili (E/CN.4/1992/17, 第250(d)段)从未被加济安泰普警察拘留, 警察局无他的记录。

政府提交的有关委员会第1992/42号决议的资料

534. 政府在1992年11月3日的信中转交了一份清单, 列举了库尔德工人党(PKK)从1991年8月29日至1992年10月2日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据报, 自1984年以来, PKK 已杀害了1,000多名平民并造成许多其他人严重受伤。

乌干达

转交政府的资料

535.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11月12日的信中通知政府, 他已收到有关北方全国抵抗军队(NRA)关押的犯人, 以及在坎帕拉地区军营中的犯人受酷刑和虐待的资料。

536. 据报, 1991年3月底, 被关押在古卢农业部一座院子里的无适当证件的人、全国抵抗军队的逃兵及反叛嫌疑受到士兵夹道枪托击打。

537. 1991年4月16日至18日, 古卢区布科罗乡和帕伊乔乡附近村庄的一些人在被带到位于布科罗小学的全民抵抗军队的营地后遭到拷打。据称士兵在这里挖了一个约两米深的坑, 上面覆盖有裹着一层土的圆木。犯人就被推入坑中, 然后在圆木上面放火。据报, 大火产生的浓烟使一些人窒息而死, 其中有: Onyama的Rodento Okema, Labongoguru的Opwonya p' Opige, Obyela的Ojabo和Olano的Ogok p' Larii。据报, 另一名叫Justin Okumu的人也被推入坑中, 但由于他声称其父在Onyama家中藏有一只枪, 而幸免于酷刑。后他被带到父亲的家, 结果没有搜查出什么枪支。据称他和父亲Raymondo Okwera最后被活活打死。在布科罗事件中, 4月17日, 年老的Juliana Ayako和其女儿Margaret Abwoyo及Erumalina Amono据称被士兵强奸。

538. 也有报告说, 1991年6月下旬, 乌干达东部布基英德乡Bunabulayi村的10名村民被错抓并被误控参与袭击军队巡逻队。他们被关在鲁邦基军营达两周。其间, 他们每天都要挨三十棍。从军营放出后, 他们交由姆巴莱的警察拘留。他们臀部布满了深深的伤口。由于他们被关在军营时未得到任何医治、伤口严重感染。

539.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有关军营和士兵在坎帕拉其他关押犯人的地方施行酷刑的资料。据这一资料, 犯人在单独监禁期间, 每次接受关于政治和刑事罪行的审讯时都遭受酷刑。特别报告了下面几个案件:

- (a) 武装抢劫案嫌疑犯于Haji Abdu Mbogo于1990年6月在Lubiri军营中遭受名为“平衡”的酷刑, 即将受害者的手脚捆在一起, 然后将其吊在墙上或铁窗栏杆上拷打。
- (b) 1990年9月22日, Mande Ntananga被全国抵抗军队的士兵逮捕, 在卢比里军营中遭受严重酷刑。据报, 医疗检查显示损伤系拷打和电击所致。这些酷刑使其大脑受伤。调查之后, 据称一些士兵被捕, 但不知是否采取了已采取措施将他们依法惩办。

联合王国

转交政府的资料

540.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11月12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 他已收到有关指控皇家北爱尔兰警察(RUC)成员在审讯中心, 特别是在卡斯尔雷(贝尔法斯特)使用酷刑的资料。这些指控包括: 扇打头部, 拳击头部和身体、撕扯头发、长时间罚站及压迫肩膀和颈部。也有报告说, 根据紧急状态法, 在提起诉讼和交法院审理之前, 被拘留者的羁押期不超过七天; 在北爱尔兰, 警察审讯期间不允许律师在场。据说这些规定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种有利于实施虐待的气氛。下述个别案件已通知该国政府:

- (a) 1991年7月21日, 马丁·斯威尼被捕后被带往卡斯尔雷的警察审讯中心。据称, 他受到辱骂, 警察扇他耳光, 抓住他的头往墙上撞和并往他的耳朵里唾痰。另据指称, 一名警探猛击他的腹部, 不停地用手指戳他的肋骨; 这名警探还打他的后脑和脸强迫他将头夹在两脚间;
- (b) 1991年7月24日, 罗斯·安·马圭尔被捕, 并在卡斯尔雷的警察审讯中心羁押五天。据称她在这期间遭受虐待, 如扇耳光, 撕扯头发和头、击打腹部和性骚扰。

541. 特别报告员还获悉另一起据称1992年3月2日发生在马加伯雷监狱(贝尔法斯特)的事件。有21名女囚犯被监狱看守野蛮地剥光衣服搜身和打骂。据报, 她们都遭受过警察的拳打脚踢、掐捏和扭拧四肢。监狱医生随后于当夜记录了她们受伤的情况并将其中一名送往获外医院, 因为她脸部严重肿胀和淤血。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转交政府的资料

542. 1992年7月18日, Christopher Mtikila牧师在多多马被野战部队军官逮捕并随后被判九个月的监禁。1992年9月18日, 特别报告员就他的情况向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发出紧急呼吁书。据报, Mtikila牧师已遭酷刑。人们担心他可能在狱中再次遭酷刑。

乌拉圭

转交给政府的资料

543.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11月12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已收到的报告表明,涉嫌犯有轻微罪行的人在蒙得维的亚警察总部和犯罪率高的贫穷地区的警察局中遭受酷刑和虐待。申诉中提到的酷刑种类有拷打,有时使用警棍毒打,让人几近窒息,电击和使用更残忍酷刑的威胁或以死亡威胁。只有极少数的施行酷刑者得到确认和受到审判。转交了下述有关个人的案件:

- (a) 1990年3月21日, Adrián Marcel Lombardo被捕并被送往蒙得维的亚警察总部的反谋杀队。他在那里身体各部位遭电击。他第二天获释;
- (b) 1990年8月3日, Alberto Périz Medina被捕并被送往蒙得维的亚5区警察局。他被剥光衣服、胸部和耳部遭毒打,致使听力几个月后都未恢复。尽管医疗报告证明了这种伤害,法院还是于1991年4月将此案束之高阁;
- (c) 1990年8月31日, Ricardo Costa、Vicente Vinagre和Néstor Moreira SEVEL钢铁厂的工人,被捕后被带往蒙得维的亚警察局。他们被蒙住头,受到威胁,身体各部位遭毒打。几小时后他们获释;
- (d) 1991年1月5日, Ricardo Fabra Riverol在蒙得维的亚的拉克鲁斯--德卡拉斯科被捕。他在一辆拉他去警察总部的车上遭到不断拷打并受到电击的威胁。医疗报告证明他身体确有青肿;
- (e) 1991年1月6日, Guillermo Alejandro Belsito Luna 和 Diego Washington Martínez Rancel (16岁)被三名警察逮捕。警察先后在街上和第9区警察局拷打他们,几小时后将他们获释;
- (f) 1991年1月9日, Julio Correa (18岁)和Alejandro Maidana (17岁)在蒙得维的亚被捕并被送往第1区警察局。前者被带上手铐拷打,被在地板上拖来拖去并受到被处决的威胁。后者的颈部和身体其他部位遭橡胶警棍击打。几小时后两人获释。

544. 反对酷刑委员会在第八届会议期间(1992年4月27日至5月8日)审查了该国政府对委员会有关该国初步定期报告问题的答复。该报告载入第CAT/5/Add.30号文件。

委内瑞拉

转交给政府的资料

545.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10月27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已收到了关于城市警察、司法警察、国民警卫队、情报总局和军事情报局经常对被捕人员施行酷刑的报告。最常用方法包括：拷打、电击和将装有刺激物如杀虫剂的塑料袋置于头部使人几近窒息等。

546. 据报，警察可以把人拘留八天并可以在以后的诉讼过程中使用此间得到的口供这一事实为酷刑的施行提供了便利。申诉很少使施行酷刑者被判罪这一事实使受害者对利用司法补救措施失去信心。向特别报告员报告的案件如下：

- (a) 1992年2月4日，Tulio Aguilar、Victor Avendano、William Barboza、Cecilia Benítez Valera、Wilfredo Bermúdez、José Figueroa、Carmen Alicia Gómez Potella、Alexander Hernández、Gualberto Martínez Prado、Raúl Miranda Borges、Ursula Mujica、Victor Padilla Villegas、Adrián ParraRamírez、Hiran Parran Ramírez、José Perdomo、Dagnis Quiames、José Rodríguez Bolívar、Anuar Rodríguez、Roraima Sanchez、Ivonne Sequera、Felix Silva和Jesús Torrealba 被卡拉沃沃州警察逮捕并送往Navas Espinola 基地。这22名被拘留者多为学生，他们在那里遭受了长达几个小时的拷打和电击。他们被单独监禁到2月12日，一直未得到任何治疗；
- (b) 位于联邦区的委内瑞拉中央大学的学生 Daniel Alvarado Alarcón、Luis Enrique Andrade、Luis Enrique Barroso、Luis Alberto Caballero Fernández、Hector Illich Chacón Delgado、José Gregorio Escalona Delgado、Jesús Enrique González Doubranger、Li zandro Obed Pérez Hernández、Orlando José Ramírez Paez、José Angel Rodríguez Macías、Julio César Rojas Avila、Jonathan Alexis、Toro Marval、Carlos Alejandro Valerio 和 Mark Flavio Zuccheli 在校园中被城市警察逮捕并带往 San José Cotiza 军营。这些学生被捕后被警察蒙上头毒打。他们在军营中遭受酷刑(电击、殴打等)后获释。未对他们提出任何指控；

- (c) **Jesues Antonio Castillo Gómez**, 《民族报》记者,在拍摄警察在校园中的行动时被警探逮捕。他在警察局遭受诸如电击之类的虐待;
- (d) 1991年10月21日, **Javier Ascanio**(15岁)、**Kodiat Ascanio**、**Néstor Gonzalez Igor Luengo**、**Brezne Manzano**、**Pablo Jose Rondon**、**Pedro Rondón**、**Nelson Villanueva González** 和 **Francisco Villanueva González** 在加拉加斯的郊区“23 de Enero”镇被捕。**Ascanio** 兄弟二人是在家中被捕的, **Kodiat** 被当着家人和邻居的面吊在第十二层。两名兄弟被带往 **Cotiza** 警察局。他们在那里遭到拷打和窒息之刑, 并经受模拟处决。**Nestor Gonzalez**、**Nelson Villanueva**和 **Francisco Villanueva** 被捕以及在警察局关押时均遭毒打。由于受伤,他们获释前不得不在**Vargas** 医院接受治疗。未对他们提出任何指控。**Rondón**兄弟也遭到了警察的体罚。**Pablo Jose Rondon**,居民小组的领导,和他弟弟一起当着家人的面遭受拷打。他后被带往 **La Canada** 和 **Cotiza** 警察局继续受虐待。**Igor Luengo**,居民小组的一名好斗分子, 被带往 **Cotiza** 警察局并被单独监禁了四天。他遭拷打, 经受了使他几近窒息的虐待;
- (e) 1991年10月18日, **Carlos Bernadino Carballo Morales**、**Richard Duran** 和 **Orland José Guerra** 在加拉加斯郊区 **La Vega** 被国民警卫队人员逮捕并带往警卫队第51支队。他们在那里遭到毒打和电击;
- (f) 1991年10月18日, **Yorfan José Escobar Berrios**(17岁)在加拉加斯的郊区 **La Vega** 被国民警卫队人员逮捕并遭毒打。他于10月23日获释。12月7日再次被捕。他再度遭拷打、电击。他的肩部被烧红的烙铁烫伤、肋部和腕部被刀子划破;
- (g) 1992年3月8日, **Luis** 和 **Pedro** 被城市警察逮捕。他们因在**苏克雷**警察局遭到拷打而不得被送往 **Domingo Luciani** 医院;
- (h) 1992年2月4日, **Humbert Lezama**、**Héctor Luis Valderrama**和**Ramón Yaguaramay**在**佩塔雷**被城市警察逮捕。他们在**苏克雷**警察局被指控参加了1992年2月3日的未遂政变。他们在警察局和情报总局遭受体罚(殴打、电击);
- (i) 1992年1月25日, **José Fermín Maccari**自愿前去正在调查一名警察被谋杀事件的**佩塔雷**侦探小分队。尽管包括未成年人案律师和一名当地牧师在内的许多人陪着他同去以保证其得到良好待遇,他还是在 **E1**

Llanito 和 Cochecito 警察局遭到毒打;

- (j) Pedro Romero 在佩塔雷他父亲家中被城市警察眼镜蛇分队的人员逮捕。他在Cotiza警察局遭受了诸如拷打、电击和使他几近窒息的酷刑。他几天后获释。未对他提出任何指控;
- (k) 1992年3月9日, José Blondell 被佩塔雷 El Llanito 警察局的警探逮捕。他在几天中遭受了各种酷刑,诸如让他几乎窒息、用铁棍击打和用灭火器喷射等,以使他供认参与了一次谋杀;
- (l) 1992年6月2日, José Antonio Briceño、Arnel Rodríguez、Omar Uribe和Julio Cesar Vera(三人都是学生)在卡瓦列罗-梅希亚斯的一次街头示威中被城市警察逮捕。他们获释前在警察局遭受虐待(把他双眼蒙住然后拳打脚踢、烟头烫灼等)。未对他们提出任何指控;
- (m) Rommer Figueroa Lizardi, 职员,在玻利瓦尔州圭亚那城的一次示威中遭国民警卫队人员毒打,后于5月29日死亡。医疗和司法报告指出死亡由于拘留期间身体遭受虐待而致;
- (n) 1992年6月4日, Oswaldo Rodriguez、El Aragueño报的记者,在马拉凯的一次示威中遭国民警卫队人员毒打。

547. 12月10日,特别报告员代表下列人士向政府发出紧急呼吁:Luis Alberto Arias Bellorin(学生)、Henry Hinojosa(人权委员会的社区领导和成员)、Benito Valera(COPEI政党的立法会议代表)、Victor Martinez Nino(一个人权组织的成员)、Arnaldo Guedez(教师)、Yolimar Sierra(教师)、Domingo Rivera、Francisco Escalona(政治家)、Julio Escalona(工程师)、Rolando Lugo(教师)、Orlando Chirinos(大学教授)、Alexis Campos Lovera(卫生部门的工会分子)、José del Carmen Rodriguez(学生)、Julio Rodríguez、Orangel López Rodríguez(社会主义联盟成员)、Nelson Viana(工会分子)、Rafael Castillo(工会分子)、Tony Gonzalez(学生)、Joel Gutiérrez(工会分子及市选举的候选人)。据收到的资料,许多平民和军人因与1992年11月27日的未遂政变有牵联而在加拉加斯、巴基西梅托、瓦伦西亚、马图林、洛斯特克斯、埃尔托库约、奥尔达斯港和玻利瓦尔城被捕。上面列举的人是他们中的一部分。据称,17名学生于11月8日在中央大学被捕。被拘留的平民被关押在情报总局以及城市警察、国民警卫队和军事情报局的所在地。

南斯拉夫

转交政府的资料和所收到的答复

548.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8月21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 他已得到有关在科索沃省对阿尔巴尼亚族人施行酷刑的资料。根据这一资料, 酷刑大多是在警察局内发生的; 但也经常发生警察大庭广众之下在街道、公共汽车或火车上拦阻他人的事件。青年人、特别是大学和高中学生也成为警察虐待行为的受害者。虐待的目的看起来要么是骗取情报和供词, 要么是威胁和侮辱。据称最常使用的虐待形式是用橡胶警棍和枪托击打或用拳打脚踢。尽管已有对实施虐待者进行控告的现成程序, 但检察机关一般不愿对警官提出诉讼。特别报告了以下案件:

- (a) 1991年10月31日, 科索沃律师协会和南斯拉夫律师协会前主席 Mikel Marku 律师, 和他的两个侄子 Xhon 及 Prend Marku 在离开佩奇前往 Stupe 村时被警察逮捕。在前往佩奇警察总部的途中, 警察用橡胶警棍和枪托殴打他们。到警察局后警察又接着拷打他们数小时之久。结果 Mikel Marku 在第二天早上被送往医院后, 于1991年11月11日死亡。据医院记录, 头部损伤造成了身体右侧瘫痪。解剖报告表明头部、躯干和四肢有多处外伤;
- (b) 1991年11月25日, Ali Haxhin, 一位居住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难民, 被警察逮捕送往乌罗舍瓦茨。第二天他被送往普里什蒂纳监狱, 几个小时后死亡。11月27日, 他的尸体被送回家, 据称尸体有严重擦伤, 几颗牙齿被打碎;
- (c) 1991年11月28日, 一位来自乌罗舍瓦茨的记者在 Kamenoglava 村被捕。他在乌罗舍瓦茨警察总部中关押了约六天。警官审讯他时, 用橡胶警棍野蛮拷打;
- (d) Kamenoglava 村小学校长 Selim Qazimi 因为准许使用校舍举行庆祝阿尔巴尼亚国庆的音乐会而遭逮捕, 并在乌罗舍瓦茨警察总部遭警棍击打;
- (e) Rustem Sefedini, 1991年1月前为乌罗舍瓦茨一个中等技术学校的校长。1991年10月4日, 他被警察逮捕并遭他们毒打, 断了三根肋骨;
- (f) 1992年1月29日, Ismet Krasniqi 在佩奇小学被逮捕并送往警察局拷打。第二天, 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 发现他臀部、双脚和双手有瘀血,

左耳膜穿孔;

- (g) Amrush Avclimetaj, 佩奇人, 1991年10月3日被捕。在被送往佩奇警察总部之前和之后, 他被踢打, 头和身体遭橡胶警棍的狠击;
- (h) Ali (Rexhep) Kadrija, 一位来自Decane 公社 Restovic村的工人。1991年8月23日, 他在回家的路上被警察从公共汽车上拽下来并被殴打。因为警察认为他举起两个手指是政治上的一种冒犯;
- (i) 1992年3月25日, Fadil Kralani被警察打的不醒人事。拷打就发生在位于佩奇原科索沃银行办公大楼的负责发放护照的监察员办公室中;
- (j) Jashar Sali Haxhiaj, 1991年9月3日, 当他无照驾驶一辆卡车时, 警察在 Radavce 将其拦住并殴打他; 第二天医生检查时, 发现他身上又左眼周围有擦伤、双臂及小臂和左大腿有创伤;
- (k) Enver Sinani, 是Lipljan公社Resinove村的一名法学毕业生、地方议会的雇员。他于1992年1月3日被捕并在默古拉的一个警察局中遭到警察的野蛮拷打。他们指控他私藏武器, 是反对派的积极分子。据报, 拷打使几天不能使用双手, 而且行走困难;
- (l) 1992年3月3日, Bajram Isuf Myrtezaj在佩奇被搜寻他儿子的警察逮捕和毒打;
- (m) Avdi Vljaj是一名普里什蒂纳大学工程系的学生。在参加了反对停止用阿尔巴尼亚语授课和反对解雇阿尔巴尼亚族员工的示威会议后, 他和另外几名学生于1991年10月4日被警察逮捕。他被带往 Muhaxher区的警察局, 遭到毒打和凌辱后被释放。医疗报告表明, 他眼角膜和结膜发炎、两眼周围有瘀血、左脚腕红肿, 耳膜外伤性破裂;
- (n) Daut Krasniqi, 一名来自佩奇公社Vranoc的初中生于1991年10月4日被警察逮捕并打致出血。原因是警察怀疑他藏匿武器和选票用纸;
- (o) 1991年4月, Faruk Muja, 一位来自Lipljan公社Magura村的12岁的吉普赛男孩遭警察毒打, 因为他们显然怀疑他在普里什蒂纳的黑市上卖香烟;
- (p) 1991年12月底, Mentor Kaçi、Sokol Dobruna、Zenel Sadiku、Delija Hagjocaj、Nuhija Bytyqi、Palusha Palushaj、Naim Krasniqi、Afrim Morina、Qerkina Peci、Sadik Mula 和Sejdi Veseli等人被捕并送往佩奇监狱。据证人说, 他们在狱中遭受严重虐待;

(q) Zenun Celaj(普里什蒂纳的科索沃赫尔辛基委员会执行局成员)和 Ibro Osmani于1992年6月20日在佩奇外的警察检查站被捕。送到警察局后,他们遭受了两个小时的毒打。

549. 1992年11月4日,特别报告员给政府再次发函,通知政府他收到一份名单。名单所列人员在参加1992年10月12日和13日科索沃举行的抗议歧视阿尔巴尼亚民族教育的集会中,遭到安全部队的毒打。指称其涉及一名Deçan人,三名Dragash人,三名Gjakovë人,四名Istog人,140名Klinë人,三名Lipjan人,三名Malisheve(Kijeve)人,113名Peje人,27名普里什蒂纳人和34名普里兹伦人。

政府提供的有关前几份报告中所载案件的资料

550. 1992年2月11日,政府对特别报告员1991年转交的三个案件(E/CN.4/1992/17,第265段)给予如下答复:

- (a) Alush Gashi 有关他受虐待的指称不属实。1990年10月26日,他被带到警察局审问。然而,在押送和审问过程中,未对他使用任何武力;
- (b) 1990年7月23日,Sadiku Xhevat被押送到警察局接受审问,因为他未及时提前登记便组织了一次集会。他作了书面声明。从所准备的关于整个审讯的官方记录中可以看出,他未受到身体虐待,也未对警官的行为作任何评论;
- (c) Copi Ismet 未对他采取任何措施(他未被带到警察局、未被拘留或搜身),所以提出的指称毫无根据。

三、访问和访问后续工作

A. 访问前南斯拉夫

551. 如第一章所述, 1992年10月12日至22日, 特别报告员参加了, 塔德乌什·马佐维茨基先生, 即前南斯拉夫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访问团。此次出访中, 访问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及塞尔维亚共和国。

552. 在饱受战乱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酷刑已司空见惯, 丝毫不令人惊奇。在武装冲突中, 人生命本身不受尊重; 在这种情况下, 对基本人权的侵犯, 如任意拘留、实施酷刑、故意杀害和造成失踪常常是无独有偶。然而不尊重人权似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达到了极点。代表团所收到的材料令人不寒而栗: 如有的人被乱棍活活打死; 有的则因酷刑致伤, 特别在塞族控制地区的拘留营遭酷刑, 而最终死亡。据称, 还发生过蓄意强奸其他民族妇女的情况。

553. 还收到有关达罗地亚和穆斯林控制的波一黑地区使用酷刑的材料, 尽管这种情况的规模较小, 系统程度较低。据称, 克罗地区警察和军人有时严重虐待塞族被拘留者。

554. 作为塞尔维亚共和国一部分的科索沃的局势特别令人关注。1990年, 这个省原来的自治地位被取消, 其行政权掌握在塞尔维亚政府手中。自此, 省内占人口90%的阿尔巴尼亚族居民参与公共、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从那时起, 特别报告员经济收到有关阿尔巴尼亚族人遭受酷刑和虐待的材料、虐待并非只在拘留时才有发生、有人提及过大批警察讨伐城镇乡以搜查武器的事件。讨伐过程中、有人被殴打或遭虐待。

555. 1992年10月18日, 特别报告员亲自询问了警察极端暴行的25名受害者。10月12日至13日, 为使过去两年在部分时间被关闭的学校重开, 科索沃省各城镇举行了示威。据说, 当局已收到关于依法组织这几次游行示威的正式通知, 而且当局也未下令禁止。然而, 手持警棍和催泪弹的警察却对示威群众大打出手, 而且事前没有象往常那样先下驱散令。特别报告员收到了一份321名遭毒打人的名单。所有他亲自询问过的人都身负重伤。

556. 特别报告员还参观了科索沃省会普里什蒂纳的市级监狱, 他以前曾参观过这座监狱, 条件看起来令人满意。在这座监狱, 待审的被拘留者同已被判六个月以下徒刑的犯人关押在一起。然而, 特别报告员得知, 离普里什蒂纳省一段距离的

地区监狱的条件则很差。

557. 特别报告员听取了有关一起据称严重虐待案件的证词,此案是在他出访前不久提交给他的。报告员还查阅了医疗数据等案卷。特别报告员和随行的医学专家依据现有的材料得出结论,认为所指称的酷刑可能确有其事。

558. 科索沃的局势十分动荡,国际社会应尽可能密切关注它的发展。

B. 访问后续工作

559. 在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危地马拉的观察员向特别报告员提交了一份本国政府的备忘录,其中包括当局为改善人权状况所采取的措施的资料。这份备忘录是对特别报告员1991年10月21日信件的反应。特别报告员曾在信中要求政府向他通告根据他访问危地马拉报告中的建议而可能已采取的任何措施。

560. 除其他外,备忘录载有下列材料:

561. 1992年5月2日, 内务部长由一名文职官员接替,保证了国家警察部队由文职官员控制、从而大大促进了人权的保护、宣传和发展。还指派了一名文职官员担任国家警察总局长。

562. 开展了各种教育项目,旨在促使政府部门保证对天赋人权的尊重和遵守。

563. 重新改组了支助难民特设委员会。共和国副总统将成为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564. 1991年7月12日, *Diario Oficial* 报上发表了一项关于建立协调人权领域执行政策的总统委员会的政府决定。它的主要职能是协调保护和保障人权的执行行动、制定人权政策并由执行部门与负责人权的检察长合作加以实施。

565. 建立了一项和平基金, 完全用于给那些旨在帮助受国内武装冲突影响的人的方案提供资金。

566. 1991年间, 共和国总统和人权委员会专家托穆沙特教授之间互致信函,以应特别报告员托穆沙特教授要求,向他通告本国政府在人权领域中取得的进步并给他提供有关申诉情况的资料。

567. 1991年开始与危地马拉游击队运动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多次谈判,在谋求和平方面已逐步取得进展。

568. 在1992年10月5日给 秘鲁政府(1988年4月访问)、洪都拉斯政府(1989年9月访问)、扎伊尔政府(1990年1月访问)、菲律宾政府(1990年9月访问)的信中,及在1992年9月4日给印度尼西亚政府(1991年11月访问)的信中,特别报告员提请上述

在1992年9月4日给印度尼西亚政府(1991年11月访问)的信中,特别报告员提请上述政府通知他根据他访问这些国家后所做建议而可能已采取的任何(进一步)的措施。至于印度尼西亚,可以回顾,1992年3月4日委员会主席宣读了委员会协商一致同意的一项关于东蒂汶局势的声明。声明中包括下列语句:“委员会(…)敦促印度尼西亚当局采取必要措施,实施特别报告员访问印度尼西亚和东蒂汶的报告中包含的建议并期望得到一份相关报告。”

569. 秘鲁政府在1992年11月20日的信中给特别报告员提供了下述资料。

570. 特别报告员的某些建议暗示改变现存的法律秩序。民主立宪议会将于1993年1月3日召开;它将被授权修改目前的宪法并具有立法职能。立宪议会及将在会上制定的宪法将成为一种制度框架,这是为实现国家和平而通过紧急法律措施所必不可少的。

571. 现行的法律制度建立了确定侵犯人权行为责任的机制和程序。这些程序保证了秘鲁进行及时和正确的司法裁判。

572. 负责被拘留者的军事当局在现存的法律框架内行使其在人权方面的义务,

为达此目的,它还给司法当局、检查部门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提供适当的便利。在此方面已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法律和行政规定。其中包括1991年9月2日第665号立法令和1991年11月11日第1302-91/DE-SG号部长令,此令允许检察官进入紧急状态区的军事设施。

573. 军事当局,无论其级别和职能如何,都答应有关法律人员的要求并给后者为实施人身保护令所做的工作提供便利,即便此类工作是在已宣布处于紧急状态的地区进行,军事当局也提供便利。

574. 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便利,准允它进入紧急状态区军事设施骨的拘留地点。

575. 国防部已根据第25211号法和关于尊重人权的总统法令采取措施将人权教学标准人化。此法令在各军事训练中心正在所有各级得到积极地实施。这种教学也纳入了未受衔军官和普通士兵的训练方案中。

576. 已授权军事司法队的6名军官应美国军援和磋商组的邀请去参加人权学习班。这些军官回国后将为秘鲁各兵种军事人员设计一门人权课程。

577. 1992年10月12日,土耳其(1988年9月访问)政府向特别报告员转交了1992年9月22日的《还押拘留实施准则》的文本。该准则第三条是专门关于防止酷刑的条款。特别报告员在访问土耳其的报告中曾建议:(b)如果一个人提出申诉说他在

被拘留期间遭受酷刑；可从合格和有经验的医生组成的专门小组中选一名医生并委托他对申诉人进行医疗检查；独立的专业组成可建立这样的专门小组。

578. 《实施准则》第三条如下：

“ 3. 关于行政程序法规：

- (a) 警察拘留期限应严格遵守。
- (b) 考虑到卫生条件，应允许被警察拘留者在警察或宪兵的控制下得到清洁和其他设备。
- (c) 进行上述医疗检查的医生应来自有关法医研究所或得到政府认可的医生。得如果被警察拘留者要求由自己选择医生来进行检查，且这种要求也不会有损调查的安全，则应给予被拘留人员这样的权利。如果有理由认为被拘留者选择的医生接近他可能危害调查，则应允许被拘留者从适当的专业机构同意的医生中选择一名对他进行检查。
- (e) 在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后应让医生和被拘留者单独在一个房间进行医疗检查过程中，以便医疗检查能够在没有外人和充分保证被检查者隐私权的情况下进行。
- (f) 应保证被警察或宪兵拘留者每天至少吃一顿饱饭。
- (g) 《还押拘留实施准则》应能张贴在各审讯室入口处，并应被认为已通知有关当局和人员。”

四、结论和建议

579. 所有人权文件之母的《世界人权宣言》开宗明义：“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酷刑则正相反，因为酷刑恰恰是施加酷刑者剥夺了受害者的固有尊严。打断骨头尽管可怕，但仍仅仅是施加酷刑者达到其真正目标的一种手段。施加酷刑者的目的是要侮辱他人人格和搞垮他人意志。酷刑特别令人厌恶的原因在于它的长久影响常常与其说是生理上的，到不如说是心理上的。破碎的人格永远不会复原，受害者的固有尊严一旦被玷污，终生难以弥补。

580. 对人类尊严一种特别卑鄙的侮辱就是强奸。妇女人格最敏感的部分一旦遭受伤害，势必会产生极为有害的长久影响，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无力也无法负担必要的心理治疗。南斯拉夫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读起来的确让人吃惊，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强奸已是用于表示对这些不幸的受害者所代表的少数民族蔑视和仇恨的一种蓄意行为。

581. 对儿童施行酷刑是可耻的，因为他们仍处正成长阶段，酷刑疾苦严重阻碍了他们稳定和正常的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在国际社会明确宣布儿童有权受到特别保护之时，特别报告员收到指称有对儿童实施酷刑的信件，他为此感到震惊。

582. 酷刑完全否定人的尊严及人权这一事实使国际社会加紧进行反对酷刑的运动。但我们应当认识到，酷刑仅仅是一根长链上的最后一环。一个社会如对忽视尊重自己公民的人的尊严的情况采取容忍的态度就等于撒下酷刑的种子。前南斯拉夫的状况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仅仅因为他人属于不同于自己的民族就不尊重他们固有的人格尊严是导致酷刑、强奸和谋杀活动猖獗的原因。

583. 因此，1992年4月人权委员会同时更新了它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7条和第8条的一般评论(A/47/40，附件VI)这并非出于偶然。

584. 特别报告员在其前几份报告(E/CN.4/1988/17，第55段)中指出，有一种每况愈下的倾向，即被拘留者遭到不符合第10条第1款的规定的待遇，然后遭到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最后遭到真正的酷刑。第10条第1款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人权委员会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指出：“第10条第1款规定了各缔约国对那些由于自由被剥夺而特别脆弱的人们负有积极义务，是对《盟约》第7条有关不得对他们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规定的补充。”委员会补充说，被剥夺了自由的人的尊严

应像自由人一样得到尊重。除了受到封闭环境中不可避免的限制外，被拘留者应享有《盟约》规定的所有权利。

585. 至于第7条，委员会强调各缔约国有防止和阻止出现酷刑的具体义务，其措词几乎同特别报告员反复提出的建议完全一样。这点特点突出，但不令人奇怪。

586. 委员会认为，在拘留或对待受到各种形式逮捕、拘留或监禁的个人时有关的执法人员，医务人员、警察和其他有关人员都必须接受适当的指导和培训。关于拘留条件，委员会指出，应规定被拘留者须关押在官方承认的拘留地点；拘留地名称和地址以及拘留负责的姓名都应登记注册，以使有关人员，包括亲属和朋友可以随时得到。关于审讯程序，委员会认为所有审讯的时间及地点应有记录，所有在场人员的姓名也要记录；在司法和行政诉讼时也要提供这样的资料。委员会强调有必要让医生、律师和家属（如果调查需要，加以适当监督）及时和定期地会见被拘留者。严禁单独拘禁。

587. 委员会认为，法律必须禁止在司法诉讼程序中使用或承认以酷刑或其他被禁止的待遇获取的供述或供词。《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也禁止这种作法。

588. 委员会进一步指出，那些无论是鼓励、命令、容许或本身采取违禁行为而违反第7条的人应对此负责，受害者有权提出申诉，同时，有关当局应迅速进行公正的调查。他们有权享有适当的补救。

589. 这些措施无一例外地是特别报告员建议采取的措施。如果每一个国家都采取这样的措施，并积极监督国家各权力机构对其实施，那么就没有施用酷刑者会因期望能逃避惩罚而从事他的肮脏勾当了。正是因不受惩罚才使酷刑有吸引力和可行。特别报告员经常收到下列情况的材料：把人被关在所谓“安全室”中；审讯时，他们被戴上头罩或蒙住双眼以使他们不能认出审讯者；长时间地单独拘禁；得不到自己选择的律师和医生；亲属得不到关于被拘留者下落的消息；尽管在审判中嫌疑犯称供词是通过酷刑取得的，法院还是承认和采用它们；接受申诉的当局本身就据称容许鼓励使用酷刑；申诉得不到独立机构的调查；应对违禁行为负责的人得不到处罚受害者得不到有效和适当的补救。

590. 上述这一系列情况对采用酷刑法十分有利；它们无一例外都违反了现行的规则。最高行政和司法当局的疏忽和迟钝在许多情况下也是酷刑泛滥的原因。

591. 政府应当认识到，它们不能一方面继续仅在国际上谴责罪恶的酷刑，而另一方面其国内又默许酷刑。每一个国家的司法当局应切记，它们都曾宣誓要执行法律、主持公道；甚至当法律与国际标准不符时，应通过解释过程使法律接近这些

标准，这是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事。司法机关应认识到，如果基本人权遭侵犯，就无公正可言，因为依据誓言，它们只能选择站在被压迫一方。他们有权下令释放在公然违反法规的条件下拘留的人员，有权拒绝使用在不自由的情况下提供的证据；有权使酷刑没有吸引力，使实施酷刑的人得不到任何好处；它们应使用这种权力。

592. 人权委员会还提醒各缔约国，不应通过引渡、驱逐或遣返等手段使当事人一到它国就面临酷刑和残酷、不人道或有侮人格的待遇或惩罚的危险。《反酷刑公约》第3条对这一原则作了明确地表述，其含义是将一个人暴露在易受酷刑的环境中，如酷刑行为本身一样，也是对那个人基本人权的侵犯。欧洲人权法院对此也予以确认。

593. 人们有兴趣地注意到，人权委员会认为，《盟约》第7条包括的禁止行为应该扩展至体罚，包括作为惩罚罪行或作为教育或惩戒措施而命令进行的过分处罚。这似乎是说，《反对酷刑公约》的第一条第一款最后一句话，即“酷刑”一词不包括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的或附带的疼痛或痛苦，其含义只能被解释为这种法律制裁必须符合国际标准。任何国家都不允许采取在任何其他形式下通常被谴责为严重侵犯人权的法律制裁行为。在此方面，应注意委员会的观点，即不得因任何理由为违反第7条进行辩解或援引可使罪行减轻的情况。

594. 如果所有国家的政府都认真听取委员会的观点和意见，检查它们的国家制度是否与这些观点和意见相符并进行必要的改革，那么，反对酷刑的运动将获得新的发展。人权委员会是一个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机构；它由独立专家组成；它代表各个地区和不同的文化。因此，应极其严肃地对待它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七年前我在第一份报告中称之为“二十世纪后半期瘟疫”的酷刑不受阻止地进入二十一世纪。

XX XX XX XX XX